我的家庭如何造就这世界最危险的男人

玛丽·特朗普 著

VISIT…

扫码免费领取资料

房中术(www.zuihaoziyuan.com)专注于男性增大增粗增长、阳痿、早泄、壮阳、延时、强肾、回春、健身。女性缩阴、丰胸、减肥、化妆、瑜伽、保养、产后修复、盆底肌锻炼。两性健康,夫妻按摩,房中术,性姿势,性技巧,性知识等

更多免费教程：英语学习，技能提升，PS 教学，投资赚钱，音乐教程，口才教学，情商提升，风水教学，心理学，摄影知识，幼儿学习，书法学习，记忆力提升等等.....

==========

全站课程下载

课程不断增加

本站现资源容量已超 10T

入群联系 QQ：167520299 或添加微信：1131084518（备注PDF）

扫码加微信lax988988领取资料

阳痿早泄训练
皇室洗髓功视频教学
女人驻颜术
泡妞约炮万元课程
足疗养 SPA 教材
玉蛋功
马氏回春功
房中术张丰川
哲龙全套视频
增大盼你增大
国际男优训练
亚当德永早泄训练
洗髓功真人内部
皇室养生绝学道家洗髓功
【铁牛人会员课】男人必备技能，理论讲解
实战高清视频
随意控制射精锻炼 视频+图片+文字
价值 1440 元第一性学名著<素女经房中养生
宝典视频>12 部
洗髓功修炼方法视频教学
陈见玉蛋功视频教学 女性缩阴锻炼
男性自然增大增长指南
强性健肾保健操 1-4
道家强肾系统锻炼功法
马氏回春功
12 堂课，全面掌握男性健康问题 让你重燃自信
联系微信：1131084518

1、东方性经
2、印度 17 式
3、口交技巧 3 部
4、港台性姿势 3 部
5、365 性姿势 6 部
6、泰国性爱密经 17 式
7、花花公子性技巧 6 部
8、阁楼艳星性技巧 7 部
9、古今鸳鸯秘谱全集 7 部
10、夫妻爱侣情趣瑜伽 2 部
11、古代宫廷性保健系列 14 部
12、汉唐宋元明清春宫图真人
13. 柔软性爱宝典 日本 9800 课
14. 李熙墨 3999 全套课
15. 妖精性爱课 2888
16. 李银河全套性课
17. 领统统性课
18. 德勇男性篇
19. 德勇男性篇
20. 缓慢性爱
21. 亚当多体位搭配篇
22. 亚当多体位结合篇
23. 德勇克服早泄讲座练习
24. 德勇以女性为中心得爱抚
25. 加藤鹰接吻爱抚舌技
26. 加藤鹰指技
27. 加藤鹰四十八手入门
28. 佐藤潮吹教学
29. 佐藤男人体能锻炼+保健品介绍
30. 佐藤男人早泄对抗训练
31. 阿拉伯延时训练

32. 田渊正浩秘籍
33. 异性性快感集中训练教学
34. 自我愉悦锻炼密宗
35. 铁牛全套延时训练课
36. Pc 机锻炼真人视频教学
37. 印度性经全集 8 部
38. 21 世纪性爱指南
39. 香蕉大叔男女训练馆全套
40. 中美真人性治疗教学+理论
41. 女性闺房秘术
42. 幸福玛利亚性课
43. 陈见如何释放性魅力征服
44. 性爱技巧讲座全套
45. 性爱秘籍全套
46. 性爱误区讲座
47. 性病讲解大全
48. 性博士讲座合集
49. 性健康和性高潮合集
50. 性教育讲座合集
51. 性能力课堂合集
52. 性生活问题解析合集
53. 意外怀孕和避孕处理课堂
54. 性感地带探索
55. 性技巧讲座
56. 性健康与性卫生讲座
57. 性生活专家答疑
58. 性心理与性道德合集
59. 性爱宝典合集
60. 性爱技巧合集
61. 完美性爱演示
62. 完美性爱技术讲解
更多精品等你来解锁哦.....

编者按：

2020 年 7 日 14 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侄女玛丽·特朗普撰写的一本爆炸性新书《过多与永匮——我的家庭如何造就这世界最危险的男人》出版，她在书中称，唐纳德·特朗普不同寻常的性格和蛮横粗暴的行为“威胁到了世界的健康、经济安全和社会结构”，而这些特征是在童年时由他“高度反社会”的父亲塑造的。书中除了广泛讨论塑造唐纳德·特朗普性格的家庭机能障碍之外，还声称总统年轻时有多次令人震惊的行为，包括为了进入一家著名商学院而进行学术作弊以及残暴对待女性等。

这本书在出版当天就在亚马逊的畅销书排行榜上位居榜首。当天，玛丽还接受了 ABC 的独家专访。在被主持人问及想对特朗普说些什么时，玛丽则直接回答称：“辞职吧。” 不仅如此，她还直言，叔叔完全没能力去领导美国，让他成为总统“很危险”。7 月 27 日，玛丽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更是表示，将“尽其所能”帮助特朗普的劲敌拜登当选美国总统。该书出版不久，特朗普就在推特上对自己的侄女开炮，他写道：“我要说的下一位是玛丽·特朗普，她是我一个很少见面的侄女，也不怎么了解我，她用一些不诚实的话来描写我很棒的父母(他们已经受不了她了！)，还包括我，这种行为违反了她的保密协议。她把我的纳税单公之于众，这也违反了法律，她糟透了!”

当前，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正面临疫情危机、经济危机、全球领导力危机的多重挑战，这位总统的性格缺陷也在多重危机下进一步凸显。作为特朗普家族的重要成员以及心理学博士，玛丽·特朗普出版此书能够帮助人们了解特朗普性格形成的家庭背景因素，推动外界对特朗普有更深刻的认知。

我们翻译此书，供领导和专家参考，不代表我们支持其观点。因时间仓促，不免有翻译不当之处，敬请谅解。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课题组

2020 年 8 月

目录

作者注 4
序 5
第一部分 残忍是关键 18
第一章 房子 18
第二章 第一个儿子 31
第三章 伟大的自有者 37
第四章 期待飞行 46
第二部分 贫民区 52
第五章 禁足 52
第六章 零和博弈 59
第七章 平行线 64
第八章 逃逸速度 78
第三部分 烟和镜 96
第九章 救济的艺术 96
第十章 夜幕不会马上降临 113
第十一章 唯一的货币 122
第十二章 崩塌 128
第四部分 最糟糕的投资 132
第十三章 政事即私事 132
第十四章 公共住房里的公务人员 143
后记 第十层地狱 151
致谢 154
作者简介 155

如果将灵魂留在黑暗中，就会犯下罪过。有罪的不是犯罪的人，而是那个导致黑暗的人。

——维克多·雨果《悲惨世界》

作者注

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来自我的记忆。对于我不在场时发生的事件，我依靠的是与家人、家人朋友、邻居和同事的谈话和采访，其中很多都有录音。我根据我的个人记忆与别人告诉我的内容重建了一些过去发生过的对话。在出现对话的地方，我的意图是重新创建对话的实际含义，而不是一味的追求逐字逐句的准确无误。我也依靠法律文件、银行对帐单、纳税申报表、私人日记帐、家庭文档、信件、电子邮件、文本、照片和其他记录撰写本书。

总体背景方面，我参考了《纽约时报》，特别是 2018 年 10 月 2 日大卫·巴斯托、苏珊娜·克雷格和拉斯·比特纳发表的的调查文章；《华盛顿邮报》；《名利场》；《政治报》；环球博物馆网站；诺曼·文森特·皮尔的《积极思考的力量》。关于障碍赛跑公园的背景，我要感谢康尼岛历史项目网站、《布鲁克林报》，以及 2018 年 5 月 14 日达娜·舒尔茨在 6sqft.com 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感谢丹·P·麦克亚当斯对“情景之人”的深刻见解。关于特朗普家族企业和涉嫌犯罪的家族史和信息，我感谢已故的韦恩·巴雷特、戴维·科恩、迈克尔·德安东尼奥、戴维·凯·约翰斯顿、蒂姆·奥布莱恩、查尔斯·P·皮尔斯和亚当·瑟沃。也要感谢格温达·布莱尔、迈克尔·克兰尼什和马克·费舍——但我父亲去世时是 42 岁，而不是 43 岁。

序

我一直很喜欢我的名字。上世纪 70 年代，我还是个参加帆船训练营的孩子时，每个人都叫我特朗普。我的姓氏让我感到骄傲，并不是因为这个名字与权力和房地产有关系（当时我的家族在布鲁克林和皇后区以外并不为人所知），而只是这个名字听起来很适合我，一个坚强的六岁孩子，什么都不怕。20 世纪 80 年代，当我还在上大学的时候，我的叔叔唐纳德开始给他在曼哈顿的所有建筑打上烙印，我对我的名字的感受则变得更为复杂。

三十年后的 2017 年 4 月 4 日，我坐在美铁列车的安静车厢中前往华盛顿特区，在白宫享用家庭晚餐。十天前，我收到一封电子邮件，邀请我参加我的两位姨妈玛丽安娜（80 岁）和伊丽莎白（75 岁）的生日庆祝会。他们的弟弟唐纳德自一月份以来就已经入住了白宫。

在我穿过华盛顿联合车站的拱形天花板和黑白大理石地板后，路过一家卖纪念品的小店，小贩摆了一个带有出售按钮的画架。在这些按钮上，我的姓氏被一笔红色斜线划掉：“遣返特朗普”（DEPORT TRUMP)），“扔掉特朗普”（DUMP TRUMP），“特朗普是女巫”（TRUMP IS a WITCH）。我立刻戴上太阳镜，并加快了步伐匆匆离开。

我乘出租车去了特朗普国际饭店，与我家人共度一夜。入住后，我穿过中庭，抬头透过玻璃天花板看着蓝天。拱形的屋顶下是相互连接的大梁，悬挂着的三层水晶吊灯投射出柔和的光线。一侧是扶手椅，长椅和沙发——宝蓝色，知更鸟蛋蓝色、象牙色——一组组地摆放着；另一侧，桌子和椅子围成一个酒吧式的空间，我被安排在那里见哥哥。我原以为这家旅馆庸俗而奢华。然而并不是。

我的房间也很雅致。但我的名字到处都是，到处都有：特朗普洗发水，特朗普护发素，特朗普拖鞋，特朗普浴帽，特朗普鞋油，特朗普针线包和特朗普浴袍。我打开冰箱，拿起一瓶特朗普白葡萄酒，倒进了我的“特朗普喉咙”，让它可以穿越我的“特朗普血液”，并进入我的“特朗普大脑”的快乐中枢。

一个小时后，我遇到了我的兄弟弗雷德里克·克里斯特·特朗普（Frederick Crist Trump），我自儿时起就叫他弗里茨，还有他的妻子丽莎。很快，参加晚会的其他人也来了。我的姨妈玛丽安娜，是我的爷爷奶奶弗里德与玛丽·特朗普五个孩子中的长女，亦是一位令人尊敬的联邦上诉法院法官。我的叔叔罗伯特和

他的女朋友，罗伯特是这个家庭的小儿子，曾是唐纳德大西洋城赌场的雇员之一，直到在 1990 年代赌场经营不善时才离开；我的姨妈伊丽莎白，特朗普家中间的孩子，和她的丈夫吉姆；我的堂兄戴维·戴斯蒙德（玛丽安娜唯一的孩子，也是我爷爷奶奶最大的孙子）和他的妻子；还有一些我姨妈的密友。特朗普兄弟姐妹中唯一缺席的家族成员是我的父亲，我爷爷奶奶的大儿子弗雷德里克·克里斯特·特朗普，每个人都叫他弗雷迪。他已经死了三十五年了。

当我们终于聚齐时，我们在外面向白宫安全人员登记，然后像初中曲棍球队队员一样匆忙的钻进了两辆白宫小穿梭巴士。一些年长的客人在上车时遇到了困难，坐在了令所有人感到不适的拥挤穿梭巴士的长凳上。我想知道为什么白宫没想过至少要给我的姨妈们派一辆加长豪华轿车。

十分钟后，当我们驶入白宫南草坪车道时，两名警卫从安全棚里出来检查了车辆的底部，然后我们驶入了白宫前门。经过短暂的车程，我们在附近一处靠近白宫东翼的小型安保建筑停了下来。在被叫到名字后，我们一一进入并交出了我们的电话和手包，然后穿过安检区的金属探测器。

进入白宫后，我们三三两两地在长廊走了很久，经过窗外花园和草坪，看到了栩栩如生的前第一夫人画像。我停在希拉里·克林顿的画像前，静静地站了一分钟。我不禁再一次疑惑，这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指特朗普当选总统）。

我从未想象过以这种方式造访白宫。这一次访问仿佛是一场幻觉。我环顾四周。白宫优雅，宏伟而庄严，然后我即将在八年来第一次见到我叔叔，一个住在这里的人。

我们从走廊的阴影中途径白宫玫瑰园周围的门廊，直到步行至椭圆办公室外面为止。通过法式门，我可以看到办公室内会议仍在进行中。副总统迈克·彭斯站在一边，但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保罗·瑞安、民主党人参议员查克·舒默和十几个国会议员和职员都围在唐纳德以及坚毅桌后面。

这一画面让我想起了我祖父的一种策略：他总是让那些向他恳求的人来到他布鲁克林的办公室或皇后区的房子里，而当这些人站着时，他仍然坐着。1985 年秋末，在我因休假离开塔夫茨大学一年后，我站在了他的前面请求他允许我返回学校。他抬头看着我说，“这太蠢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还不如去职业学校当一名接待员。”

“因为我想获得我的学位。”我说这话时一定带着一丝恼怒，因为祖父眯起眼睛看了我一会儿，好像在重新评价我。他的嘴角翘了起来，冷笑起来。“太令人讨厌了，”他说。

几分钟后，会议结束了。

椭圆办公室比我想象的要小，也没有那么私密。我的表弟埃里克和我从未见过的他的妻子劳拉正站在门口。所以我说，“嗨，埃里克。我是你的表姐玛丽。”

他说：“我当然知道你是谁。”

“嗯，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说。 “我想我们上次见面时，你还在读高中。”

他耸耸肩说：“那可能是真的。”他没有介绍我们，就和劳拉走开了。我环顾四周。梅拉尼亚、伊万卡、贾里德和小唐纳德都已抵达，站在唐纳德旁边，而唐纳德仍然坐在座位上。迈克·彭斯继续沉默呆在房间的另一边，脸上挂着半死半活的微笑，就像那个人人都想避开的监护者。

我凝视着他，希望与他进行眼神交流，但是他从来没有看过我一眼。

“各位，请原谅。”白宫摄影师，一个身材娇小的年轻女子穿着深色长裤套装，以乐观的声音宣布。“让大家凑在一起，这样我们在上楼之前可以拍几张照片。”她指示我们围住唐纳德，而他还没有从桌子旁站起来。

摄影师举起了相机。 “一，二，三，微笑，”她说。

拍照后，唐纳德站起来，指着放在桌子后面桌子上的一张我祖父的黑白相框照片。“玛丽安娜，那不是一张爸爸的好照片吗？”特朗普说。这张照片和我祖父母家图书馆小桌子上的照片是一样的。照片上，我的祖父还是一个年轻的男人，一头逐渐退去的黑发，留着小胡子，一副命令式的神情，在他的痴呆发作之前，我从未见过他有过这种神情。我们都看过成千上万次了。

“也许你也应该有一张妈妈的照片。”玛丽安娜建议。

“这是个好主意，”唐纳德说，好像他从来没有想过，“谁给我一张妈妈的照片。”

我们在椭圆形办公室待了几分钟，轮流坐在坚毅桌后。我哥哥给我拍了一张照片，后来我再看这张照片时，我注意到我爷爷像幽灵一样在我身后。

————

白宫历史学家在椭圆办公室外面加入了我们的行列，我们前往二楼的行政官邸进行参观，然后去进晚餐。一上楼，我们就来到林肯卧室。我迅速往里面看了一眼，惊讶地发现床头柜上有一个吃了一半的苹果。当历史学家向我们讲述这些年来在这个房间里发生的事情时，唐纳德时不时地含糊地指出：“自从乔治·华盛顿住在这里以来，这个地方看起来从来没有这么好过。”历史学家还是太客气了，没有当面指出白宫是直到华盛顿去世后才对外开放的。参观小组沿着大厅移到签约室和行政餐厅。

唐纳德站在门口，向进来的人打招呼。我是最后到达的。我还没有打招呼，他一看到我，就惊讶地指着我，然后说道：“我是特别邀请你这次过来的。”他经常说这种话吸引别人，而且他会根据场合量身定制他的说辞，这更加令人印象深刻，因为我知道那不是真的。他张开双臂，然后，平生第一次，他拥抱了我。

关于这间行政餐厅，我首先注意到的是它的美丽：打磨得完美的深色木材，精致的餐位设置，以及餐位卡和菜单上的手绘（卷心莴苣沙拉、土豆泥——特朗普家族传统主食——以及上等牛排）。我注意到的第二件事是座位安排。在我们家族，你总是可以按你的入座位置来衡量身价，但我不介意：所有我感到舒适的人——我的兄弟姊姊、玛丽安娜的继女和她的丈夫——坐在我附近。

每个服务员都拿着一瓶红酒和一瓶白葡萄酒。真正的酒，不是特朗普牌葡萄酒。真是出乎意料。在我的一生中，在家庭聚会中从未出现过酒精。在祖父母的房子里只提供可乐和苹果汁。

就餐过半，贾里德走进餐厅。“哦，看，”伊万卡拍着手说，“贾里德从他的中东之旅中回来了”，仿佛我们刚刚没有在椭圆形办公室见过他似的。他走向妻子，在她脸颊上快速地吻了一下，然后向坐在伊万卡旁边的唐纳德弯下腰。他们安静地说话了几分钟。然后贾里德离开了。他没有和任何其他人打招呼，甚至没有与我的姨妈打招呼。当他越过门槛时，小唐纳德从椅子上跳起来，像一只兴奋的小狗一样追着他。

当甜点端上来时，罗伯特站了起来，手里拿着酒杯。“能与美国总统一起来这里真是荣幸。”他说。“谢谢你，总统先生，感谢你允许我们在这里庆祝我们姐妹的生日。”

我回想起上一次家人在布鲁克林的彼得·卢格（Peter Luger）烤肉馆庆祝父亲节的时候。那时，和现在一样，唐纳德和罗伯特挨坐在一起，坐在我的正对面。没有任何解释，唐纳德转向罗伯特说：“看。”他露出牙齿，指着他的嘴。

“什么？”罗伯特问。

唐纳德只是把嘴唇向后拉了拉，进一步指着他的嘴。

罗伯特开始显得紧张。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一边喝着可乐，一边饶有兴趣地看着。

“看！”唐纳德咬着牙说。 “你觉得怎么样？”

“你是什么意思？”罗伯特的尴尬很明显。他扫视了一下四周，以确定没有人在看他，然后低声问道，“我的牙齿上有东西吗？”桌上散落着几碗菠菜奶油，这显然是一种可能。

唐纳德松开了嘴，不再指向他的嘴。他轻蔑的脸很好总结了他们关系的整个历史。“我做了牙齿洁白术。你看怎么样？”他冷冷地问。

罗伯特说完话后，唐纳德轻蔑地看了他一眼，正如二十年前那次在彼得·卢格烤肉店聚餐的表情一样。然后，唐纳德手持着一杯健怡可乐，对我姨妈的生日发表了一些敷衍的言论，然后又指了指他的儿媳。“劳拉，在那里，”他说。 “老实说，我甚至都不知道她是谁，但后来她在乔治亚州的竞选活动中发表了一个伟大的演讲来支持我。”那时，劳拉和埃里克已经在一起快八年了，所以唐纳德至少在他们的婚礼上见过她。但听起来好像他不知道她是谁，直到她在选举期间的一次竞选集会上说了一些关于他的好话。和往常一样，唐纳德的故事比真相更重要，因为真相很容易被牺牲，特别是如果一个谎言能让故事听起来更动听。

轮到玛丽安娜发言，她说：“我要感谢你们这次赶来为我们庆祝生日。自那天晚上弗雷迪把一碗土豆泥扔在唐纳德的头上以来，我们各自的人生都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那时他可真是一个臭小子。”每个熟悉土豆泥传奇故事的人都笑了——除了唐纳德，他紧抱着双臂听着，脸上带着愁眉苦脸，每次玛丽安娜提到这个故事时他都会这样。这让他不高兴，好像他还是那个七岁的男孩。他显然仍然感觉到当时屈辱的刺痛感。

追赶贾里德回来的堂兄小唐纳德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说话。他没有向我们的姑姑们敬酒，而是发表了一种竞选演说式的言论。“去年 11 月，美国人民看到

了一些特别的事，并投票支持了一位真正了解他们的总统。他们看到了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家庭，并认同了我们的价值观。”我瞥了一眼哥哥，翻了个白眼。

我和一位服务员打了个招呼。“可以再来点酒吗？”我问。

他拿着两瓶酒迅速返回，问我是否喜欢红酒或白酒。

“是的，请。”我说。

我们吃完甜点后，所有人都起来了。自我们进入椭圆办公室后仅过了两个小时，但用餐已经结束了，现在是时候离开了。从头到尾，我们在白宫待的时间是在我祖父母家过感恩节或圣诞节的时间的两倍，但仍然比两个星期后唐纳德与基德·洛克、莎拉·佩林、和特德·纽金特在一起的时间少。

有人建议我们每个人都和唐纳德拍一张单独的照片（尽管不是和贵宾一起）。轮到我了，唐纳德对着镜头微笑并竖起大拇指，但我可以看到微笑背后的疲惫。看起来保持开朗让他感觉到累了。

“别让他们打倒你，”当我哥哥拍照片时，我对他说。不久之前，他的第一位国家安全顾问已经因丑闻辞职，他总统生涯中的裂痕开始显现。

唐纳德撅起下巴，咬紧牙关，一时间看上去就像我祖母的鬼魂。“他们不会打倒我的。”他说。

————

2015 年 6 月 16 日，当唐纳德宣布竞选总统时，我并没有认真对待。我觉得唐纳德不是认真的。他只是想免费宣传自己的品牌。他以前做过那种事。当他的民调数字开始上升，而且他可能已经得到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心照不宣的保证，即俄罗斯将竭尽全力让选举朝着对他有利的方向发展时，获胜的吸引力就增强了。

“他就是个小丑，”有一次，在我们经常碰面的午餐上，我的姨妈玛丽安娜时说。“这永远不会发生。”

我同意。

我们谈论了他作为一个褪色的真人秀明星和失败商人的名声会如何给他的竞选带来厄运。“难道还有人相信他是白手起家这样的胡扯吗？他靠自己做了什么？”我问。

“好吧，”玛丽安娜说，就像撒哈拉沙漠一样干燥，“他已经破产五次了。”

当唐纳德开始处理阿片类药物危机，并利用我父亲的酗酒历史来美化他在戒酒方面的诚意，以显得更有同情心时，我们两个都很生气。

“他把你父亲的记忆用于政治目的，”玛丽安娜说，“这是一种罪过，尤其是弗雷迪本应该是家里的明星。”

我们本以为在唐纳德宣布演讲中公然的种族主义会是一个致命伤，但当小杰里·福尔韦尔和其他白人福音派教徒开始支持他时，我们打消了这个想法。自 50 年前皈依天主教以来，玛丽安娜一直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们到底是怎么了？”她说，“唐纳德唯一去教堂的时候就是摄像机在那里的时候。这是不可思议。他没有原则。没有任何原则！”

从他贬低美国历史上最有资格的总统候选人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为“肮脏的女人”，到他对《纽约时报》残疾记者塞尔日·科瓦列斯基的嘲笑——唐纳德在竞选期间的言论无一偏离我对他的期望。事实上，我想起了每一个我所参加的家庭聚餐，唐纳德都在谈论那些他认为又丑又胖的懒女人或男人，他把那些通常更有成就或更有权势的男人称为失败者，而我的祖父和玛丽安娜、伊丽莎白和罗伯特都笑着加入进来。在特朗普的餐桌上，这种随意侮辱是家常便饭。使我吃惊的是他一直逍遥法外。

然后他收到了提名。我认为会使他失去资格的事情，似乎反而加强了他对基层选民的吸引力。我仍然不担心——我相信他永远不会当选——但一想到他有机会当选，我就感到不安。

2016 年夏末，我考虑过说出我知道的唐纳德完全不合格的地方。到目前为止，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和他呼吁“第二修正案支持者”阻止希拉里·克林顿的行动中，他相对都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就连他对克孜尔·汗和加扎拉·汗这对“金星父母”（他们的儿子霍默恩是一名美国陆军上尉，死于伊拉克）的攻击，似乎也无关紧要。在《走进好莱坞》的录音公布后，当接受民意调查的大多数共和党人仍然支持他时，我知道我做出了正确的决定。

我开始觉得我好像在观看我的家族史，唐纳德在其中扮演的核心角色正在更大规模的舞台上上演。就像我父亲一直以来所做的那样，人们对唐纳德的竞选对手提出了更高的标准，而他却继续逍遥法外，甚至因为越来越粗鲁、不负责任和卑鄙的行为——而得到了回报。这种事不可能再发生了，我想。但它确实发生了。

媒体没有注意到，除了他的孩子、女婿和现任妻子，唐纳德的家人在整个竞选期间都没有说过一句支持他的话。玛丽安娜告诉我，她很幸运，因为作为一名联邦法官，她需要保持客观。考虑到她作为特朗普妹妹的身份和她的职业声誉，她可能是这个国家唯一的人，一旦公开表示特朗普完全不适合担任总统，可能会产生巨大影响。但她也有自己的秘密要保守，当她在选举后告诉我，她投票给她哥哥是出于“对家族的忠诚”时，我并不完全感到惊讶。

在特朗普家族长大，尤其是作为弗雷迪的孩子，面临着一定的挑战。在某些方面，我是非常幸运的。我上的是一流的私立学校，在我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有一流的医疗保险保障。然而，除了唐纳德，我们所有人都有一种内在的匮乏感。我的祖父 1999 年去世后，我得知遗嘱中删除了我父亲的血统，就好像弗雷德·特朗普的长子从未存在过一样，于是一场官司接踵而至。最后，我得出结论，如果我公开谈论我的叔叔，我就会被描绘成一个不满的、被剥夺继承权的侄女，想要兑现或秋后算账。

————

为了理解是什么让唐纳德——和我们所有人——走到这一步，我们需要从我祖父和他自己对认可的需求开始，这种需求促使他鼓励唐纳德不计后果的夸张，以及隐藏着唐纳德病态弱点和不安全感的那种不劳而获的自信。

随着唐纳德的成长，他被迫成为了自己的啦啦队长，首先，因为他需要父亲相信他是一个比弗雷迪更好、更自信的儿子；其次，因为弗雷德要求他这么做；最后，因为他开始相信自己的大肆宣传，尽管他自相矛盾地从一个很深的层面上怀疑了别人不曾怀疑过的东西。到大选时，唐纳德用愤怒来应对任何对其优越感的挑战，他的恐惧和弱点被有效地掩盖了，他甚至不需要承认它们的存在。他永远也不会。

20 世纪 70 年代，在我的祖父多年来一直喜欢和宣传唐纳德之后，纽约媒体接过了接力棒，开始大肆宣传唐纳德那些未经证实的炒作。20 世纪 80 年代，银行也加入进来，开始为他的企业提供资金。他们愿意（然后是他们的需要）扶植特朗普越来越毫无根据的成功主张，寄望于弥补他们的损失。

在过去的十年里，唐纳德苦苦挣扎，被破产拖垮，不得不面对从牛排到伏特加等一系列产品的失败，电视制片人马克·伯内特给了他又一次机会。《学徒》

利用了唐纳德傲慢、白手起家的交易者形象，这是我祖父在 50 年前创造的神话，而令人惊讶的是，尽管有大量证据证明这一神话是错误的，但它却几乎毫发无损地延续到了新千年。到 2015 年唐纳德宣布竞选共和党提名时，已经有相当大比例的美国人准备好了相信这个神话。

时至今日，共和党和白人福音派基督徒一直在用谎言、歪曲和捏造来证明我的叔叔是谁。那些更了解情况的人，比如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真正的信徒，如众议员凯文·麦卡锡、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和司法部长威廉·巴尔；还有不计其数的人不知不觉地成为了他们的帮凶。

————

特朗普的兄弟姐妹无一幸免于我祖父的反社会症和我祖母的身体和心理疾病，但我的叔叔唐纳德和父亲弗雷迪遭受的痛苦比其他人更多。为了全面了解唐纳德的情况，他的精神病理，以及他不正常行为的意义，我们需要回顾一个完整的家族史。

在过去的三年里，我看到无数的专家、空谈心理学家和记者一直都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他们使用“恶性自恋”和“自恋型人格障碍”这样的词汇，试图解释唐纳德经常怪异和自我挫败的行为。我对于称唐纳德为自恋狂没有疑问——他符合《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5）中列出的所有 9 项标准——但这个标签对我们的影响有限。

我在德纳高级心理研究所获得了临床心理学的博士学位，在做论文研究的同时，我花了一年的时间在曼哈顿精神病中心的住院病房工作，这是一个州立机构，我们在那里诊断、评估和治疗一些病情最严重、最脆弱的病人。除了教授研究生心理学（包括创伤学、精神病理学和发展心理学），我还在一家戒毒社区诊所为病人提供治疗和心理测试。

这些经历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诊断并不是凭空而来的。唐纳德还有其他我们不知道的症状吗？是否还有其他疾病也有同样或更强的解释力呢？也许吧。他也符合反社会人格障碍的标准，其最严重的形式通常被认为是社会病态，但也可以指长期犯罪、傲慢和漠视他人权利。他有疾病吗？可能。唐纳德可能也符合一些依赖型人格障碍的标准，其特征包括不能做出决定或承担责任，对独处感到不适，以及为了获得他人的支持而过度努力。还有其他需要考虑的因素吗？绝对的。

他可能患有长期未确诊的学习障碍，几十年来一直影响他处理信息的能力。此外，据称他每天喝 12 瓶以上的健怡可乐，睡眠也很少。他是否患有某种物质（这里指咖啡因）引起的睡眠障碍？他有一个可怕的饮食习惯，也不运动，这可能导致或加剧其他可能的失调。

事实是，唐纳德的病症非常复杂，他的行为也常常令人费解，要想做出准确而全面的诊断，需要进行一系列的心理和神经心理测试，而这些测试他永远都不会接受。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评估他的日常运作，因为在西翼，他基本上是被制度化的。唐纳德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制度化的，所以我们无法知道他在现实世界里会如何茁壮成长，甚至生存下去。

————

2017 年，在我姨妈的生日派对结束时，我们排队照相时，我看到唐纳德已经处于一种他从未经历过的压力之下。在过去的三年里，随着他所承受的压力不断加大，治理国家所需的能力与其无能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他的妄自尊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暴露无遗。

到目前为止，由于经济稳定、没有出现严重危机，许多人（但绝不是我们所有人）一直没有受到其病态的最严重影响。但是，失控的 COVID-19 大流行、经济萧条的可能性、由于唐纳德喜欢分裂而加深的政治分歧、以及对我们国家未来毁灭性的不确定性，已经造成了一场完美的灾难风暴，没有人比我的叔叔更不具备应对这些灾难的能力。这样做需要勇气、性格的力量、对专家的尊重、承担责任的信心以及承认错误后改正错误的信心。他通过撒谎、打马虎眼和迷惑来控制不利局面的能力在我们目前面临的悲剧中已经减弱到了无能为力的地步。他对当前这场灾难恶劣且可以说是故意的错误处理，导致了他以前从未经历过的抵制和审视，这增加了他的好斗性和实施小报复的需求，他保留了至关重要的资金、个人防护装备和呼吸机，那些没有充分拍他马屁的州长所在州的人民交的税款为此买了单。

1994 年改编自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雪莱小说的电影《科学怪人》中，弗兰肯斯坦的怪物说：“我知道，为了一个活着的人的同情，我会和所有人讲和。我的爱是你难以想象的，我的爱是你无法相信的。如果我不能满足一个，我就放纵另一个。”引用了这句话后，查尔斯·皮尔斯在《时尚先生》上写道，“（唐

纳德）不会因为怀疑自己在周围创造了什么而困扰自己。他为他的怪物感到骄傲。他以它的愤怒和毁灭为荣耀，虽然他无法想象它的爱，但他全心相信它的狂怒。他是没有良心的弗兰肯斯坦。”

这句话用在唐纳德的父亲弗雷德身上会更准确，因为有一个关键的区别：弗雷德的怪物——他唯一在乎的孩子——最终会因为弗雷德对他的偏爱而变得不可爱。到最后，对唐纳德的爱将变得毫无意义，只有他对爱的痛苦渴望。如果任由这种愤怒继续增长，最终它将盖过其他一切。

————

当唐纳德的长期“守门人”罗娜•格拉夫向我和我女儿发出邀请，邀请我们参加唐纳德在纽约举行的大选之夜派对时，我拒绝了。当克林顿获胜的消息宣布时，我无法抑制自己的兴奋，我也不想显得无礼。第二天早上五点，就在相反的结果公布几个小时后，我在自己的房子里走来走去，和许多人一样受到了精神创伤，但是以一种更个人化的方式：就好像 62979636 名选民选择了把这个国家变成我那个不正常的恶性家庭的宏观版本。

在大选后的一个月里，我发现自己总是不由自主地看新闻、查看推特信息，焦虑不安，无法专注于其他事情。尽管唐纳德的所作所为没有让我感到意外，但他开始对这个国家施加最恶劣影响的速度和音量——从在就职典礼上对着大规模人群撒谎，抱怨他受到了多么糟糕的待遇，到撤销环境保护，针对《平价医疗法案》以剥夺数百万人的平价医疗，以及颁布种族主义的穆斯林禁令——都让我不堪忍受。哪怕是最小的一件事——看到唐纳德的脸或者听到我自己的名字，这两件事每天都会发生几十次——都会让我回想起父亲在祖父的残忍和蔑视下枯萎并死去的那段时光。我失去他时，他才 42 岁，我才 16 岁。唐纳德的行为现在已成为美国的官方政策影响着数百万人，这一事实加剧了我对他残忍行为的恐惧。

我祖父在特朗普家族营造的分裂氛围，唐纳德在其中如鱼得水，分裂持续让他受益，却损害了其他人的利益。它让这个国家疲惫不堪，就像它曾经让我的父亲疲惫不堪一样，它改变了我们，却没有改变唐纳德。它削弱了我们善良或相信宽恕的能力，这些概念对他来说从来没有任何意义。他的政府和他的政党已经被他的不满和权利政治所淹没。更糟的是，唐纳德对历史、宪法原则、地缘政治、外交（或者其他任何东西，真的）一窍不通，也从来没有被逼着去展示这些知识，

却像他父亲教他的那样，通过金钱的棱镜来评估这个国家所有的联盟和我们所有的社会项目。治理的成本和收益纯粹是从金融角度来考虑的，就好像美国财政部是他的个人存钱罐一般。对他来说，出去的每一美元都是损失，节省的每一美元都是收益。在肮脏的财富中，一个人，利用一切权力杠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可以使他自己，也可以有条件地使他的直系亲属、他的密友和他的马屁精受益；而对于其他人，钱永远都不够用，这正是我祖父管理我们家的方式。

在过去的 50 年里，唐纳德获得了所有的关注和报道，但他却很少受到审视，这是不寻常的。尽管人们都在拿他的性格缺陷和反常行为做评论和开玩笑，但人们很少去理解他为什么会成为现在的他，以及他为什么在明显缺乏健康的情况下总是失败。

从某种意义上说，唐纳德一直是被制度化的，不受他的个人局限，也不受他在这个世界上取得成功的需要。从来没有人要求他诚实地工作，而且无论他失败得多么严重，他都能得到几乎难以估量的回报。他继续受到保护，避免自己在白宫遭遇灾难，忠诚分子为他的每一项声明鼓掌或者通过将其正常化来掩盖他可能犯下的过失，以至于我们对不断累积的罪行几乎麻木了。但现在的风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了；它们真的生死攸关。与他生命中的任何一次情况不同，唐纳德的失败不能被继续隐藏或忽视了，因为它们威胁着我们所有人。

虽然我的姨妈和叔叔们不这么认为，但我写这本书不是为了赚钱或出于报复的愿望。如果其中任何一个是我的本意，多年前我就会写一本关于我们家族的书籍了，当时我们根本无法预料唐纳德会利用他作为一个连续破产的商人和无关的真人秀主持人形象入主白宫；当时我的叔叔没有处于能够威胁和危及举报者和批评者的地位，所以这本来会更安全。然而，最近三年发生的事情迫使我采取行动，我不能再保持沉默了。到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成千上万美国人的生命将被牺牲在唐纳德的狂妄自大和刻意无知的祭坛上。如果他获得第二个任期，这将是美国民主的终结。

没有人知道唐纳德是如何成为一个比他的家人更好的人的。不幸的是，几乎所有人都是出于忠诚或恐惧而保持沉默。我没有被这些阻碍。除了作为我父亲的女儿和我叔叔唯一的侄女所能提供的第一手资料，我还有一个受过训练的临床心

理学家的视角。《过多和永匮》是世界上最引人注目和最有权势的家族的故事。我是唯一一个愿意说出来的特郎普家族成员。

我希望这本书不再提及唐纳德的“战略”或“议程”，就好像他是根据任何组织原则来运作似得。他没有。唐纳德的自我一直是他和现实世界之间的一道脆弱而不充分的屏障，由于父亲的金钱和权力，他从不需要独自谈判。唐纳德总是需要延续我祖父的虚构故事，他说他强壮、聪明，在其他方面也不平凡，因为面对事实——他根本不像他所说的这样——对他来说太可怕了。

唐纳德以我祖父为榜样，凭借其兄弟姐妹们的同谋、沉默和不作为，毁灭了我父亲。而我不能再让他毁掉我的国家。

第一部分 残忍是关键

第一章 房子

“爸爸，妈妈在流血！”

他们住在“房子”里，这是我祖父母家，但是还不到一年的时间，仍然有些陌生，尤其是半夜，所以当 12 岁的玛丽安娜发现她母亲昏迷不醒地躺在楼上的一间浴室里时——不是主浴室，而是她和她姐姐共用的浴室——她已经不知所措了。浴室的地板上到处都是血。玛丽安娜的恐惧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她克服了平时不愿去她父亲卧室打扰她父亲的心理，选择飞奔到房子的另一头去叫醒他。

弗雷德下了床，快步走到大厅，发现他的妻子已经没有反应了。玛丽安娜跟在他的身后，他冲回他的卧室，拿起里面的电话分机，并拨打了一个电话。

弗雷德已经是牙买加医院的大人物了，弗雷德立即联系上了能派救护车到那所房子的人，并确保当他们到达急救室时，最好的医生都在等着他们。弗雷德尽力向电话另一端的人解释了情况。玛丽安娜听到他说“月经”，这是从她父亲嘴里说出的一个陌生词汇，听起来很奇怪。

在玛丽抵达医院后不久，医生发现，在罗伯特 9 个月前出生后，严重的产后并发症并没有被诊断出来，于是玛丽接受了紧急子宫切除术。这一手术导致了腹部感染，并引发了进一步的并发症。

在弗雷德经常呆的图书馆电话桌旁，他和玛丽的一位医生简短地聊了几句，然后挂断电话，叫玛丽安娜和他一起去。

“他们告诉我，你妈妈撑不过今晚了，”他对女儿说。

过了一会儿，他要去医院陪妻子，他对女儿说：“明天你去上学。如果有任何变化，我会打电话给你。”

她明白了其中的含义：如果你妈妈死了，我会打电话给你。

玛丽安娜在自己的房间里哭了一夜，而她的弟弟妹妹们还在床上睡觉，没有意识到这场灾难。第二天，她怀着恐惧去上学。她父亲加入董事会的时候，她就开始在一所私立学校就读，学校的校长詹姆斯·迪克森博士从自习室出来接她。“我办公室有你的一个电话。”

玛丽安娜确信她的母亲已经去世了。走到校长办公室就像走到断头台一样。这个 12 岁的女孩所能想到的就是她即将成为四个孩子的代理母亲。

当她拿起电话时，她父亲只是说：“她会挺过去的。”

玛丽下周要再做两次手术，但她最终成功了。弗雷德在医院的帮助，使他妻子得到了最好的医生和最好的护理，可能挽救了她的生命。但复苏之路还很漫长。

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玛丽在医院里进进出出。这对她健康的长期影响是严重的。由于摘除卵巢和子宫，她最终患上了严重的骨质疏松症。摘除卵巢是一种常见的但经常是不必要的医疗程序。结果是，她经常因为不断变薄的骨头自发骨折而遭受剧痛。

————

如果我们幸运的话，在我们还是婴儿和蹒跚学步的时候，我们至少有一个能在情感上陪伴我们的父母，他们会始终如一地满足我们的需求，回应我们对关注的渴望。被拥抱和安慰，让我们的感觉得到确认，让我们的不安得到缓解，这些都是幼儿健康发展的关键。这种关注创造了一种安全感，最终使我们在探索周围的世界时不会有过度的恐惧或无法控制的焦虑，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至少可以依靠一个看护者的基本支持。

镜像，一个协调的父母反映过程，处理，然后把婴儿自己的感受反馈给婴儿的过程，是幼儿发展的另一个关键部分。如果没有镜像，孩子们就无法获得关于其大脑如何运作以及如何理解世界的关键信息。就像对主要看护者的安全依恋可以导致更高的情商一样，镜像是同理心的根源。

玛丽和弗雷德从一开始就是问题父母。我祖母很少对我谈及她自己的父母或童年，所以我只能靠推测，但她是十个孩子中最小的——她比老大小 21 岁，比老二小 4 岁——且她是在 20 世纪 10 年代早期的恶劣环境中长大的。无论是她自身的需求在年轻的时候没有得到充分的满足，还是因为其他的原因，她都是那种用她的孩子来安慰自己而不是反过去安慰他们的母亲。她会在自己方便的时候而不是他们需要她的时候照顾他们。她经常不稳定，需要帮助，容易自怜，逃避殉难，她经常把自己放在第一位。特别是当涉及到她的儿子们时，她表现得好像对他们无能为力。

在手术期间和手术后，玛丽的缺席——无论是在字面上还是在情感上——给她孩子们的生活造成了空白。尽管这对玛丽安娜、弗雷迪和伊丽莎白来说一定很艰难，但她们已经长大，能够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能够照顾好自己。但这对唐纳德和罗伯特的影响尤其可怕，他们分别只有两岁半和九个月大，是她的孩子中最脆弱的，尤其是在没有其他人来填补空白的情况下。住在家里的管家无疑被大量的家务所压倒。他们的祖母住在附近，为他们做饭，但她和她的儿子一样生硬，没有感情。玛丽安娜不上学的时候，照顾年幼孩子的大部分责任落到了她身上。（作为一个男孩，人们不会指望弗雷迪帮忙。）她给他们洗澡，让他们准备睡觉，但到了十二点，她能做的就只有这么多了。这五个孩子基本上没有母亲。

玛丽需要帮助，而弗雷德似乎没有任何情感需求。事实上，他是一个高功能反社会者。虽然不常见，但反社会病态并不罕见，折磨着多达 3%的人口。75%的确诊患者都是男性。反社会病态的症状包括缺乏同理心，容易说谎，对是非的漠视，虐待行为，以及对他人的权利缺乏兴趣。有一个反社会者作为父母，尤其是在周围没有其他人可以减轻其影响的情况下，几乎肯定会严重扰乱孩子对自己的理解、情绪调节以及与世界交往的方式。弗雷德的无情、冷漠和控制行为给她的婚姻带来了诸多问题，祖母对此无能为力。弗雷德缺乏真正的人情味，作为父亲和丈夫的刚性，以及他认为女人天生自卑的性别歧视主义，可能让玛丽感到无助。

由于玛丽受了伤，在情感上和身体上都缺席了，弗雷德理所当然地成为唯一可以照顾孩子的家长，但称他为看护人是错误的。他坚信，与年幼的孩子打交道不是他的工作，所以他坚持在特朗普管理公司每天工作 12 小时，每周工作 6 天，就好像他的孩子们可以自己照顾自己一样。他专注于对他来说重要的事情：他日益成功的生意，当时他正在开发的是布鲁克林两个大型住宅项目“海岸港”和“海滩港”，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项目。

再一次，在弗雷德缺乏关注的情况下，唐纳德和罗伯特可能处于最危险的境地。婴幼儿所表现出的所有行为都是依恋行为的一种形式，它寻求照顾者积极的、安慰的回应——用微笑引出微笑，用眼泪引出拥抱。即使在正常情况下，弗雷德也会认为任何这样的表达都是一种烦恼，但唐纳德和罗伯特可能更需要这些，因为他们想念他们的母亲，她的缺席让他们非常痛苦。然而，他们越难过，弗雷德

就越拒绝他们。他不喜欢别人对他提出要求，而孩子们的需求所引发的烦恼在特朗普家庭中形成了一种危险的紧张关系：这些小男孩的行为在生理上被是用来引发父母的抚慰和安慰反应，结果却在他们最脆弱的时候激起了父亲的愤怒或冷漠。对唐纳德和罗伯特来说，“需要”等同于羞辱、绝望和无望。因为弗雷德在家时不愿受到打扰，所以如果他的孩子们学会了这样或那样而不需要任何东西，那对他就有利了。

弗雷德的育儿方式实际上加剧了玛丽不在的负面影响。结果，他的孩子们不仅与世界隔绝，而且彼此隔绝。从那时起，兄弟姐妹们就越来越难以与他人团结一致，这也是弗雷迪的兄弟姐妹们最终让他失望的原因之一；支持他，甚至帮助他，都是冒着触怒父亲的危险。

当玛丽生病时，唐纳德最主要的安慰和人际关系来源突然从他身边消失了，不仅没有人帮助他理解这一情况，且弗雷德成了他唯一可以依靠的人。其实在母亲生病之前，唐纳德的需求就一直得不到满足，而他的父亲更是无法满足他。默认情况下，弗雷德会成为唐纳德的主要安慰来源，但他更有可能成为恐惧或拒绝的来源，这让唐纳德陷入了一个无法忍受的境地：完全依赖他的父亲，而他的父亲也可能是他的恐惧来源。

在某种意义上，虐待儿童是一种“太多”或“不够”的经历。在发育的关键阶段，唐纳德直接经历了与母亲失去联系的“不够”，这是一种深深的创伤。毫无预兆，他的需求得不到满足，他的恐惧和渴望也得不到缓解。唐纳德被母亲遗弃了至少一年，父亲不仅没能满足他的需求，也没能让他感到安全、被爱、被重视或被反映，他遭受的剥夺会给他的一生留下创伤。由此产生的性格特征——自恋、恃强凌弱、自大——最终引起了祖父的注意，但这并不能改善他之前的恐惧。随着年龄的增长，唐纳德受到了我祖父“太多”的间接影响——他目睹了在弗雷迪身上发生的事情，当时他受到了太多的关注、太多的期待，以及最明显的，太多的羞辱。

从一开始，弗雷德的利己主义就扭曲了他的优先事项。他对孩子的照顾，如上所述，只是反映了他自己的需要，而不是他们的需要。爱对他毫无意义，他不能同情他们的困境，这是反社会者的典型特征之一；他期望的只是服从，仅此而已。孩子们不会有这样的区分，他的孩子们相信他们的父亲爱他们，或者他们可

以通过某种方式赢得父亲的爱。但他们也知道，即使只是在无意识的层面上，他们体验到的父“爱”也是完全有条件的。

玛丽安娜、伊丽莎白和罗伯特，或多或少都经历过和唐纳德一样的待遇，因为弗雷德对孩子根本不感兴趣。他的大儿子和同名之子之所以受到弗雷德的关注，仅仅是因为他被培养成弗雷德遗产的继承人。

为了应付这种局面，唐纳德开始形成强大而原始的防御，其特征是对他人的敌意与日俱增，对母亲的缺席和父亲的忽视似乎变得漠不关心。随着时间的推移，后者变成了一种习得性无助，因为虽然他安然度过了对他影响最糟糕的痛苦，但这也使得他的任何情感需求都很难得到满足（从长远来看，我认为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太擅长表现得好像他没有任何情感需求。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不满和行为——包括欺凌、不尊重和攻击性——它们在当时起到了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如果有适当的小心和注意，它们可能已经被克服了。不幸的是，对唐纳德和这个星球上的其他人来说，这些行为变成了性格特征，因为弗雷德一旦开始注意到他吵闹而难相处的第二个儿子，他也就开始重视这些行为。换句话说，弗雷德·特朗普开始认可、鼓励和支持唐纳德身上那些让他从本质上变得不可爱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弗雷德虐待的直接结果。

————

玛丽一直没有完全康复。她从一开始的坐立不安，后来成了失眠症患者。大一点的孩子们会发现她像一个无声的幽灵一样整天在屋子里转来转去。有一次，弗雷迪发现她半夜里站在梯子顶上粉刷走廊。早晨，她的孩子们有时会发现她在意想不到的地方不省人事；不止一次，她都不得不去医院。这种行为成为了家里生活的一部分。玛丽身体上受到的伤害得到了救治，但潜在的心理问题却没有获得任何帮助，这些问题使她陷入了危险境地。

除了妻子偶尔受伤，弗雷德对这些一无所知，即使他意识到了，他也不会意识到自己这种特殊教育方式在当时和以后对孩子们的影响。就他而言，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他一直面临着财富和权力不足以解决他妻子濒死的健康危机。但最终玛丽的医疗挑战只是整个大计划中的一个小插曲。当她的病情好转，而他的“海岸港”和“海滩港”房地产开发项目——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功——接近完工时，一切似乎又一次朝着有利于弗雷德的方向发展。

————

当 8 岁的弗雷迪·特朗普问他怀孕的母亲为什么会这么胖时，餐桌上的谈话戛然而止。那是在 1948 年，现在由 4 个孩子组成的特朗普家庭——10 岁的玛丽安、弗雷迪，5 岁的伊丽莎白和 1 岁半的唐纳德——几周后就要搬进弗雷德正在建造的这栋 23 个房间的房子。玛丽低头看着她的盘子，而几乎每天都来家里拜访的弗雷德的母亲，名字也叫伊丽莎白，则停止了进食。

我祖父母家的餐桌礼仪非常严格，有些事情弗雷德是不能容忍的。“不要把手肘放在桌子上，这不是马厩”是被经常重复的一句话，而弗雷德手里拿着刀，就会用刀柄轻敲违规者的前臂。（当弗里茨、大卫和我长大一些时，罗伯特和唐纳德就满怀热情地接手了这项工作。）还有一些事情是孩子们不应该说的，尤其是在他们的父亲或祖母面前。当弗雷迪想知道婴儿是怎么到这儿来的时候，弗雷德和他的母亲站了起来，一言不发地离开了餐桌。弗雷德不是一个拘谨的人，但伊丽莎白很可能是个拘谨、讲究礼仪的女人，她恪守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规范。

尽管她自己对性别角色的看法很顽固，但是，多年前她曾为儿子破例；弗雷德的父亲突然去世两年后，伊丽莎白就成了她 15 岁儿子的生意伙伴。

这之所以成为可能，部分是因为她的丈夫弗里德里希·特朗普是一名企业家，他留下了价值约 30 万美元的财富和财产。

弗里德里希出生在德国西部的一个小村庄卡尔施塔特，1885 年他满 18 岁时，为了避免服兵役而前往美国。最终，他通过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经营餐馆和妓院而赚了大部分钱。他匆匆前往育空地区，赶上了淘金热，并在世纪之交的繁荣崩溃前夕套现。

1901 年，弗里德里希在德国探亲时，遇到了比他小近 12 岁的金发娇小女子伊丽莎白·克里斯特，并娶了她为妻。他把他的新娘带到纽约，但在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一个月后（他们给这个女孩取名伊丽莎白），这对夫妇回到德国，打算在那里永久定居。由于弗里德里希最初离开德国的情况，当局告诉他不能留下来。1905 年 7 月，弗里德里希和他的妻子——怀上了四个月的第二个孩子——以及他们两岁的女儿最后一次回到美国。他们的两个儿子弗雷德里克和约翰分别出生于 1905 年和 1907 年。他们最终在皇后区的伍德海文定居下来，在那里三个孩子都是讲德语长大的。

当弗里德里希死于西班牙流感时，12 岁的弗雷德一夜成为家里的男人。尽管她丈夫的财产很庞大，伊丽莎白还是觉得入不敷出。流感疫情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了 5000 万人死亡，对本该蓬勃发展的战时经济造成了不稳定的影响。上高中时，为了在经济上帮助母亲，弗雷德打了一系列零工，并开始学习建筑行业。从他记事起，成为一名建筑者就是他的梦想。他利用一切机会学习这门生意，它的各个方面都引起了他的兴趣。在大二的时候，在他母亲的支持下，他开始在他的社区建造和销售车库。他意识到自己十分擅长这个，从那时起，他就没有了其他的兴趣——再也没有了。弗雷德高中毕业两年后，伊丽莎白创办了“伊丽莎白·特朗普与其子（Elizabeth Trump and Son）”公司。她认识到儿子的才能，于是她就用生意来养活儿子，这生意使她能够为她还未成年的孩子处理金融交易——在 20 世纪早期，人们直到 21 岁才达到法定年龄——这是她支持他的方式。生意和家族都兴旺起来了。

弗雷德 25 岁时，在一次舞会上遇到了玛丽·安妮·麦克劳德，她刚从苏格兰回来。根据家族传说，当他回到家，他就告诉他的母亲，他遇到了他想要结婚的女孩。

1912 年，玛丽出生在离苏格兰西北海岸 40 英里的外赫布里底群岛刘易斯岛上的唐村，是家中 10 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她的童年被两场全球性的悲剧所笼罩，后者也深深影响了她未来的丈夫：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西班牙流感。刘易斯岛在战争中失去了大量的男性人口，在残酷的命运转折中，在 1918 年 11 月停战协议签署两个月后，1919 年 1 月 1 日凌晨，一艘从大陆运来士兵的船在离海岸几码远的地方撞上了岩石。船上约 280 名士兵中，有 200 多名士兵死在冰冷刺骨的海水中，距离安全的斯托诺威港不到一英里。岛上大部分年轻的成年男性人口都消失了。在这里，任何希望找到丈夫的年轻女性的运气都糟糕透了。

玛丽是六个女儿中的一个，她被鼓励去往美国，那里的机会更多，男人也更多。

1930 年 5 月初，在一个典型的“连锁移民”案例中，玛丽登上了皇家邮轮特兰西瓦尼亚号，与她已经在美国定居的两个姐妹会合。尽管玛丽的身份是一名家仆，但作为一名白种盎格鲁-撒克逊人，即使在她儿子近 90 年后出台的严厉新

移民规定下，她也可以进入美国。她在到达纽约的前一天就满 18 岁了，不久之后她遇到了弗雷德。

弗雷德和玛丽在 1936 年 1 月的一个星期六结了婚。在曼哈顿卡莱尔酒店的婚宴结束后，他们在大西洋城度了一夜蜜月。周一早上，弗雷德回到了他在布鲁克林的办公室。

这对夫妇搬进了他们在韦汉路的第一所房子，就在德文郡路弗雷德和他母亲住过的那所房子的沿街而下。早年，玛丽仍然对她在经济和社会上的惊人财富变化感到敬畏。她不是家仆，而是拥有家仆；她不用争夺有限的资源，而是家里的女主人。她有自由的时间去做志愿者，也有钱去购物，所以她从不回顾过往，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她能很快地评判那些来自类似环境的人。她和弗雷德过着一种完全传统的生活，夫妻俩的角色都被严格设定好了。他经营他的生意，在布鲁克林每天工作 10 个小时，有时 12 个小时，一周工作 6 天。她管理着房子，而他统治着房子——至少在一开始是这样，他的母亲也是如此。伊丽莎白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婆婆，在她儿子结婚的头几年里，她要确保玛丽明白谁才是真正的掌权者：她拜访玛丽时戴着白手套，提醒玛丽注意她对儿媳家务的期望，这一定是对她最近工作的公然嘲弄。

尽管受到了伊丽莎白欺辱，但对弗雷德和玛丽来说，早年的时光充满了活力和希望。弗雷德在上班的路上吹着口哨走下楼梯，晚上回家时，他吹着口哨上楼到他的房间，他在晚饭前会换上一件干净的衬衫。

玛丽和弗雷德没有讨论过给孩子取什么名字，所以当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他们的女儿出生时，他们把玛丽的名和中间名合了起来，给她取名叫玛丽安娜。一年半后，也就是 1938 年 10 月 14 日，这对夫妇的第一个儿子出生了，并以他父亲的名字命名——只有一个小小的变化：老弗雷德的中间名是克里斯特；他的儿子则被命名为弗雷德里克·克里斯特。除了他父亲，大家都叫他弗雷迪。

似乎弗雷德在他儿子出生前就为他的未来做了规划。虽然随着年龄的增长，弗雷迪会感受到期望的负担，但是弗雷迪很早就从他的地位中受益，而玛丽安娜和其他孩子则不会。毕竟，他在他父亲的计划中拥有一个特殊的位置：他将成为特朗普帝国持续扩张和繁荣的工具。

三年半过去了，玛丽又生了一个孩子。在伊丽莎白到来前不久，弗雷德离开了很长一段时间，在弗吉尼亚海滩工作。二战退伍军人回国导致的住房短缺，为他创造了一个为海军人员及其家属建造公寓的机会。弗雷德有时间磨砺自己的技能，赢得这份工作的声誉，因为当其他合格的人都入伍时，他却选择了追随他父亲的脚步不服兵役。

通过建造许多房屋而不断增长的经验，以及利用当地媒体达到自己目的的天生技能，弗雷德被介绍给了人脉广泛的政客，并从他们那里学会了如何在合适的时间争取支持，以及最重要的是，争取政府的资金。弗雷德在弗吉尼亚海滩学会了利用政府资助建立自己的房地产帝国优势，这里的吸引力在于联邦住房管理局（FHA）提供的慷慨资金。联邦住房管理局由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于 1934 年创立，而当弗雷德开始利用它的慷慨时，它就似乎已经远远偏离了最初的使命。它的主要目的是确保为该国不断增长的人口建造足够的经济适用房。二战后，联邦住房管理局似乎同样关照弗雷德·特朗普这样的富商。

维吉尼亚的这个项目也是一个磨练他在布鲁克林就获得的专业技能的机会：尽可能快速、高效、廉价地建造大型项目，同时还要能吸引租客。当往返皇后区的交通变得太不方便时，弗雷德就把全家搬到了弗吉尼亚海滩，当时伊丽莎白还是个婴儿。

从玛丽的角度来看，除了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陌生的环境之外，弗吉尼亚的情况与牙买加庄园的情况基本相同。弗雷德工作时间很长，留下她一个人照顾三个不到六岁的孩子。他们的社交生活围绕着他的同事或需要他服务的人展开。1944 年，联邦住房管理局为弗雷德项目提供的资金枯竭，弗雷德一家回到了纽约。

回到牙买加庄园后，玛丽遭遇了一次流产，这是一次严重的医疗事故，几个月后才完全康复。医生警告她不要再怀孕，但一年后玛丽发现自己又怀孕了。这次流产造成了较大的年龄差距，伊丽莎白位于中间，比她两个最亲密的兄弟姐妹小或大近四岁。玛丽安娜和弗雷迪则比最小的孩子大得多，他们几乎是属于两代人。

唐纳德是这对夫妇的第四个孩子，也是第二个儿子。他出生于 1946 年，当时弗雷德开始计划建造自己的新家。他买了一块半英亩的地，就在韦汉路住宅后

面的一座山上，可以俯瞰米德兰公园路，米德兰公园路是一条宽阔的林荫大道，贯穿了整个社区。当孩子们得知搬家即将到来时，他们开玩笑说他们不需要租搬家卡车；他们只要把随身物品滚下山就行了。

这栋房子占地四千多平方英尺，是该街区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住宅，但与该社区北部山区的许多豪宅相比，它还是更小、更不气派。房子建在一个高地的顶部，下午的时候，房子的阴影投射在从人行道通向前门的宽阔石板台阶上，前门是我们只在特殊场合才使用的入口。草坪上的骑手雕塑让人想起了种族歧视的吉姆·克劳时代，它们先是被漆成粉红色，然后被鲜花取代。前门山墙上的假盾形纹章则被保留了下来。

虽然皇后区最终会成为地球上最多样化的地方之一，但在 20 世纪 40 年代，我祖父买下了那块地，建起了那座壮观的带有 20 英尺高柱子的乔治王朝殖民时期红砖建筑时，这个区 95%都是白人。牙买加庄园社区中上层的白人比例甚至更高。20 世纪 50 年代，当第一个意大利裔美国家庭搬到这个社区时，弗雷德感到非常震惊。

1947 年，弗雷德开始着手他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一个大型项目：海岸港，这是布鲁克林本森赫斯特拟建的一个综合建筑群，包括 32 幢六层建筑和一个占地 30 多英亩的购物中心。这一次吸引人的是联邦住房管理局直接付给弗雷德的 900 万美元资金，就像唐纳德后来利用市和州给他的慷慨减税一样。弗雷德之前曾把租住这 2201 套公寓的人形容为“不健康的人”，意思是正直的人只会住在他早期的建筑专长——独户住宅里。但是 900 万美元是很有说服力的。大约在那个时候，当了解到弗雷德的财富只会继续增长时，他和母亲为他的孩子们设立了信托基金，以保护这些钱不被征税。

尽管弗雷德在家里和办公室里都是一个铁腕独裁者，但他在接近更有权势、人脉更广的人并向他们卑躬屈膝方面已经成为专家。我不知道他是如何获得这项技能的，但他后来把它传给了唐纳德。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与布鲁克林民主党、纽约州政治机器以及联邦政府的领导人建立了联系，其中许多人都是房地产行业的主要参与者。如果获得资金意味着要讨好控制着联邦住宅管理局钱袋的当地政客，那就这样吧。他加入了长岛南岸的一个高级海滩俱乐部，后来，他又去了北山乡村俱乐部，他认为这两家俱乐部都是极好的娱乐场所，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并与那些最有可能为他输送政府资金的人接触，就像唐纳德在 20 世纪 70 年代在纽约的乐雅会以及世界各地的高尔夫俱乐部所做的那样。

正如唐纳德后来被指在涉及到特朗普大厦和他在大西洋城的赌场时的所作所为一样，据说弗雷德为了维持和平也与黑帮进行了秘密合作。当他为另一个开发项目——“海滩港”开了绿灯时，这个位于康尼岛、占地 40 英亩、有 23 栋建筑的综合体将为他带来 1600 万美元的联邦住房管理局资金——显然，他利用纳税人的钱进行开发的策略是成功的。

尽管弗雷德的生意是建立在政府融资基础之上的，但他憎恶纳税，并尽其一切努力来避免纳税。在帝国扩张的巅峰时期，他从未花过一分钱，也从未欠下债务，而他的儿子们也从未欠过债。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形成的稀缺心态的束缚，弗雷德自由而清晰地拥有了他的财产。他的公司从租金中获得了巨大利润。谈到他的净资产，弗雷德的孩子们说他“一毛不拔”，过着相对朴素的生活。尽管有钢琴课和私人夏令营——这是他对像他这样地位的人应做之事的理解——他两个最大的孩子依旧是在“白人穷人”的感觉中长大的。玛丽安娜和弗雷迪步行 15 分钟到 131 公立学校，当他们想要进入“城市”（就像每个住在纽约外围行政区的人所指的曼哈顿），他们从 169 街乘地铁。当然，他们并不贫穷——除了在父亲死后的早期挣扎，弗雷德也从不贫穷。

弗雷德的财富使他有机会居住在任何地方，但他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离他长大之处不到 20 分钟的地方度过。除了新婚初期和玛丽在古巴度过的几个周末，他从未离开过这个国家。完成弗吉尼亚的项目后，他甚至很少离开纽约市。

他的商业帝国虽然庞大且利润丰厚，但同样很狭隘。他拥有的建筑数量超过了 40 多座，但这些建筑本身的楼层相对较少，而且都是统一的实用楼。他的资产几乎全部保留在布鲁克林和皇后区。在他看来，曼哈顿的浮华、魅力和多样性令人感觉就像生活在另一个大陆上一样，在早年，它似乎遥不可及。

而当他们搬进这栋房子的时候，邻居们都知道弗雷德·特朗普是谁了，玛丽也欣然接受了自己作为一个富有、有影响力的商人之妻的角色。她积极参与慈善工作，包括在牙买加医院的妇女辅助医院和牙买加日间托儿所工作，主持午餐会，参加正式的筹款活动。

无论这对夫妇多么成功，对于弗雷德和玛丽来说，他们的愿望和本能之间都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在玛丽的例子中，这很可能是由于缺乏童年的结果，而在弗雷德的例子中则是由于大量的生命损失，包括他父亲在西班牙流感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遭遇，以及他父亲去世后其家庭所经历的经济不稳定。尽管特朗普管理公司每年都会给弗雷德带来数百万美元的收入，但弗雷德还是忍不住会去捡起没用过的钉子，或者逆向设计一种更便宜的杀虫剂。尽管玛丽很容易接受她的新身份以及随之而来的额外津贴，包括一个住在家里的管家，但她大部分时间都会呆在家里，缝纫、做饭和洗衣服。他们似乎都不知道如何调和他们可能拥有的和他们实际允许的。

————

弗雷德虽然节俭，但并不谦逊。在他职业生涯的早期，他谎报了自己的年龄，以便显得更成熟。他有一种表演癖好，他经常使用夸张的语言——一切都是“伟大的”、“奇妙的”和“完美的”。他在当地报纸上铺天盖地地发布了有关其新完成住宅的新闻稿，并接受了无数次采访，称赞其房产的优点。他在布鲁克林南部贴满了广告，还雇了一艘载满广告的驳船，让它在海岸线附近漂浮。但是，他在这方面远没有唐纳德之后做得好。他可以应付一对一的互动，也可以讨好那些与他有政治关系的上层人士，但在一大群人面前讲话或接受电视采访对他来说就不那么容易了。他参加了戴尔·卡耐基的公开演讲课程，但他实在是太差劲了，就连他平时很听话的孩子也拿这个开玩笑。就像有些人喜欢听广播一样，弗雷德也有一定程度的社交自信，但只适合在密室和印刷媒体中工作。这一事实对他后来以牺牲第一个儿子为代价支持第二个儿子起到了重要作用。

20 世纪 50 年代，当弗雷德在听说诺曼·文森特·皮尔的事迹时，皮尔关于自给自足的浅显信息极大地吸引了他。皮尔是曼哈顿市中心大理石教堂的牧师，他非常喜欢成功的商人。“做一个商人并不是赚钱，”他写道。“做一个商人就是为人民服务。”皮尔是个江湖骗子，但他领导着一个富有而强大的教会，他还有一个消息要兜售。弗雷德不是一个爱读书的人，但他不可能不知道皮尔那本广受欢迎的畅销书《积极思考的力量》。这个头衔对弗雷德来说已经足够了，他决定加入大理石教堂，尽管他和他的家人都很少参加相关活动。

弗雷德对自己已经有了积极的态度和无限的信心。尽管他对他不感兴趣的人，如他的孩子的朋友，可能会严肃、正式或不屑一顾，但他很容易微笑，即使他告诉别人他或她很讨厌。而且他心情通常很好。他有理由这样做；他掌控着自己世界里的一切。除了父亲去世，他的生活相当顺利，家人和同事都给予了他很大的支持。从他早期建造车库开始，他的成功几乎就一直处于上升轨道上。他努力工作，但与大多数努力工作之人不同的是，他得到了政府拨款的奖励，来自与他关系密切的密友的几乎无限的帮助，以及巨大的财富。出于自己的目的，弗雷德不需要阅读《积极思考的力量》，就可以吸收皮尔的信息中最肤浅、最自私的一面。

皮尔的教义宣称，只要自信，你就能按照神要你行的道路成功。“障碍是不允许破坏你的幸福和安康的。只有当你愿意被打败时，你才会被打败。”皮尔写道。这个观点很好地证实了弗雷德的想法：他有钱是因为他应得的。“相信自己！对自己的能力有信心……自卑感和不足感会妨碍你实现希望，而自信使你实现自我和取得成功。”弗雷德的性格中没有自我怀疑，他也从来没有考虑过自己失败的可能性。正如皮尔所写的那样，“认识到有那么多可怜的人被一种通常被称为自卑情结的疾病所阻碍和折磨，这是令人震惊的。”

皮尔的原始成功福音实际上补充了弗雷德继续坚持的稀缺心态。对他来说，不是“你拥有的越多，你能给予的就越多。”而是“你拥有的越多，你拥有的越多。”经济价值和自我价值是一样的，金钱价值就是人的价值。弗雷德·特朗普拥有的越多，他自身的价值就越高。如果他给了别人一些东西，那个人的价值就会增加，而他自己的价值会减少。他肯定会把这种态度传给唐纳德。

第二章 第一个儿子

弗雷迪作为家中长子的身份，一开始保护他不受弗雷德作为父母最糟糕冲动的影响，后来变成了一个巨大而有压力的负担。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在父亲赋予他的责任和自然倾向的生活方式之间左右为难。弗雷德一点也不纠结：他的儿子应该花时间在 Z 大道的特朗普管理公司的办公室，而不是和朋友们去长岛海湾，在那里他学会了划船、钓鱼和滑水。在弗雷迪十几岁的时候，他就知道自己的未来，也知道父亲对他的期望。他也知道自己做得不够好。他的朋友们注意到，他们这位平时悠闲风趣的朋友，在弗雷德身边就会变得焦虑不安，弗雷德和他的朋友们称他为“老人”。弗雷德身强力壮，身高六英尺一英寸，他身材魁梧，头发从发际线向后梳得光溜溜的，除了一套剪裁考究的三件套西服外，很少穿别的衣服。他和孩子们在一起时很拘泥，很正式，他从不和孩子们打球，也不做任何游戏。

如果孩子们在地下室扔球，车库门打开的声音就足以让弗雷迪僵住。“停！我爸爸在家里。”弗雷德走进房间时，孩子们都会不由自主地站起来向他敬礼。

“这是什么？”他握着每个孩子的手问。

“没什么，爸爸，”弗雷迪说，“大家都准备走了。”

只要老人在家，弗雷迪就一直保持沉默和高度警惕。

在他十几岁的时候，弗雷迪开始向他的父亲隐瞒他在外面的生活，以避免他知道真相带给他的嘲笑和反对。他对他和朋友们放学后做的事撒了谎。他在吸烟这件事上撒了谎——这是玛丽安娜13岁时向12岁的他介绍的习惯——他告诉他父亲，他要去街角帮他最好的朋友比利·德雷克遛一条根本不存在的狗。例如，弗雷德不会发现弗雷迪和他在圣保罗学校的伙伴霍默偷了一辆灵车兜风。在把车送回殡仪馆之前，弗雷迪把车开到一个加油站去给油箱加油。当他下了车，走向水泵的时候，正躺在后面想看看水泵是什么样子的霍默突然坐了起来。在他们对面的水泵旁，一个男人以为他看到了一具死而复生的尸体，大声尖叫起来，弗雷迪和霍默开怀大笑。弗雷迪就是为这种恶作剧而活的，但他只有在他的父亲不在家的时候，才会用他的壮举来逗兄弟姐妹们开心。

对特朗普家族的一些孩子来说，撒谎是一种生活方式，而对弗雷德的大儿子来说，撒谎是一种防御——不像其他人那样，只是为了逃避父亲的反对或避免惩

罚，而是一种生存的方式。例如，玛丽安娜从不反对她的父亲，也许是出于害怕普通的惩罚，比如被禁足或被关进自己的房间。对唐纳德来说，说谎主要是一种自我膨胀的方式，目的是让别人相信他比实际上更好。对弗雷迪来说，与父亲作对的后果不仅在程度上不同，在性质上也不同，所以说谎成了他抵御父亲压制他天生幽默感、冒险精神和敏感性的唯一手段。

皮尔关于自卑情结的观点帮助弗雷德形成了对弗雷迪严厉的评价，同时也让他逃避了对任何一个孩子的责任。软弱也许是最大的罪过，弗雷德担心弗雷迪更像自己的哥哥，即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约翰：他软弱，尽管并非没有野心，但对错误的东西很感兴趣，比如工程学和物理学，弗雷德觉得这些东西深奥而不重要。弗雷迪十岁的时候，弗雷德一家搬进了这所房子，弗雷德决定要让他坚强起来。然而，像大多数并不注意自己要去哪里的人一样，他有些矫枉过正了。

“这太愚蠢了，”每当弗雷迪想要一只宠物或玩恶作剧时，弗雷德就会说。“你想干什么？”弗雷德说，声音里充满了轻蔑，这让弗雷德退缩了，而这只会让弗雷德更恼火。弗雷德讨厌他的大儿子搞砸事情，或者不能凭直觉知道他需要做什么，但他更讨厌的是，在被责备之后弗雷迪的道歉。“对不起，爸爸。”弗雷德嘲笑他。用弗雷德的话说，他希望自己的大儿子成为一个“杀手”（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在 20 世纪 50 年代，在科尼岛收房租并不是一项高风险工作），但他的性格却恰恰相反。

成为一名“杀手”其实就是刀枪不入的代名词。虽然弗雷德似乎对他父亲的死毫无感觉，但这突如其来的事还是让他吃了一惊，令他措手不及。多年后，当谈到这件事时，他说，“然后他死了。就这样死了。它只是看起来不真实。我没有那么心烦。你知道孩子们是怎样的。但我看到妈妈哭了，很难过。让我难过的是看到她这样难过，而不是我自己对所发生之事的感觉。”

换句话说，这一损失使他感到脆弱，但不是因为他自己的感觉，而是因为他母亲的感觉，他可能觉得这是强加在他身上的，尤其是他没有分享这种感觉。这种强迫肯定很痛苦。在那一刻，他不是宇宙的中心，这是不可接受的。自那以后，他也拒绝承认或觉得失落。（我从未听他或家里的其他人提起过我的曾祖父。）对弗雷德来说，他之所以能够继续前进，是因为他没有失去任何特别重要的东西。

正如弗雷德认同诺曼·文森特·皮尔关于人类弱点的观点一样，他并没有领会到，通过嘲笑和质疑弗雷迪，他在创造一种几乎不可避免的低自尊状态。弗雷德同时告诉他的儿子，他必须成为一个绝对成功的人，做他永远不可能做到的事。所以弗雷迪生活在一个只有惩罚而没有奖励的体系中。其他的孩子，尤其是唐纳德，都注意到了。

对唐纳德来说，情况有些不同。由于年龄相差 7 岁半，他有足够的时间从弗雷德羞辱他的哥哥以及弗雷迪的羞辱中学习。最简单地说，他得到的教训是，做弗雷迪那样的人是错误的：弗雷德不尊重他的长子，唐纳德也不尊重。弗雷德认为弗雷迪很虚弱，因此唐纳德也认为弗雷迪很虚弱。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两兄弟才以截然不同的方式来适应这一事实。

在任何家庭中发生的事情都是很难理解的——也许对家庭中的人来说是最难理解的。无论父母如何对待孩子，孩子几乎不可能相信父母有意伤害他们。弗雷迪更容易认为，他的父亲把儿子的利益放在心上，而他，弗雷迪，才是问题所在。换句话说，保护自己对父亲的爱比保护自己免受父亲的虐待更重要。唐纳德会从表面上看待父亲对哥哥的态度：“爸爸并不想伤害弗雷迪。他只是想教我们如何成为真正的男人。而弗雷迪失败了。”

相比于大声和暴力，虐待更多的时候可以是悄无声息的、阴险的，我的祖父不是一个身体暴力的人，甚至不是一个特别愤怒的人。他不必这样；他期望得到他想要的，而且几乎总是这样。让他愤怒的并不是他无法管好长子，而是弗雷迪并不是他想要的样子。弗雷德通过降低和贬低其人格和天赋的各个方面来瓦解他的大儿子，直到最后，弗雷迪只剩下自责和迫切取悦一个对他毫无用处的人。

唐纳德逃脱同样命运的唯一原因是，他的个性符合他父亲的目标。这就是反社会者所做的：他们拉拢他人并利用这些人达到自己的目的——无情而有效，不容忍异议或反抗。弗雷德也消灭了唐纳德，但不是像消灭弗莱迪那样消灭了他；相反，他剥夺了唐纳德发展和体验人类情感的全部能力。弗雷德限制了唐纳德接触自身的情感，让他无法感受其中的许多情感，从而扭曲了他儿子对世界的看法，损害了他在其中生活的能力。他成为自己而非扩展他父亲雄心壮志的能力，变得非常有限。当唐纳德进入学校时，这种限制的含义变得更加清晰。他父母和他的互动方式都不能帮助他理解自己的世界，这导致了他无法与他人相处，并在他和

兄弟姐妹之间也一直保持了一种“缓冲区”。对他来说，这也使得阅读社交线索变得极其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他至今仍存在的问题。

在理想的情况下，家里的规矩反映了社会的规矩，所以当孩子们走出家门，他们一般都知道该怎么做。当孩子们上学时，他们就会知道他们不应该拿其他孩子的玩具，他们不应该打或戏弄其他孩子。唐纳德一点也不理解这些，因为家里的规则，至少在男孩身上适用的规则——不惜一切代价要强硬，撒谎是可以的，承认自己错了或者道歉是软弱的——与他在学校里遇到的规则相冲突。弗雷德关于世界如何运行的基本信念——在生活中，只有一个赢家，其他人都是输家（这一理念从根本上阻碍了分享的能力），善良就是弱点——是显而易见的。唐纳德因为和弗雷迪一起经历过，知道如果不遵守父亲的规定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而且常常会受到公开的羞辱，所以即使在父亲的权限范围之外他也会继续遵守这些规定。毫不奇怪，他对“对”与“错”的理解会与大多数小学课程相冲突。

唐纳德日益增长的傲慢，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抵御被抛弃的感觉，也是他缺乏自尊的一剂解药，更是作为他日益加深的不安全感的保护伞。因此，他能够与大多数人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对他来说比较容易。家里的生活让所有的孩子都在某种程度上对情感感到不舒服——不是表达情感就是面对情感。对孩子们来说，情况可能更糟，因为对他们来说，人类感情的可接受范围极其狭窄。（在我的家庭中，我从未见过任何人哭泣或以任何方式表达对彼此的感情，除了通过握手来开始或结束彼此的接触。）与其他孩子或权威人物亲近可能感觉像是对父亲的危险背叛。然而，唐纳德自信的表现，他认为社会的规则并不适用于他，以及他对自我价值的夸张展示，的确吸引了一些人。许多少数群体仍然把他的傲慢和力量混为一谈，把他虚假的虚张声势和成就混为一谈，把他对这些事物表面的兴趣和领袖魅力混为一谈。

————

唐纳德很早就发现，要惹怒罗伯特，把他逼出极限是多么容易；这是一种他从未厌倦的游戏。没有人会这么做——罗伯特是如此的瘦削和安静，没有人会拿折磨他来开玩笑——但唐纳德却喜欢炫耀他的权力，即使是在比自己更年弱、更小、皮肤更薄的弟弟身上。有一次，由于沮丧和无助，罗伯特在他们家的浴室门

上踢了一个洞，这让他陷入了麻烦，尽管事实上是唐纳德逼他这么做的。当妈妈叫唐纳德停下来时，他没有；当玛丽安娜和弗雷迪叫他停下来时，他也没有。

有一年圣诞节，孩子们收到了三辆唐卡卡车，这很快就成了罗伯特最喜欢的玩具。唐纳德一发现这一点，就开始把它们藏起来，不让他的弟弟找到，并假装不知道它们在哪里。上一次发生这种情况时，罗伯特大发脾气，唐纳德威胁说，如果他不停止哭泣，就当着他的面把卡车拆掉。罗伯特迫不及待地想要救他的玩具，他跑到母亲身边。玛丽的解决办法是把卡车藏在阁楼里，有效地惩罚没有做错任何事的罗伯特，这让唐纳德觉得自己不可战胜。他没有因为自私、固执或残忍而得到奖励，但也没有因为这些缺点而受到惩罚。

玛丽仍然是一个旁观者。她没有干预，也没有安慰她的儿子，表现得好像这不是她该做的。即使在 20 世纪 50 年代，这个家庭也因性别而严重分裂。尽管弗雷德的母亲曾经是他的合伙人——实际上是她开始了他的生意——但弗雷德和他的妻子显然从来不是合伙人。女孩们是她的该管的，男孩们则是弗雷德的责任。当玛丽一年一度回到刘易斯岛的家中时，只有玛丽安娜和伊丽莎白陪着她。玛丽给孩子们做饭，给他们洗衣服，但她觉得不应该由她来指导他们。她很少和儿子们的朋友们互动，她和儿子们的关系已经被他们早期的经历所破坏，变得越来越疏远。

当 14 岁的弗雷迪把一碗土豆泥倒在他当时 7 岁的弟弟头上时，这深深地伤害了唐纳德的自尊心，以至于当 2017 年白宫生日宴会上玛丽安娜在祝酒词中提到这件事时，他仍然会感到困扰。这并不是什么大事——或者它不应该是。唐纳德又在折磨罗伯特，没人能阻止他。即使在七岁的时候，他也觉得没有必要听母亲的话，因为母亲自生病后就未能弥合他们之间的裂痕，他对母亲嗤之以鼻。最后，罗伯特的哭声和唐纳德的做法变得太过分了，在一个后来成为家族传奇的临时权能时刻，弗雷迪拿起了手边最近的一件不会造成任何真正伤害的东西：一碗土豆泥。

大家都笑了，笑个不停。他们都在嘲笑唐纳德。这是唐纳德第一次被他认为地位低于自己的人所羞辱。他不明白屈辱是一种武器，在一场战斗中只有一个人可以使用。在当时的所有人中，弗雷迪会把他拖进一个羞辱他的世界，让事情变

得更糟。从那以后，他再也不允许自己有那种感觉了。从那时起，他就开始挥舞这把武器，而从不让它的尖梢对准自己。

第三章 伟大的自有者

玛丽安娜去了曼荷莲学院，几年后，弗雷迪去了理海大学。此时，唐纳德在观察哥哥努力达到父亲期望（往往没有成功）方面已经有了足够的经验。当然，这些期望比较模糊。弗雷德有一个专制主义者的习惯，即认为他的下属不用别人告诉就知道该做什么。一般来说，知道你没有做错事的唯一方法就是你没有为此被训斥一顿。

但对唐纳德来说，避免被父亲盯上是一回事，赢得父亲的好感是另一回事。为此，唐纳德几乎完全抹掉了与哥哥相同的品质。除了偶尔与弗雷迪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去钓鱼，唐纳德成了乡村俱乐部和办公室的常客，高尔夫是他和父亲唯一不同的地方。他还会强化自己迄今为止未受惩罚的行为：欺凌、指责、拒绝承担责任、无视权威。他说，他对父亲进行了“反击”，弗雷德对此表示“尊重”。事实是，他之所以能够反抗父亲，是因为弗雷德让他这么做。在特朗普很小的时候，弗雷德的注意力并不集中在他身上；他的注意力在别处——他的生意和长子上，仅此而已。最终，当唐纳德 13 岁离开家去军校时，弗雷德开始钦佩唐纳德对权威的漠视。虽然弗雷德通常是一位严厉的家长，但当他开始注意到唐纳德的傲慢和霸道时，他还是接受了这些品质，因为他认同这些冲动。

在父亲的鼓励下，唐纳德最终开始得意忘形了。十二岁的时候，他的右半边嘴总是撇着，流露出一种自己意识到的优越感。弗雷迪称他为“伟大的自有者”，这与他在主日学校学到的《出埃及记》中的一段话的呼应，在这段话里，上帝第一次向摩西显露自己。

由于成长环境糟糕，唐纳德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凭直觉知道，自己永远不会得到安慰或安抚，尤其是在他最需要这些的时候。因此，表明自己需要帮助是没有意义的。不管他自己知道与否，但他的父母不会真正了解他——玛丽疲惫不堪，而弗雷德只对他儿子中最有用的那一个感兴趣——所以他成为了最有利于自己的样子。因此，他形成的固执性格就像一套盔甲，经常保护他免受痛苦和损失。但这也让他无法搞清楚如何充分信任他人，进而接近他们。

弗雷迪不敢向弗雷德要任何东西。唐纳德已经看到了这种沉默的后果。每当弗雷迪稍稍偏离弗雷德通常没有说出口的期望时，他都会被羞辱。唐纳德会尝试一种不同的方法：他选择去讨好父亲，冲破他哥哥从来不敢跨越的障碍。他很清

楚该怎么做：当弗雷迪退缩时，唐纳德会不以为然地耸耸肩。他不经允许就拿走了他想要的东西，不是因为他勇敢，而是因为他害怕不这样做的后果。不管唐纳德是否理解其中隐含的信息，反正弗雷德理解：在一个家庭中，就像在生活中一样，赢家只能有一个；其他所有人都得输。弗雷迪一直尝试做对的事，但总是失败；唐纳德开始意识到他不可能做错事，所以他不再试图做任何“对的”事情。他变得更加大胆和好斗，因为他很少受到世界上唯一重要的人——他的父亲——的质疑或追责。弗雷德喜欢他杀手般的态度，即使这表现为不好的行为也是如此。

唐纳德的每一次越界行为都成了他争取父亲青睐的机会。特朗普好像在说：“看，爸爸，我是硬汉。我是杀手。”他不断越界，因为没有遇到任何反对。后来他遇到了。但反对不是来自他的父亲。

尽管唐纳德的行为并没有困扰弗雷德——他在办公室工作很长时间，不经常看到家里发生的事情——但让他的母亲心烦意乱。玛丽根本控制不了他，唐纳德每次都不服从她。她任何管教孩子的努力都会受挫。他会回嘴。他从不承认自己错了；即使她是对的，他也会反驳她；他拒绝让步。他折磨弟弟并偷走他的玩具。他拒绝做家务或其他被要求做的事。也许对她这样一个挑剔的女人来说最糟糕的是，他是个懒汉，不管她怎样威胁他，他都不肯收拾自己的东西。“等你爸爸回来教训你”这句话对弗雷迪来说是一种有效的威胁，但对唐纳德来说，这似乎是他爸爸参与其中的一个玩笑。

到了 1959 年，唐纳德的不当行为——打架、欺凌、与老师争吵——到了过分的地步。邱-森林学校再也忍不了了。弗雷德是学校董事会的一员，这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这让学校对唐纳德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另一方面，这给弗雷德带来了一些不便。辱骂和戏弄年纪太小而无法反击的孩子已经升级为肢体冲突。弗雷德并不介意唐纳德的行为，但这已经打扰了他，而且耗费了他的时间。当邱-森林学校的一位董事会成员建议把唐纳德送到纽约军事学院以约束他时，弗雷德同意了。把他扔到不会容忍他胡作非为的教官和学长那里，可以让弗雷德的这个门徒更加坚强。弗雷德有比应付唐纳德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我不知道玛丽在最后的决定中是否有发言权，但她也没有争取让儿子留在家里，唐纳德肯定注意到了这一点。这感觉就像是过去她抛弃他的时光的重现。

尽管提出了反对，但唐纳德还是进入了纽约军事学院，一所位于纽约市北部

60 英里的私立男校。家里的其他孩子都说纽约军事学院是一所“少年管教所”——不像弗雷迪上过的圣保罗学校那样有名。没有人会把自己的儿子送到纽约军事学院接受更好的教育，唐纳德理所当然地将此视为惩罚。

弗雷迪知道此事后，困惑地告诉朋友们：“是的，他们控制不了他。”他搞不明白。他以为父亲可以控制所有人。弗雷迪不明白的是，父亲对他的兴趣和对唐纳德的兴趣并不相同。如果弗雷德试图管教唐纳德，他肯定做得到，但是在唐纳德被送走之前，弗雷德对唐纳德和其他三个孩子都不感兴趣。

无论家庭的动态如何，父母对孩子的影响总是不同的，但在特朗普家族中，弗雷德和玛丽的特殊病态对孩子的影响是极端的。五个孩子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方式离家闯荡世界时，劣势已经很明显：

玛丽安娜是长女，一个聪明、有抱负的女孩，却生在一个厌恶女性的家庭里。她是最大的孩子，但因为她是女孩，所以长子弗雷迪得到了父亲所有的关注。她只能和她母亲站在一起，而后者在家里没有权力。因此，在被达特茅斯学院的家庭经济学专业拒之门外、伤心欲绝后，她选择了曼荷莲学院。用她自己的话说，那 “几乎是一个女修道院”。最终，她做了自认为应该做的事，因为她觉得父亲是在乎她的。

弗雷迪的问题在于他没有完全改变自己。

伊丽莎白的问题是她家人的冷漠。她不仅年龄排在中间（也是一个女孩），而且与她的两个兄弟相差三、四岁。青春期的她十分腼腆，很少说话，因为她的父母都没有认真听她说话。直到步入中年，她仍然对他们充满爱意，每个周末都回到家里，仍然希望能得到“爸比”的关注。

唐纳德的问题在于，他为了保护自己免受早年被遗弃的恐惧而形成了好斗、固执的人格，这种人格加上目睹父亲虐待弗雷迪的经历切断了他与其他人的真正联系。

罗伯特的问题是，他是最小的孩子，不被重视。

玛丽安娜、伊丽莎白或罗伯特做的任何事都得不到弗雷德的赞同；他对他们不感兴趣。就像行星绕着一颗特别大的恒星旋转一样，五个孩子即使沿着弗雷德为他们规划的路线前进，也因他的意志力而无法接近他。

弗雷迪对未来的计划仍然是成为他父亲在特朗普管理公司（Trump

Managment）的得力助手，但 1961 年，弗雷迪第一次驾驶塞斯纳 170 飞机从斯莱顿飞行俱乐部的跑道起飞时，他的观点发生了转变。

只要他能达到商科专业的要求并保持优异的成绩，他就能开飞机，加入兄弟会，并加入美国空军预备役军官训练营（ROTC）。出于好玩，弗雷迪选择了“西阿缪”（Sigma Alpha Mu），一个以犹太人为主的兄弟会。这么做可能也是故意跟不太喜欢犹太人的父亲唱反调。兄弟会的兄弟们最终成为了弗雷迪最好的朋友。加入训练营还有另一个目的。弗雷迪渴望有意义的纪律。他在训练营透明的成就和奖励制度中茁壮成长。如果你按命令行事，你的服从就会得到认可。如果你达到或超过了预期，你就会得到奖励。如果你犯了错误或没有遵守命令，你就会受到相应的惩罚。他热爱等级制度；喜欢制服；喜欢那些象征成就的奖牌。当你穿上制服时，其他人很容易认出你是谁，知道你取得了什么成就，你会因此得到认可。这与弗雷德·特朗普的生活正好相反，对他来说，把事做好是理所当然的，不值得认可，而犯了错的人应该被批评和惩罚。

获得飞行员执照和参加训练营一样是个容易理解的过程:完成一定的飞行时数,获得使用特定仪器的认证,获得执照。他的飞行课程最终成为他的头等大事。就像划船一样，他非常认真地对待飞行。他开始不参加兄弟会的纸牌游戏，以便在飞行学校再学习一个小时或飞一小时。但他感受到的不仅仅是找到自己擅长之处的快乐，而且是完全自由的快乐，这是他以前从未体验过的。

夏天，弗雷迪像往常一样为弗雷德工作，但一到周末，他就开着高中买的船带朋友们去东部钓鱼和滑水。有时玛丽让弗雷迪带唐纳德一起去。“对不起，伙计们，”他对他的朋友们说，“但我必须带着我那讨厌的弟弟一起去。”尽管弗雷迪很不乐意，但唐纳德兴致勃勃。不管他们的父亲是怎么看待弗雷迪的，弗雷迪的朋友们显然是爱他的,而且总是玩得很开心——这与唐纳德从小看到的情况相矛盾。

1958 年 8 月，在大三开始之前，弗雷迪和比利·德雷克（Billy Drake）飞往巴哈马群岛的拿索度短假。他们两人租了一艘船，在岛上钓鱼和探险。一天晚上，他们回到酒店，坐在游泳池边的酒吧里，弗雷迪遇到了一位娇小可爱的金发美女琳达·克拉普（Linda Clapp）。两年后，他娶了她。

那年 9 月，唐纳德来到了纽约军事学院。他从一个可以为所欲为的世界，来

到了一个不铺床就会受到惩罚、被学长无缘无故撞到墙上的世界。也许是因为在12岁时失去了父亲，弗雷德意识到了儿子的孤独，从唐纳德开始读八年级到1964年毕业，弗雷德几乎每个周末都会去看望他。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唐纳德的被遗弃感和委屈，让他第一次意识到，他和父亲之间有一种他哥哥没有的联系。唐纳德的母亲偶尔会去他，但总的来说，他的离开让她松了一口气。

虽然他不想上纽约军事学院，但唐纳德可以理解那里的一些事情，就像弗雷迪可以理解后备役军官训练营一样。学校有体系，他的行为会产生后果。学校有合理的奖惩制度。与此同时，学校生活让唐纳德更加理解了弗雷德的说法：拥有权力的人（不管这种权力是如何随意地被授予或获得的）可以决定对错。任何有助于你维持权力的事情都是正确的，即使它并不总是公平的。

学习生活还强化了唐纳德对脆弱的厌恶，而脆弱对于挖掘爱和创造力至关重要，因为它也会让我们感到羞耻，这是他无法容忍的。他必须改善自己对冲动的控制，这不仅是为了避免惩罚，而且是为了帮助他完成那些需要更多技巧的不当行为。

大四是弗雷迪一生中最美好、最有成就的一年。商业学士学位是最不重要的。他被任命为“西阿缪”（Sigma Alpha Mu）的主席，完成了后备役军官训练，毕业后将作为少尉进入空军国民警卫队。最重要的是，他成为了一名有执照的商业飞行员，但他并不打算使用执照；他打算去布鲁克林和父亲一起工作，一心想着有朝一日能接班。

1960年夏天弗雷迪加入特朗普管理公司时，该公司已经包括了40多栋建筑和综合体，拥有数千个单元，遍布布鲁克林和皇后区。多年来，弗雷德一直带着他的大儿子去建筑工地；他最大的开发项目（包括布鲁克林的海岸港和海滩港）以及牙买加庄园的小项目都是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弗雷迪成长过程中建造的。在参观工地的过程中，削减成本（如果自己做便宜那就自己做；如果不是那就外包）和节省成本（红砖比白砖便宜一分钱）的重要性深深烙印在弗雷迪脑海里。弗雷德还拉他去参加布鲁克林的民主党会议和政治筹款活动，确保他认识这个城市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

成为全职员工后，弗雷迪开始陪父亲巡视大楼，向管理员汇报情况，并监督维修工作。实地工作的感觉比待在我祖父的牙医诊所里好多了。这家诊所开在布

鲁克林南部 Z 大道，空间狭小，灯光昏暗。虽然弗雷德的生意每年能赚数百万美元，但必要时他还是会直接与房客打交道。例如，如果一位房客的抱怨太大声或太频繁，弗雷德就会去拜访他或她，因为他知道他的名声很响。有时，他会带上弗雷迪，示范如何处理这种情况。

当一位房客反复打电话到办公室抱怨没有暖气时，弗雷德去拜访了他。敲完门，他脱掉外套，这是他通常在上床之前才会做的事情。一进到确实很冷的公寓，他就卷起衬衫袖子（这也是他很少做的事情），告诉房客他不知道他在抱怨什么。“这里就像热带地区一样。”他告诉房客。

弗雷迪开始履行国民警卫队的职责。每月一个周末，他必须到曼哈顿的武器库报到。弗雷德没有对周末的缺勤发表评论，但他对弗雷迪每年两周在纽约上州的德拉姆堡度过感到恼火。对不喜欢兵役的弗雷德来说，这是在浪费员工的时间。

一天晚上，在布鲁克林度过了漫长的一天后，弗雷迪接到了琳达的电话。他们已经一年多没有联系了。她告诉他，她将成为一名美国国家航空的空姐，即将在爱德怀德机场（即现在的约翰·肯尼迪国际机场）工作。她记得弗雷迪提到过他爸爸在皇后区有几栋公寓楼，所以希望他能帮她找一个离机场不远的地方住。弗雷德在牙买加庄园有几栋楼，从爱德怀德坐公交车只需 15 分钟就能到。他们在高地大道找到了一个单间公寓，公寓旁边是 9 英亩的森林公园，公园中央有一个大池塘。她马上就搬了进去。很快她和弗雷迪就开始约会了。

一年后，也就是 1961 年 8 月，弗雷迪带琳达去他们在曼哈顿最喜欢的餐厅吃饭。在喝鸡尾酒时，他偷偷把一枚订婚戒指放进琳达的杯子里，向她求婚。晚饭后，他们开车去牙买加庄园告诉他的父母。弗雷德和玛丽平静地接受了这个消息。

考虑到琳达的成长背景（她的父亲是一名卡车司机，后来她的父母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滩附近开了一家蛤蜊屋），以及她缺少教养和教育，他们认为她肯定是个拜金女。但这是一种根本的、故意的误解，完全无视现实；琳达可能不知道她未来的岳父有多有钱。如果说琳达是个拜金女，那她肯定是个不合格的拜金女。

鉴于祖母成长于苏格兰的普通家庭，她本可以成为我母亲的盟友，但玛丽·麦克劳德（Mary MacLeod）在爬到梯子顶端后就把梯子收走了。至于弗雷德，他就是不喜欢琳达。无论如何，她是弗雷迪的选择，所以她肯定靠不住。

与此同时，当时对空姐的规定非常严格：头发长得太长或体重增加会被停职，结婚后也不能继续工作。1962 年 1 月（也就是婚礼前几周）飞完最后一趟航班后，琳达失去了独立的收入来源。

琳达的母亲由于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不得不坐在轮椅上，所以弗雷迪和琳达决定在佛罗里达举行婚礼。教堂仪式结束后，劳德代尔堡的 66 号码头凯悦酒店将举行一个简单的鸡尾酒会。弗雷德和玛丽不高兴，但由于他们不提供经济上的帮助，他们没有什么发言权。在弗吉尼亚上大学的伊丽莎白和仍在纽约军事学院上学的唐纳德都没有参加婚礼。弗雷迪夫妇蜜月归来后，特朗普家族在纽约举行了一场欢迎会。

科尼岛的特朗普村——迄今为止特朗普管理公司的最大项目——定于 1963 年破土动工，弗雷迪将协助筹备工作。弗雷德希望儿子住进自己在布鲁克林的公寓，这样他就可以近距离地处理突发问题，但弗雷德和琳达却搬到了纽约市东 56 街第一大道和萨顿广场之间的一套一居室公寓里。他们买了一只狮子狗，这是弗雷迪养的第一只宠物，几个月后琳达怀孕了。

那年 11 月，弗雷德里克·克里斯特·特朗普三世（Frederick Crist Trump, III）出生。一个月后，弗雷迪买了他的第一架飞机——派珀卡曼契 180 型飞机。圣诞节一过，他和琳达开着这架飞机前往劳德代尔堡，把它和他们刚出生的儿子拿给琳达的父母看。琳达的父亲迈克经常把车停在劳德代尔堡机场的跑道附近，观看飞机起飞和降落，惊叹不已。

在弗雷迪和琳达与玛丽安娜及其丈夫大卫·德斯蒙德（David Desmond）每周一次的晚餐中，弗雷迪告诉了他们有关那架飞机的事，并补充说：“不要告诉爸爸。他不会理解的。”

1963 年 9 月，他们搬进了汉兰达大楼，这是弗雷德在牙买加庄园的大楼之一，与琳达三年前第一次搬到城里时住过的地方隔了一个街区——这也是搬到长岛之前的一步。汉兰达是弗雷德的典型建筑，有一个宏伟的入口，可以分散人们对不合标准的出租单元的注意力。大厅有一个很大的下沉式空间，有一个正式的休息区，一边用天鹅绒绳索和支柱隔开，另一边展示着巨大的热带植物。在它们之间，有几扇从地板直达天花板的平板玻璃窗，窗外是宽阔的石板和通向人行道的砖砌台阶。台阶的两边是更繁茂的枝叶、高耸的橡树和叶子巨大的深绿色的异

国植物——又是弗雷德·特朗普的风格。这栋建筑坐落在高地大道的山顶上，这条大道基本上是贯穿牙买加庄园的分界线：北侧更有郊区的感觉，大部分居民是白人；南部是城市，大部分居民是黑人。大楼的前门和后门通向两个不同的世界。弗雷迪和琳达在九楼的东南角租了一套二居室的公寓，一边可以俯瞰远处的公园和牙买加高中，另一边则可以俯瞰牙买加庄园南部。

弗雷迪一开始担心，作为房东的儿子，同时也是这栋楼所属公司的雇员，人们会随时骚扰他。但是这栋楼建成还不到 15 年，房客不多，而且管理员让其他房客不要打扰他。

此后不久，弗雷迪告诉琳达他想成为一名专业飞行员。在特朗普管理公司工作了三年之后，他发现这份工作枯燥乏味。几乎从一开始，他父亲就把他排除在特朗普村开发项目的日常运营之外；他只负责处理房客投诉和监督维修工程。

成为一名飞行员可以让他有机会做他喜欢的事情，同时赚很多钱。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的喷气式飞机时代来临之前，商业飞行员的招聘被暂停了 7 年。然而，随着波音 707 和道格拉斯 DC-8 进入航空公司机队，空中旅行激增。泛美航空于 1958 年推出海外航班，并将其飞机借给美国国家航空用于国内航线。第二年，环球航空、美国航空、达美航空和联合航空都开始使用喷气式飞机。与涡轮螺旋桨飞机相比，喷气式飞机体积和功率更大，而且更安全，可以承载更多乘客、飞行更长距离。

随着航空服务的发展，对可以快速适应新飞机的合格飞行员的需求也随之增加。环球航空是最后一家采用波音 707 的航空公司，承受着追赶其他公司的巨大压力。爱德怀德机场和麦克阿瑟机场（弗雷迪的卡曼契飞机就停在这里）的墙上贴满了航空公司的招聘告示。

琳达不同意。作为一名空中小姐，她知道飞行员在中途停留时会做些什么。弗雷迪同意暂时搁置这个想法，在特朗普管理公司好好工作。

但他和父亲的关系恶化了。他向弗雷德提出的创新想法被否决。他要求承担更多责任，弗雷德拒绝了。

为了证明自己能够做出行政决策，弗雷迪为一栋老建筑订购了窗户。弗雷德发现后大发雷霆。“你应该给它们涂上一层油漆，而不是浪费我的钱！”他喊道，而员工们在一旁看着。“唐纳德比你聪明十倍。他绝不会做这么愚蠢的事。”唐纳

德当时还在上高中。

在兄弟姐妹面前被父亲羞辱是一回事，在办公室里被羞辱是另一回事，办公室里的那些人不是他的同辈。也许有一天，他会成为他们的老板。刚树立的权威被这样公开削弱对他来说是沉重的一击。

那天晚上回到家后，他告诉琳达自己被困住了，并承认为父亲工作从来没有让他开心过。这份工作他预想的截然不同，他第一次意识到，特朗普管理公司对他来说可能是个死胡同。“琳达，我应聘了环球航空的工作。我不得不这么做。”他不再向父亲提要求了。弗雷德可能会和他断绝关系，但弗雷迪愿意冒失去遗产的风险。飞行员，特别是环球航空的飞行员，有很好的福利和工作保障。他将能够独自养活自己的家庭，自己作主。

当弗雷迪告诉父亲，他将离开特朗普管理公司去当一名商业飞行员时，弗雷德震惊了。这是一种背叛，他不想让长子忘记这一点。

第四章 期待飞行

只有最优秀的飞行员才会负责令人垂涎的波士顿至洛杉矶航线。1964 年 5 月，弗雷迪第一次作为专业飞行员正式驾驶飞机，从波士顿的洛根机场飞往洛杉矶国际机场——距他申请参加当年的第一个培训班还不到六个月。

弗雷迪在驾驶舱内取得的成就使他在特朗普家族中独具一格。弗雷德的其他孩子没有一个能完全靠自己完成这么多。玛丽安娜是最接近弗雷迪的一位，她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完成了法学院的学业，并在九年的时间里打造了作为一名检察官的良好记录。然而，她最终得以被任命为联邦上诉法院法官，是因为唐纳德利用自己的关系帮了她一个忙。伊丽莎白则在大通曼哈顿银行做着弗雷德为她安排的同一份工作，一做就是几十年。唐纳德从一开始就获得了帮助，他的每一个项目都得到弗雷德的资助和支持，后来又得到其他人的支持，直到现在。罗伯特除了大学毕业后在纽约一家证券公司短暂工作过一段时间外，先后为唐纳德和父亲工作。连弗雷德也不是完全靠自己的努力取得成功的——他的母亲为后来的特朗普管理公司打好了基础。

弗雷迪在大学里上了飞行学校，反抗了父亲（他将在余生付出代价），没有获得家人的支持，也没有被家人强烈鄙视。尽管障碍重重，但他已经决定尽可能多地申请环球航空的工作。他第一次就成功了。

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绝大多数新飞行员都在军队中接受过训练；一个典型的培训班有 20 名学生：

空军 4 人，海军 4 人，陆军 4 人，海军 4 人，平民 4 人。25 岁的弗雷迪是 1964 年环球航空首个飞行员班的 12 名成员之一。他们中有 10 人在军队里接受过训练。考虑到当时没有飞行模拟器，所有的训练都在空中完成，弗雷迪的成就就更加令人震惊了。弗雷迪在机场训练的那些时光（他的兄弟们把时间花在开派对上）终于得到了回报。

当时，航空旅行正处于其鼎盛时期，而站在这股潮流的前沿是霍华德·休斯（Howard Hughes）的环球航空公司，它是好莱坞上层人士的最爱。环球航空为八卦专栏作家赫达·霍珀（Hedda Hopper）和卢埃拉·帕森斯（Louella Parsons）提供豪华轿车，接送他们往返机场；由此产生的宣传效果让所有人都想乘坐环球航空的飞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航空公司之一，环球航空既有国内航班，也有国

际航班。机长是上帝，且受到了相应的对待。由于休斯喜欢美女，所有空姐看起来都像电影明星。

飞行员在经过候机楼时乘客们的反应（投来钦佩的目光、索要签名）对弗雷迪来说都是新鲜的，与在特朗普管理公司的体验截然不同。在那里，他未能获得尊重。闪闪发光的机场与纽约那些昏沉的办公室和肮脏的建筑工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推土机和挖土机被停机坪上一排排闪闪发光的波音 707 和 DC-8 取代。他的所有决定都不会受到父亲的批评，驾驶舱里他就是老大。

弗雷迪举家迁往马布尔黑德，这是一个海港小镇，位于马萨诸塞州海岸，距离波士顿洛根机场约 40 分钟车程。他们租了一间摇摇欲坠的小屋，周围是一间间风格各异的房屋，环绕着村落广场。小屋离庞大的港口不远，弗雷迪把他的“游艇”——一艘破旧的波士顿捕鲸船——停放在那里。

马布尔黑德的五月恬静宜人。弗雷迪喜欢开飞机。此外还有很多社交活动，比如烧烤和深海钓鱼。几乎每个周末，朋友们都从纽约过来拜访他们。然而，一个月后，弗雷迪开始为日程安排而烦恼。当他不在驾驶舱的时候，他总是无所事事。琳达注意到他开始比其他人喝得更多——这以前从来都不是问题。

弗雷迪不再向琳达吐露秘密，这也许是想保护她，所以她不知道他和弗雷德在 12 月份谈话的细节。琳达不知道弗雷迪在纽约的父亲通过信件和电话不断地对他进行辱骂。但他的朋友们知道。弗雷迪用一种难以置信的语气告诉他们，弗雷德对于自己的儿子做“空中公交车司机”感到难堪。弗雷德毫不费力地说服儿子，选择离开特朗普管理公司意味着选择失败。琳达没有完全理解的最关键的一点是，弗雷德·特朗普的看法对弗雷迪的影响非常大，公平地说，弗雷迪自己可能也没有理解这一点。

一天晚上，在结束了最近的轮班后，弗雷迪似乎特别烦躁。晚饭时，他说：“我们得离婚。”

琳达很震惊。她的丈夫比平时承受着更大的压力，但她认为这可能是他每次飞行都要为两百多人的生命负责的结果。

“弗雷迪，你在说什么？”

“我们不合适，琳达。我不知道我们怎么能继续过下去。”“你有一半的时间都不在家。”她说。她对他的突然爆发感到困惑。“我们有一个孩子。你怎么能这

么说？”

弗雷迪站起来给自己倒了一杯酒。“算了吧。”他说着离开了房间。

他们再也没有谈论这个问题。几天以后，他们照常生活，仿佛没有发生什么不寻常的事似的。

6 月，18 岁的唐纳德刚刚从军事学院毕业，16 岁的罗伯特仍是弗雷迪母校圣保罗学校的学生，两人驱车来马布尔黑德拜访。他们开的是唐纳德的新跑车，那是他父母送给他的高中毕业礼物——与弗雷迪大学毕业时收到的礼物相比完全升级了。

弗雷迪对于两人的到访感到焦虑。他的兄弟姐妹中没有一个和他一起乘过飞机，也没有一个对他的新职业感兴趣。他想，如果他能让他的兄弟进入他的世界，他也许能找到一个盟友；即使家里有一个人信任他，他也可以更有勇气承受父亲的反对。

在这次拜访期间，唐纳德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1963 年 12 月，当弗雷迪宣布离开特朗普管理公司时，唐纳德措手不及。他哥哥的决定是在他大四第一学期结束时做出的，由于他的名字不是弗雷德，他不知道自己将来在公司会扮演什么角色，尽管他确实计划在那里做一些工作。由于这种不确定性，他没有为高中毕业后的生活做好充分准备。那年春天，他从纽约军事学院毕业时，还没有被大学录取。他请求玛丽安娜在他回家后帮他在当地的一所学校找一个入学名额。

午餐时，弗雷迪和琳达准备了烧烤。唐纳德告诉他们，他将和父亲去芝加哥，“帮助”他开展一个开发项目。弗雷迪明显松了一口气。也许弗雷德开始接受新的现实，决定让唐纳德成为他的继承人。

下午晚些时候，弗雷迪带着两个弟弟去他的“游艇”上钓鱼。

尽管弗雷迪尽了最大的努力来教唐纳德钓鱼，但唐纳德始终没有掌握要领。唐纳德上次和弗雷迪一起上船时，还是纽约军事学院的学生，当时船上还有比利以及弗雷迪在兄弟会的兄弟。当其中一个人试着教唐纳德如何正确握竿时，唐纳德挣脱开说：“我知道我在做什么。”

“是的，伙计，而且你做得很糟糕。”其他人都笑了。唐纳德把鱼竿扔到甲板上，大步朝船头走去。他太生气了，没有看路，弗雷迪担心他可能直接走下船。自那时以来，唐纳德的钓鱼技能并没有提高。

当三兄弟从港口回来时，琳达正在准备晚饭。他们一进屋，她就感觉到紧张的气氛。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弗雷迪的好心情被一种平静的、难以抑制的愤怒所取代。琳达把这看作是一个坏兆头，因为弗雷迪不常发脾气（当时是这样）。他给自己倒了一杯酒。另一个坏兆头。

他们还没坐下来吃晚饭，唐纳德就开始攻击他的哥哥。“你知道吗，爸爸真的很讨厌你浪费生命。”他说，好像他突然想起了自己为什么在那里。

“我不需要你告诉我爸爸的想法。”弗雷迪说，他非常了解爸爸的想法。

“他说你让他难堪。”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在乎。”弗雷迪回答，“如果你想和爸爸一起工作，那就去吧。我不感兴趣。”

“弗雷迪，”唐纳德说，“爸爸对你的看法是对的：你只不过是一个称呼好听一点的公交车司机。”唐纳德可能不理解父亲蔑视弗雷迪以及弗雷迪决定成为专业飞行员的原因，但他具有恶霸式的本能，能找到最有效的方法来削弱对手。

弗雷迪明白，他的兄弟们是来帮父亲带口信的——至少唐纳德是这样。但是，听到弗雷德轻蔑的话从自己弟弟嘴里说出来，他的心都碎了。

琳达无意中听到了他们的对话，她及时从厨房走进客厅，看到弗雷迪脸色铁青。她砰地一声把手里的盘子摔在桌子上，对小叔子大叫：“唐纳德，你应该把嘴闭上！你知道他工作有多辛苦吗？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弗雷迪在那天晚上剩下的时间里没有和他的两个弟弟说话，他们第二天早上回了纽约，比原计划提前了一天。

弗雷迪的酗酒问题恶化了。

7 月，环球航空给了他升职的机会。环球航空想把他送到堪萨斯城的培训中心，让他在公司新引进的波音 727 飞机上接受训练。他拒绝了，尽管琳达提醒他，若是在国民警卫队，他绝不可能违抗上司的命令。他对管理人员说，两个月前他刚在马布尔黑德签了为期一年的租约，租了一套带家具的房子，所以没有理由让组建不久的家庭再次搬迁。事实上，弗雷迪已经开始怀疑他的梦想要画上句号了。他对父亲会接受自己的职业飞行员身份失去了希望，如果父亲不接受他，他可能无法继续工作。在离开特朗普管理公司之前，他一直在尽最大努力成为他父亲希望他成为的人。当这些尝试一次次以失败告终时，他希望在实现自己梦想的过程

中，父亲能够接受真正的自己。他在童年时期小心翼翼，渴望获得父亲有条件的认可。他非常清楚，只有一种方法可以获得这种认可——不做真正的自己——而他永远无法做到这一点。父亲的认可仍然比什么都重要。弗雷德一直是自己孩子价值的最终仲裁者（因此我的姑妈玛丽安娜即使到了 70 多岁，仍然渴望得到她过世已久的父亲的赞扬）。

后来，环球航空给了弗雷迪在爱德怀德机场工作的机会，他欣然接受了这个机会，认为这可能是挽救局面的一种方法。从实际的角度来看，这一决定毫无道理，因为他每三四天就要从马布尔黑德前往纽约。更糟糕的是，这让他更靠近弗雷德。但也许对弗雷迪来说，这才是重点。即使他不能得到弗雷德的批准，但如果弗雷德能够近距离看他工作，他也可以更容易说服父亲，开飞机才是自己的天职。在飞行间隙，弗雷迪带着他的飞行员同伴们回到家里见家人，希望这能给弗雷德留下深刻印象。这是出于绝望的举动，但弗雷迪的确感到绝望。

但这并没有什么用。弗雷德永远忘不了那次背叛。尽管弗雷迪加入了后备役军官训练营、兄弟会和飞行俱乐部（他的父亲可能对这些事情不屑一顾），但这些活动并没有改变他为父亲工作、确保特朗普帝国永存的计划。从弗雷德的角度来看，弗雷迪离开特朗普管理公司是对自己的公然不尊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正是弗雷德想灌输给儿子的勇气，但这种勇气被浪费在了错误的抱负上。弗雷德觉得儿子前所未有的举动削弱了自己的权威，削弱了一切（包括儿子的生活）都在他掌控之中的感觉。

两个弟弟拜访弗雷迪几个星期后，一场夏季的暴风雨在马布尔黑德港上空轰鸣。琳达正站在客厅里熨烫弗雷迪的白色制服衬衫，这时电话铃响了。她一听到丈夫的声音，就知道出事了。他告诉她，他已经辞去了环球公司的工作。他们三人需要尽快搬回纽约。琳达惊呆了。弗雷迪仅仅工作了四个月就放弃了他所做的一切，这一点也不合理。

事实上，环球航空给他下了最后通牒：如果他辞职，他可以保留自己的执照；否则，公司将被迫解雇他，因为他有严重的酗酒问题。如果弗雷迪被解雇，他可能再也不能开飞机了。他选择了第一个选项，他们在马布尔黑德的生活就此结束了。劳动节刚过，一家三口就搬回了牙买加庄园汉兰达大楼九楼角落的公寓。

但弗雷迪并没有完全放弃飞行生涯。他想，如果他加入小型航空公司，开更

小的飞机，飞更短、压力更小的航线，他可以重新一步步往上爬。琳达和弗里茨安顿下来后，弗雷迪去了由提卡，纽约上州的一个小城市，为皮埃蒙特航空工作，该公司主营美国东北部的通勤路线。这份工作持续了不到一个月。

他搬到了俄克拉何马州，为另一家地方航空公司工作。弗里茨两岁生日的时候，他在场。12 月，他回到了皇后区。他的酗酒问题已经失控，他知道自己再也不能当飞行员了。作为家里唯一一个白手起家的人，弗雷迪正在慢慢地崩溃。

弗雷迪的飞行生涯不到一年就结束了。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他站在了父亲的面前。弗雷德坐在书房里他常坐的双人沙发上，而弗雷迪要找一份他不想要、且弗雷德认为他做不了的工作。

弗雷德勉强同意了，明确表示他是在帮儿子的忙。

接着，又出现了一线希望。1965 年 2 月，弗雷德收购了障碍赛公园，这是康尼岛三个标志性的游乐园之一，大约在 20 世纪初就开始运营了。障碍赛公园比它的两个竞争对手多存在了几十年：梦幻乐园在 1911 年被大火摧毁，卢娜公园同样被大火袭击，在 1944 年关闭。弗雷德拥有一个以卢娜公园的名字命名的建筑群和购物区，离原址不远。障碍赛公园一直开到 1964 年。蒂利奥家族从一开始就拥有这个公园，但由于犯罪率高、娱乐业竞争激烈等因素，他们决定出售这个公园。弗雷德知道障碍赛公园可以用于开发，于是决定收购。他的计划是将公园打造成另一个特朗普村风格的住宅开发项目，但他需要克服一个重大障碍：改变现行区划法，将障碍赛公园的用途从公共用途改为私人建筑用途。在等待机会出现的同时，弗雷德开始游说他的老朋友，争取他们的支持，并开始起草他的提案。

他提出了让弗雷迪参与这个大项目的可能性，而弗雷迪迫不及待地想要提升自己的地位，忘掉飞行生涯，一下子抓住了这个机会。他怀疑这可能是他向父亲证明自己的最后机会了。

那时琳达怀上我已经六个月了。

第二部分 贫民区

第五章 禁足

自 1964 年 9 月以来，唐纳德一直住在家里，每天要花 30 分钟去布朗克斯区的福坦莫大学上学。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会避免提及这段经历。从纽约军事学院受到严格管制的生活到相对宽松的大学生活，这对唐纳德来说是一个艰难的转变。他经常发现自己百无聊赖，在学校周围大摇大摆地找女孩调情。一天下午，他遇到了比利·德雷克的女朋友安娜玛利亚，她正站在车道上看着她的父亲洗车。唐纳德知道她是谁，但他们以前从未说过话。安娜玛丽亚从弗雷迪那里知道了唐纳德的一切。两人聊天时，她提到自己曾就读于纽约军事学院附近的一所寄宿学校。

“哪所？”他问道。

当她告诉他学校名称的时候，他看了她一秒钟，然后说：“我很失望你去了那个学校。”

比唐纳德大三岁的安娜玛丽亚说：“你有什么资格对我失望？”谈话就这样结束了。他眼中的调情就是侮辱，装出高人一等的样子。这让她觉得他很幼稚，就好像他是一个二年级的学生通过拉一个女孩的头发来表达好感。

随着弗雷迪的明显失宠，唐纳德看到了取代哥哥成为父亲在公司得力助手的机会。唐纳德此前学到的一个教训是，做任何事都要做到最好——尽管在某些方面他的父亲并不希望他这样——于是他决定获得一个与他的新抱负相称的学位，即使这只能让他有吹嘘的资本。弗雷德不知道一所大学和另一所大学的优劣——他和我的祖母都没上过大学——所以特朗普家的孩子们在申请学校时基本上只能靠自己了。意识到沃顿商学院的声誉，唐纳德将目光投向了宾夕法尼亚大学。不幸的是，尽管玛丽安娜帮他做了家庭作业，却不能替他考试。唐纳德担心，他离班里第一名差的很远的成绩会影响他被录取。为了以防万一，他请来了乔·夏皮罗（Joe Shapiro）替他参加 SAT 考试。夏皮罗是个聪明的孩子，以擅长考试而闻名。在没有照片身份证和电脑记录的日子里，代考要容易得多。唐纳德从不缺钱，给了夏皮罗很多钱。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还让弗雷迪和詹姆斯·诺兰（James Nolan）谈谈，诺兰是弗雷迪在圣保罗学校的朋友，正好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招生办公室工作。也许诺兰会愿意为弗雷迪的弟弟说句好话。

弗雷迪很乐意帮忙，但他有一个不可告人的动机：尽管他从不把唐纳德视为竞争对手，也不认为他会取代自己，但他也不喜欢和他越来越难以忍受的弟弟妹妹在一起。唐纳德不碍事是一种解脱。

到最后，唐纳德的所有诡计可能都是不必要的。那时候，宾大没有现在那么挑剔，录取了一半甚至更多的申请者。无论如何，唐纳德得到了他想要的。1966年秋，也就是他大三那年，他从福坦莫大学转到了宾夕法尼亚大学。

1965 年 7 月，我出生几个月后，祖父以 250 万美元买下了障碍赛公园。一年后，特朗普管理公司仍在努力获得推进项目所需的批准和区划法。公司还在与公众对该项目的反对作斗争。

弗雷迪告诉他的朋友们，自从他上一次在特朗普管理公司任职以来，一切都没有改变。弗雷德总是管得太细，又不尊重他的儿子，这使得这份工作从令人兴奋的挑战变成了严峻而乏味的活动。不用说，失败将是一场灾难。尽管如此，弗雷迪仍然相信，如果他能帮助开发项目获得成功，他会在父亲那里有更好的立足点。

那年夏天从阵亡将士纪念日到劳动节的那段时间，我的父母在蒙托克租了一间小屋，这样爸爸就可以逃离布鲁克林的高压环境了。妈妈计划全职跟我和弗里茨待在一起，爸爸则会在周末往返两地。最近更名的 JFK 机场离特朗普管理公司的办公室只有 15 分钟的车程，而蒙托克机场（实际上只是一块空地上的一条跑道）就在小屋的对面，所以通勤很方便。弗雷迪最喜欢做的事情仍然是带他的朋友们飞到蒙托克，然后带他们出海。

夏天结束的时候，祖父的障碍赛公园项目岌岌可危，他知道这一点。弗雷德一直指望着自己与布鲁克林民主党的长期联系能够帮上忙，因为这种联系过去为他的许多开发项目铺平了道路。然而，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他的政治密友们下台了。很快他就知道，他不可能获得他需要的区划。尽管如此，他还是让弗雷迪完成这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让障碍赛公园获得成功。

时间不多了。突然之间，我 28 岁的父亲扮演了一个更公开的角色，主持新闻发布会，安排拍照。在一张照片中，我的父亲穿着风衣，很瘦，站在一个空荡荡的大仓库前，凝视着广阔的空间，看起来很小，完全迷失了方向。

当地居民希望将障碍赛公园列为地标，这样一来开发项目就会停滞，弗雷德

的计划也会落空。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弗雷德做了最后的努力，决定在 1907 年建造的快乐馆举办一场活动。活动的目的是庆祝公园的拆除——换句话说，他将在公园获得地标称号之前摧毁它。为了宣布这个计划，他让我父亲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使他成为了争论的焦点。活动请来了穿着泳装的模特。游客们被鼓励往公园标志性的窗户上扔砖头（可购买），窗户上有公园吉祥物蒂莉的巨大形象，它咧嘴大笑着。在一张照片中，我的祖父拿着一把大锤，对着一个穿着比基尼的女人咧嘴大笑。

整场活动简直是一场灾难。情感、怀旧和社区是我祖父无法理解的概念，但当那些窗户被打破时，他肯定也会承认自己做得太过分了。由于当地人反对他的项目，他无法获得他需要的区划变更，被迫退出障碍赛公园开发项目。

这次冒险暴露了他不断减弱的达成目标的能力。弗雷德的力量很大程度上来自他的人脉。20 世纪 60 年代初到中期，纽约市政坛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他的许多密友失去了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弗雷德被忽视了。他再也没有推进原创的建筑项目。落成于 1964 年的特朗普村将是特朗普管理公司建造的最后一个综合建筑群。

弗雷德不愿承担责任（和后来的唐纳德一样），因此他把障碍赛公园项目的失败归咎于弗雷迪。最终，弗雷迪责怪了自己。

唐纳德几乎每个周末都从费城开车回家，这一点也没有帮助。事实证明，他在宾大并不比在福坦莫更自在。他对学业不感兴趣，可能他突然发现自己成了大池塘里的一条小鱼。在 20 世纪 60 年代，纽约军事学院的入学人数达到高峰——8 年级到 12 年级的学生有 500 多人——但宾大在他入学时却有几千名学生。在军事学院，唐纳德凭借在家里长大时学到的很多技能挺过了低年级生活：他能在痛苦和失望面前假装冷漠，能承受高年级学生的虐待。他不是一个好学生，但他有一种魅力，一种让别人和他和睦相处的能力，而且当时这种魅力并不完全基于残忍。在高中时，唐纳德是一名优秀的运动员，他的蓝眼睛、金色头发和神气姿态让一些人觉得他很有魅力。他充满了恃强凌弱者的自信，知道自己总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而不必为之奋斗。到了高三的时候，他在同学中已经有了足够的威望，他们选择他领导纽约军事学院代表团，参加纽约市哥伦布日游行。他觉得自己在宾大不会取得这样的成功，没有理由在那里花费太多时间。无论如何，学

位的声望才是真正重要的。

在推进障碍赛公园项目的最关键时刻以及项目失败后，唐纳德没少纸上谈兵。弗雷迪从来没有打造可以帮助他抵御父亲嘲笑和羞辱的盔甲，对于在兄弟姐妹面前被批评特别敏感。在他们还小的时候，唐纳德既是旁观者，也是附带受害者。随着年龄的增长，唐纳德越来越确信，弗雷迪继续失去父亲的尊重对他有利，所以他经常静静地看着或跟父亲一起批评。

我的父亲和祖父在早餐室里分析障碍赛公园项目失败的原因。弗雷德言辞尖刻，充满指责，弗雷迪则为自己辩解，懊悔不已。唐纳德漫不经心地对他的哥哥说（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他的话会产生什么影响）：“如果你不是每个周末都飞到蒙托克，也许你可以保持头脑清醒。”

弗雷迪的兄弟姐妹知道，他们的父亲一直不赞成弗雷迪开飞机——尽管现在这只是弗雷迪的爱好。他们有个默契，不在老头面前谈论飞机或船只。弗雷德对唐纳德爆料的反应证明了这一点，他对弗雷德说：“把它扔掉。”第二个星期，飞机就不见了。

弗雷德让弗雷迪很痛苦，但从马布尔黑德回纽约之后，弗雷迪似乎更需要父亲的认可，障碍赛公园项目失败之后更是如此。他父亲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希望以此得到父亲的认可。但他自己可能也意识到了，父亲永远不会认可他。

刚搬进汉兰达大楼时，弗雷迪和琳达担心其他房客会找他们投诉。现在，当他们的房子需要修理的时候，他们发现自己位于名单的末尾。

我父母位于九楼的转角卧室的窗户可以看到南边和东边的景色，但也容易招风。此外，汉兰达的每个房间都安装了内置空调，但没有安装好，所以每当空调运行时，干墙和外墙砖之间就会出现冷凝水。随着时间的推移，累积的水分渗入干墙，使其软化。到了 12 月，父母卧室空调四周的墙已经严重损坏，刺骨的寒风不断吹进房间。我母亲试图用塑料布盖住空调周围的墙壁，但寒风继续涌入。即使天气很热，他们的卧室总是冷得要命。汉兰达的管理员从来没有回应他们派来维护人员的请求，墙一直没有被修复。

1967 年的新年前夜，天气特别恶劣。尽管刮风下雨，我父母还是驱车向东，前往蒙托克的古尔尼酒店与朋友们欢度新年。当他们准备在元旦凌晨开车回牙买加庄园时，天气变得更冷了，持续的小雨变成了倾盆大雨。当弗雷迪出去把车预

热时，电池没电了。他只穿着衬衫，试图发动汽车，被淋得湿透。当他和琳达回到公寓和他们漏风的卧室时，他已经病了。

过去两年的压力以及酗酒和吸烟（那时他平均每天两包烟）让弗雷迪本来就处于糟糕的状态。他的感冒迅速恶化，几天之后，他的病情并没有好转。他裹着毯子，颤抖着，无法躲避寒风。琳达反复打电话给管理员，但没有回音。最后，她打电话给公公。“求求您了，爸爸，”她恳求道，“一定有人能解决这个问题。比如牙买加庄园或布鲁克林其他大楼的管理员？弗雷迪病得很重。”我祖父建议她再去找汉兰达的管理员；他无能为力。

很长时间以来，他们都生活在弗雷德·特朗普的地盘里，所以他们都没有想过雇一个不由弗雷德·特朗普支付工资的勤杂工。但他们不能自己雇人；不管是否需要，他们都得征求弗雷德的同意。那堵墙一直没被修好。

元旦后一周，琳达的父亲打电话告诉她，她的母亲中风了。我母亲不想离开我父亲，但她母亲的病情很严重。一旦安排照顾孩子的事情，她需要尽快飞到劳德代尔堡。

不久之后，祖母打电话给我母亲，告诉她弗雷迪得了大叶性肺炎，住进了牙买加医院。琳达立刻上了飞机，一着陆就乘出租车直接去了医院。

1967 年 1 月 20 日，也就是父母结婚五周年纪念日，父亲还在医院里。母亲没有被父亲糟糕的健康状况和日益恶化的酗酒问题所吓倒，偷偷地拿了一瓶香槟和几个杯子进了他的病房。不管周围发生了什么，也不管父亲处于什么状态，两人都决心庆祝一番。

爸爸出院回家才几个星期，琳达就接到了她父亲的电话。他告诉她，她的母亲中风后情况有所好转，但他不愿意整天在采石场工作，而让妻子任由护士摆布。工作的压力，照顾妻子的费用，以及他对妻子的担心，对夫妻两人都造成了不良影响。“我已经走投无路了，”他说。“我不知道怎么才能继续下去。”

虽然琳达不知道她父亲到底在暗示什么，但他听起来非常心烦意乱，她担心他的意思是他和她母亲死了更好，而且绝望的他们可能真的会做点什么。当她告诉弗雷迪她父母的情况时，弗雷迪告诉她不要担心，并打电话给他的岳父说他会帮忙的。“辞掉你的工作，迈克。照顾好妈妈。”钱不是问题，至少在当时不是，但弗雷迪不确定当他告诉父亲这件事时父亲会有什么反应。

“当然要帮他们。”弗雷德说。“这是你应该为家人做的。”

我的祖父相信这一点，就像他相信送孩子上大学或加入乡村俱乐部是应该做的一样：即使是他不感兴趣或对他来说不是特别重要的事情，他也觉得有些事情是“应该做的”。

在障碍赛公园项目失败后，弗雷迪在特朗普管理公司的工作更少了。自从我哥哥出生后，他和琳达就计划买一套房子，现在他有了多余的时间，于是开始物色房子。没过多久，他们就在布鲁克维尔找到了一套完美的四居室公寓。布鲁克维尔是长岛上一个美丽而富裕的小镇。搬家后，父亲的通勤时间至少将增加半小时，但换个环境，离开父亲所有的大楼，对他来说也有好处。他向房地产经纪人保证，他可以支付要价，获得抵押贷款不成问题。

几天后，银行打电话告诉他，他的抵押贷款申请被拒绝了，弗雷迪震惊了。除了在环球航空工作的一年，他已经为他的父亲工作了将近六年。他仍然是特朗普管理公司的一名高管，该公司每年盈利数千万美元。1967 年，该公司的市值约为 1 亿美元。弗雷迪的工资较高，没有太多开支，还有一个信托基金和一个（迅速萎缩的）股票投资组合。最合理的解释是，弗雷德仍在为儿子的背叛和障碍赛公园项目的失败而耿耿于怀，以某种方式干预阻止了交易。我的祖父在大通银行、汉华实业银行和纽约其他几家最大的银行都有人脉和大量存款，所以他不仅可以保证弗雷迪拿到抵押贷款，还可以轻而易举地确保他拿不到。我们全家被困在牙买加庄园那间破旧的公寓里。

到了六月，父亲已经准备好再次到蒙托克度暑假了。我的父母租了之前那间小屋，爸爸用卖掉一些蓝筹股筹集的资金，买了一艘 Chrisovich 33。这艘船配有十六英尺高的金枪鱼塔，更适合他喜欢的那种深海捕鱼。他还买了另一架飞机——Cessna 206 Stationair。与之前的派珀卡曼契相比，它有功率更大的发动机和更多座位。

但这些新玩具不只是为了娱乐。爸爸有一个计划。在障碍赛公园项目之后，他在特朗普管理公司中越来越被边缘化，所以他想出了租船租飞机的主意，以创造另一种收入来源。如果成功了，他或许终究能从公司中解脱出来。他雇了一个全职船长来经营租船业务，但本来最能赚钱的周末，他却让船长开船载着他和朋友们四处转转。

琳达上船和他们待在一起时，她注意到弗雷迪总是喝得比别人多，就像他在马布尔黑德那段时间一样，这使得他们之间的争吵越来越激烈。弗雷迪喝酒后开飞机的频率越来越高，这令人担忧。1967 年的夏天一天天过去，琳达变得不愿意和他一起上飞机了。崩溃仍在继续。到了 9 月，爸爸意识到他的计划行不通了。他卖掉了船，弗雷德发现他买了飞机后，他也卖掉了飞机。

二十九岁的时候，我父亲可以失去的东西越来越少了。

第六章 零和博弈

我被爸爸的笑声吵醒。我不知道时间。我的房间很暗，走廊的灯光在我的门下闪耀着明亮而不协调的光芒。我从床上滑了下来。那时我两岁半，我五岁的弟弟睡在公寓的另一头。我独自去看发生了什么事。

我父母的房间就在我的隔壁，房门大开着。所有的灯都亮着。我在门口停了下来。爸爸背对着抽屉柜，妈妈正坐在他对面的床上，身体靠向一边，一只手举着，另一只手支撑着床垫。我一开始不知道我在看什么。爸爸用步枪瞄准了她。那是一把.22 口径的步枪，他一直放在船上，用来射击鲨鱼。他笑个不停。

妈妈求他住手。他举起枪，对准她的脸。她抬起左臂，又尖叫起来，声音更大了。爸爸似乎觉得这很有趣。我转身跑回床上。

我母亲把我和弟弟赶到车里，带我们去朋友家过夜。最后我父亲找到了我们。他几乎不记得自己做了什么，但他向母亲保证这种事再也不会发生了。当我们第二天回到公寓时，他正在等我们。父母同意努力解决问题。

但是他们继续过着日常生活，没有承认他们婚姻中的问题。一切都不会好转。事情甚至不会保持原样。

不到两英里外，在我祖父的另一栋楼里，玛丽安娜遇到了麻烦。她的丈夫大卫几年前失去了他的捷豹代理权，仍然没有找到工作。任何关注此事的人都会意识到事情并不顺利，但玛丽安娜的兄弟姐妹和朋友们认为大卫·德斯蒙德是个笑话——胖嘟嘟的，人畜无害。弗雷迪从来没有理解过这桩婚姻，也没有认真对待过他的姐夫。

玛丽安娜遇到大卫时二十二岁。作为哥伦比亚大学公共政策专业的研究生，她本打算攻读博士学位，但为了避免被家人（包括弗雷迪）称为老处女的耻辱，她接受了大卫的求婚，并在获得硕士学位后退学。

最初的问题是，身为天主教徒的大卫坚持要玛丽安妮改信天主教。因为不想惹父亲生气，也不想伤害母亲的感情，她不敢要求父亲给他们祝福。

当她终于开口时，弗雷德说:“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她解释说，让他们失望，她感到非常、非常抱歉。“玛丽安娜，我才不在乎呢。你将成为他的妻子。”祖母什么也没说。

大卫喜欢告诉玛丽安娜，他的名字会比特朗普家族更有名。虽然受过良好的

教育，但他没有任何出色的技能来实现自己的抱负。尽管如此，他仍然坚信自己会找到一条成功之路，并“向他们证明自己”。他和拉尔夫·克拉姆登（Ralph Kramden）很像，却没有后者的魅力、善良和带福利的工作。他的“下一件大事”总是失败或者根本没有发生，就像他的汽车代理生意一样。结婚后不久，大卫就开始喝酒了。

德斯蒙德一家住在特朗普家族所有的公寓里，和家里其他人一样享受着特朗普管理公司提供的医疗保险，但是免租金和医疗保险并不能养家糊口。一家人没有收入。

然而，最大的谜团是为什么玛丽安娜在经济上如此依赖她无能的丈夫，其他谜团还包括为什么伊丽莎白住在 59 号街桥旁边一间阴暗的单卧室公寓里，为什么弗雷迪买不起房子，为什么他的飞机、船和豪华汽车不断消失。20 世纪 40 年代，我的祖父和曾祖母为弗雷德所有的孩子设立了信托基金。不管玛丽安娜是否有权获得本金，信托基金一定已经产生了利息。但是，这三个最大的孩子被要求不要索取任何东西。如果我的祖父是这些信托的受托人，他们就陷入了财务困境。请求帮助意味着你软弱、贪婪，或者想要占不需要你回报的人的便宜，但唐纳德是个例外。这件事让玛丽安娜、弗雷迪和伊丽莎白很不高兴，她们都在不同的方面遭受了完全可以避免的贫困。

在丈夫连续失业几年之后，玛丽安娜已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她找到了她的母亲，但努力不引起怀疑。“妈妈，我需要一些零钱去洗衣服。”她每次去家里都会漫不经心地说。她以为没人知道情况有多糟。对弗雷德来说，一旦他的女儿结婚了，他就不再关心她了，但我的祖母知道情况。她没有问问题，要么是因为她不想打听，要么是因为她想让玛丽安娜保持“自尊”，她递给女儿一个科瑞罐头，里面装满了她从我祖父所有的大楼的洗衣机和烘干机里拿出来的一角和两角五分的硬币。每隔几天，祖母就会开着她的粉色凯迪拉克敞篷车在布鲁克林和皇后区转圈，戴着狐皮披肩捡硬币。正如我姑姑后来承认的那样，尽管这个家庭早已非常富有，但那些科瑞罐头救了她的命；没有它们，她就无法养活自己和她的儿子小大卫。

至少，玛丽安妮有钱买杂货了，而无需拐弯抹角地请求我祖母的帮助。但无论他们的处境多么糟糕，特朗普家三个最大的孩子都无法从家人那里得到任何实

质性的帮助。过了一段时间，似乎根本没必要再试了。伊丽莎白只是接受了她的命运。我父亲最终开始相信这是他应得的。玛丽安妮说服自己，不请别人帮忙或不接受帮助是一种荣誉。他们对我祖父的恐惧太过根深蒂固，以至于他们甚至不再愿意承认这份恐惧。

大卫·戴斯蒙德的情况最终变得难以维持。他找不到工作，酗酒情况恶化。玛丽安娜很绝望，但又非常小心，不让人觉得她有什么要求。她向父亲暗示，大卫会喜欢特朗普管理公司的工作。祖父没有问女儿是否遇到了什么问题。他给了女婿一份工作——在他位于牙买加庄园的一栋大楼里当停车场服务员。

1968 年春，唐纳德从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然后直接在特朗普管理公司工作。从工作的第一天起，我 22 岁的叔叔就得到了比我父亲更多的尊重、津贴和薪水。

很快，我祖父任命唐纳德担任特朗普管理公司旗下几家公司的副总裁，任命他担任一座他实际上并不需要管理的大楼的“经理”，给他“咨询费”，并“雇”他为银行家。

这样做的原因有两个：首先，这是一种简单的方式，既能让弗雷迪摆正自己的位置，又能向其他员工暗示，他们应该听从唐纳德的指挥。其次，这巩固了唐纳德作为继承人的实际地位。

唐纳德以别人无法做到的方式获得了父亲的关注。弗雷迪的朋友没有一个能理解为什么在弗雷德眼里，唐纳德是个宝贝。但是，为父亲工作和参观建筑工地的多个夏天和周末让特朗普接触到了房地产生意的各种细节。唐纳德发现，在与承包商打交道、应对支撑纽约房地产业的政治和金融权力结构的过程中，他喜欢那些阴暗面。这对父子可以无休止地讨论生意、当地政治和流言蜚语，而我们这些坐在廉价座位上的其他人根本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弗雷德和唐纳德不仅有共同的性格特点和共同讨厌的东西，而且他们有平等的地位，这是弗雷德和他的父亲永远无法做到的。弗雷迪的世界观比他的弟弟或父亲要开阔。与唐纳德不同的是，他在大学里参加过一些组织和团体，这些组织让他接触到其他人的观点。在国民警卫队和在环球航空担任飞行员期间，他看到了最优秀、最聪明的专业人士，他们相信有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比如专业知识、奉献精神和忠诚。他们明白生活不是零和博弈。但这部分造成了我父亲的困境。唐纳德和他的父亲一样狭隘、

自负。但他还有一种自信和厚颜无耻，这是弗雷德所羡慕的，也是弗雷迪所缺乏的。弗雷德打算利用这些品质为自己谋利。

唐纳德接替我父亲在特朗普管理公司位置的努力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他在家里仍无事可做。罗伯特在上波士顿大学，这使他避免了在越南服役，而唐纳德和伊丽莎白彼此之间也不交往。无论他和他的朋友们做什么，弗雷迪都尽力让他的弟弟参与进来，但结果往往不太好。他们是一群悠闲的人，喜欢和弗雷迪飞到东部去钓鱼和滑水。他们认为唐纳德缺乏幽默感而且自负。虽然他们试着为了弗雷迪接受唐纳德，但是他们不喜欢他。

在特朗普管理公司工作的第一年快结束时，唐纳德和弗雷迪之间的紧张关系开始变得明显起来。虽然弗雷迪试图把分歧留在办公室，但唐纳德从不罢休。尽管如此，当比利·德雷克的女朋友安娜玛利亚要举办晚宴时，弗雷迪问她是否可以邀请他的弟弟。

晚宴当天的情况并不比几年前唐纳德在车道上试图调情那天的情况好多少。兄弟俩到达后不久，正在厨房准备晚餐的安娜玛丽亚被叫嚷声吸引了出来。她发现唐纳德站在离他哥哥几英寸远的地方，脸涨得通红，用手指着弗雷迪的脸。唐纳德看起来好像要揍弗雷迪，于是安娜玛莉亚挤到两个高个子男人中间。

弗雷迪向后退了一步，咬牙切齿地说：“唐纳德，离开这里。”

唐纳德似乎惊呆了，然后气冲冲地离开了，边走边说：“好吧！你吃了那个女孩做的烤牛肉!”他在出去的路上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白痴!”安娜玛丽亚在他身后喊道。她转身问弗雷迪：“那是怎么回事?”

弗雷迪说：“工作上的事。”话题就这样打住了。

我家里的情况也没有好转。尽管妈妈很怕蛇，但有一天爸爸还是带了一条球蟒回家，把鱼缸放在了小房间里，这样妈妈在需要洗衣服、进哥哥的房间或者离开公寓的时候就不得不从它身边经过。在这种无端的残忍行为之后，他们的争吵升级了。到 1970 年，我母亲已经受够了。她叫爸爸离开。几周后，当他突然回家时，她打电话给我祖父，坚持要把门锁换掉。这一次，弗雷德没有反对；他没有问任何问题，也没有责怪她。他只是告诉她，他会搞定的，他的确搞定了。

爸爸再也没有和我们住在一起。

我母亲打电话给我祖父的律师马修·托斯提（Matthew Tosti），告诉他她想

离婚。从20世纪50年代起，托斯提和他的合伙人埃尔文·杜尔本（Irwin Durben）就一直在为我的祖父工作。甚至在我父母分居之前，托斯提先生就已经是我母亲主要联系人了，他们会讨论所有与我、我哥哥和钱相关的事情。他成了她的知己；在冷冰冰的特朗普家族中，他是一位热情的盟友，她把他视为朋友。

尽管托斯提先生可能真的很善良，但他也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尽管我母亲有她自己的律师，但离婚协议可能是由我祖父制定的。他知道，他的儿媳并不知道他家多有钱，也不知道弗雷迪作为一个非常富有的人的儿子会有什么前景。

我母亲每周得到100美元的赡养费，外加50美元的抚养费。在当时，这些钱并不算少，尤其是考虑到学费、夏令营学费和医疗保险等大笔开支是分开支付的。我的父亲还负责支付房租。因为我们住的那栋楼是我祖父的，所以每月只需要90美元。（多年后我才知道，我和哥哥各自拥有汉兰达大楼10%的股份，所以现在回想起来，向我们收取房租似乎有些过分。）父亲支付的房租上限是250美元，这限制了我们搬到更好的公寓或社区的能力。我父亲的家族当时身家超过一亿美元，他同意支付私立学校和大学的学费。但是托斯提先生必须批准我们的假期。因为没有需要分割的婚姻财产，所以我母亲的总净资产是她每月能得到的600美元，这个数额在接下来的十年里都不会改变。1969年，障碍赛公园项目被永久否决了，但最终市政府从我祖父手中买回了那块地。他什么都没做，只是毁了一个受人喜爱的城市地标，却获得了130万美元的利润。我父亲什么都没得到，只得到了他人的指责。

第七章 平行线

当弗雷迪(于 1960 年)和唐纳德(于 1968 年)加入特朗普管理集团（Trump Management）时，两人都有类似的期望：成为其父亲的得力助手，然后接替他的职位。他们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方式被精心打扮以适应角色，从不缺钱买昂贵的衣服和豪华的汽车，但他们的相似之处仅止于此。

弗雷迪很快发现，除了做那些“琐事”，他的父亲并不愿给他腾出地方，也不愿把任何任务交给他，这个问题在建设特朗普村（Trump Village）最吃劲的时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觉得自己被困住了，不被赏识，感到很痛苦，于是他离开了，去别处寻找成功。25 岁时，他成为了一名职业飞行员，为环球航空公司（TWA）驾驶波音 707 飞机来养家糊口。那是弗雷迪个人和职业生活的巅峰。当他 26 岁时重新回到特朗普管理集团负责障碍赛公园项目(Steeplechase)，这期间表面上给他提供的“改过自新”的机会不翼而飞，他的个人前途也到此为止。

到 1971 年，除了当了 10 个月的飞行员外，父亲已经为祖父工作了 11 年。尽管如此，弗雷德还是将当时只有 24 岁的唐纳德提升为特朗普管理集团的总裁。他做这份工作才三年，经验很少、资格更少，但弗雷德似乎并不介意。

事实是，弗雷德·特朗普根本不需要任何一个儿子进入集团管理层。他把自己提升为首席执行官，但他的工作职责没有改变:他还是地主。自从六年前障碍赛公园项目失败后，弗雷德就不再做开发商了，所以唐纳德作为总裁的角色也是有形无实。20 世纪 70 年代初，纽约市处于经济崩溃的边缘，联邦政府削减了联邦住房管理局（FHA）的开支（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越南战争的消耗），所以弗雷德也没法儿从那里拿到更多钱。纽约州资助的一个为特朗普村提供廉价房的项目米切尔-拉马（Mitchell-lama）也陷入了停顿。

作为一项商业举措，提拔唐纳德毫无意义。他被提拔到底是为了做什么？我的祖父当时没有开发项目，他几十年来赖以生存的政治权力结构正在瓦解，纽约市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困境。这种提拔的主要目的是惩罚和羞辱弗雷迪。这是一系列此类惩罚中最新的一个，但几乎可以肯定是最糟糕的，尤其是考虑到它发生的背景。

弗雷德决定给唐纳德找个角色。他开始意识到，虽然他的二儿子不具备经营

企业所需要的那种天天盯着细节的专注力，但他拥有更有价值的东西：大胆的想法以及实现它们所需要的不择手段。弗雷德一直怀有雄心壮志，要把他的帝国扩张到河对岸的曼哈顿，那里是纽约市房地产开发商的圣杯。他早期的职业生涯证明了他有自我推销、掩人耳目和虚张声势的技巧。但作为第一代德国移民的儿子，弗雷德的第二语言是英语，他需要提高自己的沟通技巧——他参加戴尔·卡内基（Dale Carnegie）的课程是有原因的，并不是单纯为了给自己打气。只不过这个课程没起效果。还有另一个障碍，也许更难克服：弗雷德的母亲，虽然她在某些方面的想法很超前，但总体上是非常严肃和传统的。对于她来说，儿子可以变得成功和富有，但不能张扬。

唐纳德则没有这样的约束。他和弗雷迪一样讨厌布鲁克林，但原因与后者的截然不同——那里的劳动阶级单调、狭隘、缺乏“潜力”。他恨不得马上从那里离开。特朗普管理集团位于 Z 大道，就在布鲁克林南部比奇港（Beach Haven）的中央，那里是我祖父营建的最大的公寓群之一。他没有做太多的改动。外面狭窄的办公室里塞满了太多的桌子，小窗户透出的光线很少。如果唐纳德从单元数量、土地租赁价值以及每月流入特朗普管理集团的巨额收入等方面考虑一下周围的建筑和社群，他就会认识到巨大的机遇。相反，每当他站在办公室外面，感受着比奇港千篇一律的实用气息时，他一定会感到窒息——那就是一切都已经在他的脚下。呆在布鲁克林的未来并不是他想要的，他决定尽快离开。

除了坐车在曼哈顿四处兜风之外——司机是他父亲的公司掏钱雇的，凯迪拉克是他父亲的公司租的“业务车”——唐纳德的工作职责似乎还包括吹嘘他的“成就”，以及据称拒绝把房子租给黑人（这一点后来成为了司法部起诉我的祖父和唐纳德搞种族歧视的主因）。

唐纳德投入了大量时间在他渴望加入的曼哈顿圈子中塑造自己的形象。作为第一代看电视的观众当中的一个，他花好几个小时来观察媒体，电视的剧集性吸引了他。这有助于塑造他所代表和体现的圆滑、逢迎的形象。他乐于塑造这种形象，再加上父亲对他的宠爱和父亲的财富给他带来的物质保障，给了他不劳而获的信心，使他能够完成一件即使在一开始就装模作样的事情：不仅把自己推销为一个有钱的花花公子，而且是一个杰出的、白手起家的商人。

在最初的日子里，我的祖父热情地（虽然是秘密地）资助了这项昂贵的尝试。弗雷德没有立即意识到唐纳德的局限性，也不知道他实际上是在宣传一部“小说”，但唐纳德很乐意把他父亲的钱花在随便什么地方。就弗雷德而言，他决心不断地把钱塞进儿子的口袋。比如在 1960 年代末，弗雷德在新泽西开发了一幢供老年人居住的高层公寓，这个项目一方面是为了锻炼如何从政府拿到补贴（弗雷德当时获得了 780 万美元几乎无息的贷款来负担项目建设成本的 90%），另一方面也是他竭力让二儿子获得财富的一个例子。尽管唐纳德没有为这栋大楼的开发投入任何资金，但他得到了咨询费，还得到了物业管理的报酬，而这项工作已经有全职员工在做了。就这个项目，唐纳德一年赚了数万美元，尽管他在开发、推进或管理这个项目上基本上什么都没做，也没有冒任何风险。

弗雷德还耍了个类似的花招，在拍卖会上以 560 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了联邦住宅管理局原先投入 1000 万美元营建的斯威夫特花园（Swifton Gardens）项目。此外，他还获得了一笔 570 万美元的抵押贷款，这笔贷款同时涵盖了改造和维修的费用，他基本上没有为房子本身花什么钱。当他后来以 675 万美元的价格出售这处房产时，唐纳德获得了所有的功劳和大部分利润。

我父亲的飞行梦想被剥夺了，他现在失去了他与生俱来的权利。他不再是丈夫了；他很少见到自己的孩子。他不知道剩下的是什么，也不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他知道，保持自尊的唯一办法就是离开特朗普的管理层，这一次是永远地离开。

父亲从汉兰德（Highlander）搬出来后的第一套公寓，是在皇后区桑赛德（Sunnyside）一条安静、阴凉的街道上一栋砖砌排屋地下室的一个单间公寓。他当时 32 岁，从未独立生活过。

我们一进门就看到一只鱼缸，里面有两条袜带蛇，还有一个着养球蟒的容器。

另一只鱼缸里装满了金鱼，还有一只缸里有几只老鼠在稻草里爬来爬去，它们被放在蛇左边的架子上。我知道老鼠是干什么用的。

除了一张折叠沙发、一张带几把廉价椅子的厨桌和电视，还有两个饲养着一只鬣蜥和一只乌龟的玻璃容器。我们叫它们西红柿和伊兹。

父亲似乎为他的新地方感到自豪，他不断地给动物园增添新成员。有一次，

他带我们到锅炉房，把我们带到一个纸板箱前，里面有六只小鸭子。房东让他安装了一些加热灯，做了一个临时保温箱。它们太小了，我们不得不用滴管喂它们。

“只要把精神上的化油器转个四分之一就行了”，祖父对父亲说，似乎这样他儿子就能戒酒了。好像这只是意志力的问题。他们曾经一起呆在书房里，但有一次是面对面地坐着——不是完全平等的，永远不会平等——而是像两个有问题要解决的人一样，尽管他们可能永远不会在解决问题的方法上达成一致。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尽管医学上对酗酒和成瘾的看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公众的看法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尽管自 1935 年左右开始有了戒酒互助会（Alcoholics Anonymous）等治疗项目，社会对成瘾者的污名观依然存在。

“下定决心吧，弗雷迪”，祖父用着诺曼·文森特·皮尔（Norman Vincent Peale）才会赞同的毫无用处的陈词滥调。弗雷德所拥有的最接近哲学的东西是《繁荣福音书》，他把它当作工具和应急出口，它对他的任何一个孩子的伤害都没有像当时那样大。

“这就像是让我下定决心放弃癌症”，父亲说。他是对的，但我的祖父全心全意地接受了“责备受害者”的心态，这种心态仍然普遍存在，没办法跳过去。

“我要打败它，父亲。我想我自己做不来。我知道我不能。”

不要问“我能为你做什么？”弗雷德说，“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弗雷迪便不知道该从哪里接话。

我祖父一生中从未生过一天病；他从来没有缺勤过一天；他从来没有因为抑郁、焦虑或心碎而靠边站过，甚至在妻子快死的时候也没有。他似乎没有任何弱点，因此无法识别或认可其他人的弱点。

他从来没有妥善处理过祖母的病痛。每当祖母遇到困难的时候，我的祖父就会说“一切都很好。对不对，亲爱的？”然后尽快离开房间，让她独自面对自己的痛苦。

有时祖母强迫自己说，“是的，弗雷德。”通常她什么也不说，紧咬着下巴，努力克制自己不哭出来。我祖父坚持认为一切都“很棒”，没有给任何其他情感留下空间。

我们被告知父亲病了，要在医院住几个星期。我们还被告知，他必须放弃他的公寓——显然，房东想把房子租给别人。弗里茨和我去收拾我们留下的衣服、玩具和其他零碎东西，当我们到达的时候，这个地方几乎空无一人。坦克不见了，蛇不见了。我一直不知道它们出了什么事。

当父亲从医院或康复中心回来时，他搬到了我祖父母的阁楼里。这是一个临时的安排，没有人把它整理得像个住人的地方。所有的储物箱和旧玩具——包括多年前祖母收藏在那里的老式消防车、起重机和自卸卡车——都被推到了阁楼的一端，在另一端的空地上放了一张小床。父亲把他的便携式 6 英寸黑白电视机放在他的旧的国民警卫队的衣箱上，就在卧室的窗户下面。

我和弗里茨去看他的时候，我们就在他的小床旁边的地板上露营，我们三个人看着没完没了的老电影，比如《虎！虎！虎!》，还有《疯狂世界》。当父亲恢复到可以下楼的时候，每个礼拜天都和我们一起在 WPIX 频道上看每周的《两傻双人秀》。

过了一两个月，祖父告诉父亲，桑赛德大厦（Sunnyside Towers）有一个空房间。那是祖父 1968 年买的一间位于顶层的一居室公寓。

就在父亲准备搬到桑赛德的时候，他的大姐玛丽安娜借了 600 美元的贷款，准备在霍夫斯特拉法学院（Hofstra Law School）开始她的学业。虽然不是她的首选，但霍夫斯特拉离牙买加庄园（Jamaica Estates）只有 10 分钟的车程——距离很近，她仍然可以在早上送我的堂兄大卫去学校，下午再去接他。重返校园是一个拖延已久的梦想。她还希望成为一名律师能给她经济上的支持，以便有一天能离开她的丈夫。这些年来，他们的处境变得越来越灰暗。他觉得岳父给他的停车场服务员的工作是一种耻辱，他一直没有缓过这口气来。这些年来，姑父大卫不时地对他的妻子大骂一通，尤其是在他喝醉的时候。

玛丽安娜走向独立的举动让她的丈夫更加抓狂，当她第一天从法学院回到家后，她的丈夫勃然大怒，把他们 13 岁的儿子扔出了公寓。玛丽安娜带他回了娘家，他们在那里过夜。大卫·德斯蒙德（David Desmond, Sr.）花光了他们微薄的共同储蓄账户，离开了小镇。

全家人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待在书房里，这个房间里原来没

有书，直到 1987 年唐纳德找人代写的《交易的艺术》（*The Art of the Deal*）出版。那些书架被用来展示婚纱照和肖像画。可以俯瞰后院的凸窗对面的墙上挂着一幅五兄弟姐妹成年时在摄影室拍的照片，这幅照片取代了弗雷迪 14 岁时的一幅类似的照片。房间里唯一不是在摄影室拍的几张照片是我祖母的一张黑白照片，她戴着帽子、身着裘皮披肩，看上去气派而高贵——她和我的姨妈，两个年轻女孩，正从停在路易斯岛（the Isle of Lewis）斯托诺韦（Stornoway）的飞机舷梯上下来——那里是祖母出生的地方；还有一张照片，是唐纳德穿着他在纽约军事学院的制服正带领学校队伍参加纽约市哥伦布日的游行。靠墙的地方有两个用深蓝色和绿色的乙烯基软垫装饰的双人座椅，还有一把大椅子放在电视机前，孩子们经常在这里嬉闹。我的祖父，穿着他的三件套西装、打着领带，坐在靠近门旁那张沉重的松木电话桌的双人座椅上，双脚笔直地放在地上。

每个星期六，如果我们没在桑赛德陪父亲，弗里茨和我会骑自行车沿着汉兰德大道，沿着牙买加庄园后街的房子同我们的堂兄大卫一起出去玩，或者由弗里茨和大卫闲逛，我在旁边跟着。

每次姑妈玛丽安娜和伊丽莎白来访时，祖母都会和她们一道坐在一张天蓝色的福米卡塑料贴面的小桌子前，这张桌子的边缘是不锈钢的，看上去就像直接从上世纪 50 年代的汽水铺里搬来的。再走过去一点，是一间深色的餐具室，有一个走入式衣橱那么大，里面有一张小桌子，祖母把她的购物清单、收据和账单放在那里。玛丽，那个长年吃苦的管家，经常躲在那里，听着她的便携式收音机；每当下雨或寒冷的日子，大卫、弗里茨和我困在家里出不去的时候，我们就会把她逼疯。在餐具室的另一边，有一扇旋转门通向餐厅。我们就用这道转门，从后门跑过厨房，穿过门厅，在餐厅转个圈，再经过餐具室，回到厨房，把这些地方都变成了自己的跑道，相互追逐、嬉闹、尖叫、加速，总有人免不了要撞到某件家具。在冰箱和餐具室的门口之间，祖母通常会让我们自由发挥，但当她在厨房时，她就会失去耐心，大喊着让我们停下来。如果我们不理睬她，她便用木勺威胁我们——光是抽屉打开的声音就足以让我们停下来。但是，如果我们傻到继续绕着她跑、弄出响声，勺子就拿会出来，谁靠得最近谁就会被重重地打一顿。伊丽莎白在我们经过时抓住我们的头发，尽她的一份力让我们慢下来。

在那之后，弗里茨、大卫和我通常会跑去地下室——大人们只会在去洗衣房

或者是车库的路上经过那里，所以我们可以放声说话，在那里踢球，或者在祖母的电动扶梯上来来回回（抑或打闹）。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远处的开阔空间，所有的灯都开着。除了如我祖父真人大小的木制印第安酋长雕像像石棺一样堆靠在对面的墙上之外，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地下室：吊顶的日光灯、黑白相间的油毡瓦，还有一架古老的立式钢琴，戳在那里几乎不被人注意，因为它走调走得如此严重，甚至不值得一弹。唐纳德的军帽上插着他在纽约军事学院做护旗生的时候用过的巨大羽毛。有时我会戴上它，将下巴上的系带系紧，虽然那帽子还是会滑到我的鼻梁下面。

当我一个人在那里的时候——地下室里半明半暗，木制的印第安人在阴影里站岗——那就变成了一个奇特的异域空间。楼梯的拐角处建了一个巨大的红木酒吧，里面摆满了高脚凳、满是灰尘的玻璃杯和一个可以使用的水槽，但是没有酒——这在一个不喝酒的人建的房子里很不寻常。身后的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油画，画中是一位有着丰满的嘴唇以及动人摆臀的黑人歌手。她穿着一件镶有褶边的金黄色紧身连衣裙，站在麦克风前，张着嘴、伸出手。在她身后演奏的是一支完全由身穿白色晚礼服、打着黑色领结的黑人男子组成的爵士乐队。铜管闪闪发光，木管也闪闪发光。单簧管手的眼睛里闪烁着光芒，直视着我。我会站在吧台后面，肩上挂着毛巾，为我想象中的顾客们调酒。或者我会坐在其中的一把高脚凳上，作为唯一的赞助人，幻想着自己在这幅画里。

我们的叔叔罗伯特，他比我们大不了多少，看起来更像兄弟姐妹而不是叔叔，每次他从城里回来，都会和我们一起在后院踢足球。我们玩得很卖力，天热的时候，我们经常跑到厨房去拿一罐可乐或葡萄汁。罗伯特经常会抓起一块费城奶油芝士，靠在冰箱上，剥开锡箔纸，把奶油芝士当糖果一样吃下去，然后用苏打水把它冲下去。

罗伯特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足球运动员，我试图跟上男孩子们，但有时感觉他好像在拿我进行射门练习。

唐纳德在家里的时候，我们经常扔棒球或足球玩。尽管他曾在纽约军事学院打过棒球，他甚至比罗伯特更不善于收力；他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仅仅因为他的侄女和侄子才 6 岁、9 岁或 11 岁，就应该把球轻轻扔出去。当我成功地接住他扔给我的球时，我的皮手套发出的回响就像在打在挡土墙上的一声枪响那样。即使

有小孩，唐纳德也必须是赢家。

只有最执着的乐观主义者才能住在桑赛德大厦而不失去希望。没有门僮，有机玻璃前门两边的两个大花盆里的塑料植物和鲜花永远蒙着一层薄薄的灰尘。我们六楼的走廊里弥漫着难闻的烟味。潮湿的地毯泛着一种没有灵魂的海豹皮的灰色。冷漠的顶灯什么也遮掩不了。

我父亲的生活方式最好的时候是他和我母亲刚结婚，住在萨顿（Sutton Place）附近的一间卧室里的时候。在那一年里，他们晚上和朋友一起去科帕卡巴纳（Copacabana），周末坐飞机去比米尼（Bimini）。从那以后，一切都在走下坡路，正好与唐纳德的生活轨迹相反，随着时间的流逝，他自己的生活方式变得更加奢侈。唐纳德和伊万娜结婚时已经住在曼哈顿了。婚礼后，他们住在第五大道的一套两居室公寓里，后来又住在同样位于第五大道的一套八居室公寓里。不出五年，他们就住在特朗普大厦（Trump Tower）价值 1000 万美元的三层顶楼复式公寓里，而在此期间唐纳德实际上还在受雇于我祖父。

我祖父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创立了米德兰公司（Midland Associates），让他的孩子们从中受益。他的孩子每人拥有八栋大楼 15%的所有权，其中一栋就是桑赛德大厦。这显然是游走在法律边缘（如果不是彻头彻尾的欺诈）的财富转移，其明确目的就是为了避免支付一桩摆在台面上的交易预计需要缴纳的赠与税的大部分。我不知道父亲是否知道他拥有他现在居住的大楼的一部分，但在 1973 年，他拥有的那部分价值约为 38 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 220 万美元。他似乎没有明显的机会拿到任何钱——他的船和飞机都不见了；他的野马和美洲虎不见了。他仍然保留着虚荣的 FCT 车牌，但现在它们已经挂在一辆破旧的福特汽车上了。那时，我父亲拥有的财富都只是纸上富贵。要么是他无法动用信托基金，要么是他不再认为自己有权动用自己的钱。无论遇到怎样的挫折，他都要听他父亲的摆布。

父亲和我当时正在电视上看大都会队的比赛，突然对讲机响了。父亲看起来很惊讶，就去回答。我不知道是谁从大厅打来的电话，但我听到父亲低声说了句“见鬼”。我们原本准备度过一个悠闲的下午，但父亲现在似乎有些紧张。“唐

纳德会过来几分钟”，他告诉我。

“怎么了？”

“不知道。”他似乎很恼火，通常不是这样的。

铃声一响，父亲就把衬衫塞进去，打开了门。他向后退了几步，让他弟弟过去。唐纳德穿着三件套西装，闪亮的鞋子，拿着一个用几根宽橡皮筋扎着的厚厚的马尼拉信封。他走进客厅。“嗨，亲爱的”，他看到我打招呼。

我向他挥挥手。

唐纳德转过身，轻蔑地环顾四周，对我父亲说，“天哪，弗雷迪。”我父亲对此无动于衷。唐纳德把信封扔到咖啡桌上，说，“爸爸需要你在这些上面签名，然后把它们带到布鲁克林来。”

“今天？”

“是的。为什么？你忙吗？”

“你拿去给他。”

“我不能。我正在去城里的路上，去看一些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房产。现在是占那些在市场高点买入的输家便宜的绝佳时机。”

弗雷迪永远不敢在布鲁克林以外的地方开发自己的项目。几年前，在一次周末去波科诺（Poconos）的旅行中，当他和琳达开车经过跨布朗克斯区高速公路两边一排又一排废弃的建筑时，她指出，他可以自己创业，在布朗克斯区翻新建筑。

“我不可能和爸爸作对”，弗雷迪说，“对他来说，布鲁克林就是一切。他不会允许的。”

这时唐纳德望着窗外说，“爸爸在布鲁克林需要一个人。你应该回去。”

“有什么可做的呢？”父亲嘲笑道。

“我不知道。不管你以前做什么。”

“我以前做你那份工作。”

在令人不安的沉默中，唐纳德看了看手表。“我的司机在楼下等着。四点前把这个给爸爸，好吗？”

唐纳德走后，父亲挨着我坐在沙发上，点了一支烟。

“好吧，孩子”，他说，“想去布鲁克林兜兜风吗？”

我们去办公室时，父亲在去艾米（Amy Luerssen）家的路上兜了一圈，她是我祖父的秘书和管家（同时也是我的教母），她的办公桌就在她老板的门外。艾米阿姨显然很喜欢这个被她称为“我的弗雷迪”的男人。

我祖父的私人办公室是一间光线昏暗的方形房间，墙上挂满了牌匾和装裱好的证书，还有许多头戴完整头饰的印第安酋长的木制半身像散落在各处。我坐在他的桌子后面，从他家里似乎无穷无尽的蓝色记号笔和廉价的厚便签纸中挑选一些东西，一边写笔记，一边画画，直到午饭时间。只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在他的椅子上疯狂地转着圈。

我的祖父总是带我们去 Gargiulo’s 吃饭，这是一家正式的餐厅，有干净的餐巾和桌布，他几乎每天都去。恭敬的侍者都认识他，都叫他“特朗普先生”，并把椅子拉出来，整顿饭都在忙着照顾他。艾米阿姨或办公室里的其他人加入我们的行列会更好，因为这样可以减轻父亲的压力；他和祖父几乎没有什么话可说了。唐纳德和我们同时在办公室的情况并不经常发生，但当我们相遇时，情况就更糟了。他表现得好像这地方是他的，祖父似乎不仅鼓励他这么做，而且还很享受。在有唐纳德的场合里，我的祖父变了。

1973 年，司法部民权部门（Civil Rights Division）起诉唐纳德和我祖父，因为他们违反了 1968 年的《公平住房法案》(Fair Housing Act)，拒绝把房子租给黑人社区(die Schwarze)，这是我祖父说的。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联邦住房歧视诉讼之一，臭名昭著的律师罗伊·科恩(Roy Cohn)表示愿意提供帮助。唐纳德和科恩在 Le Club 相遇。Le Club 是东 55 街的一家豪华的会员式餐厅和迪斯科舞厅，范德比尔特和肯尼迪家族、一系列国际名人和小贵族都经常光顾这里。科恩因卷入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失败的反共产主义运动而被排除在圈外十多年。他被迫辞去参议员首席法律顾问的职务，但这是在他摧毁了数十人的生活和职业生涯之后，因为这些人被指控是同性恋，或者与共产主义有瓜葛。

与许多像他那种性情恶毒且有影响力的人一样，科恩不受任何约束。科恩受到纽约精英阶层的欢迎，并被各种各样的客户所雇佣，比如鲁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约翰•戈蒂(John Gotti)、艾伦•德肖维茨(Alan Dershowitz)以及纽约的罗马天主教大主教。科恩在他长大的纽约市开始了私人执业。在接下

来的几年里，他变得非常富有，非常成功，非常有权力。

虽然科恩在弗雷德保守的地方很花哨，在弗雷德沉默寡言的地方很大声，但他们之间的区别实际只是程度上的差异，而不是本质上的。科恩的残忍和虚伪更为公开，但弗雷德在家庭的亲密关系中也掌握了这些技巧。弗雷德还暗示唐纳德会被科恩这样的人所吸引，就像他后来会被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金正恩(Kim Jong-un)或其他任何人所吸引一样，因为他愿意奉承，也有权力让自己中饱私囊。

科恩建议特朗普管理集团对司法部提起反诉，要求司法部赔偿 1 亿美元，原因是他指控政府对其客户做出了虚假和误导性的陈述。这种做法既荒谬，又华而不实，但至少就它获得的知名度而言是有效的;这是 27 岁的唐纳德第一次登上报纸的头版。虽然反诉将在庭外被驳回，但特朗普管理集团解决了此案。他们没有承认自己有不当行为，但他们确实不得不改变自己的租赁做法，以避免歧视。尽管如此，科恩和唐纳德都认为这是一个胜利，因为所有的媒体都报道了此事。

当唐纳德把自己的财富与罗伊•科恩这样的人拴在一起时，他唯一的优势就是弗雷德的慷慨，以及对自己才华和优越性的一种精心培养的、但不切实际的信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所锻炼出的辩护和防御能力曾经保护他免遭冷漠、恐惧和冷落的侵害，这是他早年留给世人的印象，但随着他被迫看到弗雷迪遭到虐待,他形成了一种他的哥哥显然缺乏的能力:他父亲所要求的成为“杀手”和代理人的能力。

我们无法确切知道弗雷德是什么时候开始注意到唐纳德的,但我怀疑是在他把儿子送去军校之后。唐纳德似乎听从了父亲的谆谆教诲，要做一个强硬的“杀手”。他炫耀自己被高年级学生随意殴打的经历，或者假装不在乎自己被驱逐出去，这些都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弗雷德对唐纳德日益增长的信心在他们之间建立了一种纽带，也使唐纳德形成了不可动摇的自信。毕竟，家里最重要的人，唯一说了算的人，最终还是对他表示了好感。与弗雷迪不同的是，唐纳德从父亲那里得到的关注是积极的。

大学毕业后，当唐纳德终于走上社会，利用父亲的关系结交更多的朋友，利用父亲的钱塑造自己迅速成长为宇宙主宰的形象时，弗雷德知道，他儿子得到的任何荣誉都会为他带来好处。毕竟，如果唐纳德被视为一个积极进取的交易撮合

者，这完全要归功于弗雷德·特朗普——尽管弗雷德是唯一知道这一点的人。

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采访中，弗雷德声称唐纳德的成功远远超过了他自己。“我让唐纳德自由发挥”，他说，“他具有非凡的视野，凡是他碰过的都彷佛变成了金子。唐纳德是我认识的最聪明的人。”这些都不是真的，弗雷德在说这话的十年前肯定就知道了。

在障碍赛公园项目之后，弗雷德失去了很多地盘。如果他想扩大他的帝国，他将需要一片新的竞技场和代理人。他需要唐纳德走出去创造这个品牌。没过多久，弗雷德就意识到，他那挥霍无度的二儿子不适合那种单调乏味、预算紧张、严格管制的经营租赁物业的例行公事。但在他父亲的支持下，或许他可以利用自己的傲慢和无耻，进军曼哈顿。弗雷德并没有活在间接代理的状态中；他密切地参与了唐纳德早期进军曼哈顿市场的各个方面，当唐纳德在前面向人群表演时，他在幕后做事情。弗雷德让唐纳德得以扮演这样一个角色，既满足了他对获得认可的渴望，又让他的儿子获得了弗雷德一直期盼的曼哈顿开发商的名声。弗雷德永远不会得到公众的认可，但只要他知道——如果没有他，唐纳德获得扬名立万并提升自己的机遇都不会实现，这就够了。成功和赞扬都归功于弗雷德和他的巨额财富。任何关于唐纳德的故事实际上都是关于弗雷德的。弗雷德也知道，如果这个秘密被发现，这个诡计就会土崩瓦解。回想起来，弗雷德是那个木偶操纵者，但他并没有在操纵儿子。这并不是说弗雷德忽视了唐纳德作为一个商人的无能；他知道他在那个舞台上有足够的天赋来配合他们。弗雷德愿意投入数百万美元在他的儿子身上，因为他相信他可以利用的技能唐纳德也有——作为自我推销的专家、无耻的骗子、营销人员以及品牌的建设者——去实现他一直无法实现的一件事:获得一种与他的自负相称的名望，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他的野心，这是单靠金钱永远无法做到的。

20世纪80年代末，情况发生了逆转，弗雷德再也无法忍受儿子的粗暴无能；他别无选择，只能继续投资。他的怪物被放出笼子了。他所能做的就是减轻损失，保持现金流动，并找其他人来承担责任。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父亲变得更加沉默寡言，更加冷酷，可能还有——变得更瘦了。桑赛德大厦的公寓是灰色的，因为它向西北方向暴露，灰色来自于无休

止的香烟烟雾，来自于他糟糕的情绪。有些早晨，他连起床都做不到，更不用说陪我们度过一整天了。有时他还宿醉不醒；有时是他的抑郁加重了。如果我们没有安排任何事情，父亲经常找借口让我们自己呆着，说他要工作或有事要去找祖母。

有一次，父亲告诉我们他有一份管理报童的工作。我大致看了看送报路线，据我所知，这意味着他就是那个从自己的汽车后备箱搬出报纸发给报童，然后在他们送完后从他们那里收取现金的人。有一次他告诉我，他一天赚 100 美元，这对我来说是一大笔钱。

一天晚上，我们和父亲的女朋友约翰娜在公寓里吃晚饭。我更喜欢她不在的时候;她身上有些东西让人讨厌。她根本就没有接触我和弗里茨，甚至连试都没试过。考虑到她不是英国人，她说“弗雷迪，让我抽根烟吧”这样的话已经够糟糕的了，但父亲也开始这么讲话了。

我们刚吃完饭，我就开始讲述那天下午我和母亲在银行的大胆经历。当她在长长的队伍中等待的时候，我却站在一个柜台前填写各种化名的存款单，以及为了资助各种计划而打算取出的大笔的钱。我觉得整件事都太好笑了，简直忍不住。但当我告诉他们秘密身份、秘密提款，以及我分散它们的邪恶计划时，父亲的眼睛里露出了警惕的神色。

“托斯提先生知道这件事吗?”他问道。

如果我仔细听，我可能会停下来，但我以为他是在开玩笑，所以我一直在讲我的故事。

父亲越来越激动，身体前倾，用手指着我。“你做了什么?”尽管父亲如此喜怒无常，我却很少看到他这么生气，也几乎没有听过他提高嗓门说话。我很困惑，试图追溯我的叙述，回到他开始认为我做错了什么事情的地方。但并没有这样的问题，我对事情真相的解释只会使他更加不安。

“如果托斯提先生发现了这件事，你爷爷会找我麻烦的。”

约翰娜把手放在父亲的胳膊上，好像要把他的注意力从我身上引开。“弗雷迪”，她说，“这没什么。”

“‘没什么’是什么意思？这混账事真的很严重。”

听到骂人的话，我畏缩了一下。

在那一刻，我和约翰娜都知道没有什么能说服他。他喝醉了，陷入了某些陈年旧事。我试图向他解释，使他镇定下来，但他已经回不来了。那时我才八岁。

1975 年夏天，唐纳德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在会上他展示了建筑师对君悦酒店(Grand Hyatt)的设计方案，仿佛他已经赢得了替换 42 街中央车站(Grand Central Terminal)隔壁的老康懋达（Commodore）酒店的合同。媒体把他的说法作为事实报道。

那年夏天，就在弗里茨和我准备去夏令营之前，父亲告诉母亲他有个消息。于是母亲请他吃饭。父亲按门铃的时候，我去开门。他穿着他几乎总是穿的衣服——黑色的宽松裤和一件白色的衬衫——但是他的衣服是松脆的，他的头发是向后梳的。我从未见过他这么英俊。

母亲在拌沙拉，父亲在我们的小露台上烤牛排。食物准备好后，我们坐在露台旁边的小桌子旁，把门撑开，这样夏天温和的微风就可以吹进来。我们喝了水和冰茶。

“我将在夏末搬到西棕榈滩”，他告诉我们，“我在市区找到了一套很棒的公寓，后面有个码头。”他已经选好了一艘船，我们去的时候，他会带我们去钓鱼和滑水。当他说话的时候，他看起来很开心，很自信，也很放松。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们第一次感到了希望。

第八章 逃逸速度

我坐在餐桌前，把鞋放在我的面前，试图弄明白这是怎么了。我把树底下剩余的盒子翻了个遍,认为可能是同一双鞋的两只被分开包装了,但是没有,只有一只——一只带有四英寸鞋跟的金色花边鞋塞满了硬糖。糖果和鞋子都用玻璃纸包裹着。这东西是从哪儿来的?我想知道。这是门票奖品还是午餐派对上的意外所得?

唐纳德从厨房穿过餐具室。当他从我身边走过时，他问，“那是什么?”

“这是你送给我的礼物。”

“真的吗?”他看了一眼。“伊万娜!”他对着门厅喊道。她站在客厅附近的圣诞树的另一边。“伊万娜!”

“怎么了，唐纳德?”

“这太棒了。”他指着鞋子，她笑了。也许他以为那是真金。

这一切始于1977年,当时我收到了三套零售价为12美元的布隆米(Bloomie)内衣，这是唐纳德和他的新婚妻子伊万娜送给我的第一份圣诞礼物。同一年，他们送给弗里茨一本皮面杂志。看起来好像是给年纪大一些的人看的，但它真的很好，我觉得有点被轻视了，直到我们意识到它已经过时了两年。至少内衣不会过期。

度假的时候，唐纳德和伊万娜会开一辆昂贵的跑车，或者是一辆司机驾驶的豪华轿车，比我祖父的还要长。他们像社交名流一样大摇大摆地走进大厅，伊万娜穿着皮草和丝绸，梳着夸张的发型和妆容，唐纳德穿着昂贵的三件套西装和闪亮的鞋子，相比之下，其他人看起来都很保守，不那么时尚。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一直认为是唐纳德独自一人创立了这个公司，把我的家族变成了一个品牌，而我的祖父，偏狭而吝啬，只关心赚钱和存钱。在这两方面，事实截然不同。2018 年 10 月 2 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揭露了我的家族在过去几十年里从事大量涉嫌欺诈的、游走在法律边缘的和非法的活动，其中包括以下段落:

弗雷德·特朗普和他的公司也开始向唐纳德·特朗普提供大额贷款和信贷额度。这些贷款使其他特朗普家族获得的贷款相形见绌，这些贷款的流量有

时如此稳定，就好像唐纳德·特朗普有自己的金库一样。以 1979 年为例，根据提交给新泽西赌场监管机构的记录，他在 1 月借了 150 万美元，2 月借了 6.5 万美元，3 月借了 12.2 万美元，4 月借了 15 万美元，5 月借了 19.2 万美元，6 月借了 22.6 万美元，7 月借了 240 万美元，8 月借了 4 万美元。

1976 年，罗伊·科恩建议唐纳德和伊万娜签署一份婚前协议，伊万娜的补偿条款是基于弗雷德的财富，因为当时唐纳德的父亲是他唯一的收入来源。我从祖母那里听说，除了赡养费、子女抚养费和这套公寓外，在伊万娜的坚持下，婚前协议还包括一笔 15 万美元的“雨天”基金。我父母的离婚协议也是基于我祖父的财富，但伊万娜的 15 万美元基金，相当于我母亲每月 600 美元的抚养费和赡养费之和的近 21 年。

在伊万娜之前，假期总是千篇一律，这使它们的记忆模糊在一起。我五岁的圣诞节和十一岁的圣诞节没什么区别，例行公事从未改变过。我们会在下午 1 点从前门进入房子。那里堆着几十个包裹，到处都是握手和飞吻，然后大家聚在客厅里吃虾仁杯。和前门一样，我们一年只用两次客厅。父亲来了又走了，但我不记得他去过那儿。

感恩节和圣诞节的晚餐是一样的，尽管有一个圣诞节，祖母大胆地做了烤牛肉而不是火鸡。这是一顿人人都喜欢的饭，但唐纳德和罗伯特很生气。祖母在整个用餐时间都低着头，双手放在膝盖上。就在你以为这个话题永远不会再提的时候，其中一个会说“天哪，妈妈，真不敢相信你居然没做火鸡。”

伊万娜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员后，就和唐纳德一起坐在了权力中心，他坐在我祖父的右手边，这是唯一与他平等的人。离他们最近的人(玛丽安娜、罗伯特和伊万娜)组成了一个带着任务的气氛组:支持唐纳德，在交谈中顺着他、听从他，就像没有人比他更重要一样。起初，我认为这只是一种权宜之计——玛丽安娜和罗伯特早就知道，与他们父亲明显的偏好相矛盾是没有意义的。“我从来没有挑战过我的父亲”，玛丽安娜说，“从没。”这样做更容易一些。唐纳德的幕僚长就是这种现象的典型例子。至少在一段时间内，约翰·凯利(John Kelly)和米克·马尔瓦尼(Mick Mulvaney)会毫无保留地以同样的方式行事——直到他们因为不够“忠诚”而被赶下台。拍马屁的人都是这样的。首先，无论主子犯下何种

暴行，他们都保持沉默；然后他们通过不采取行动使自己成为同谋。最终，当唐纳德需要一个替罪羊时，他们发现自己是可以被牺牲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弗雷德对待唐纳德和他的其他孩子之间的差异变得非常明显。对罗伯特和玛丽安娜来说，更简单的做法是服从“党派”路线，希望他们不会受到更坏的对待，这似乎也是国会的共和党人现在每天都在做的盘算。他们也知道当我父亲没有达到弗雷德的期望时发生了什么。坐在桌子另一头的我们都是多余的；我们的工作是填补便宜的座位。

在金色的花边鞋事件一年之后，唐纳德和伊万娜给我的礼物篮开始“变本加厉”：要么明显的转赠品，要么没有任何用，而且它表明了伊万娜对玻璃纸的嗜好。拆开包装后，我注意到，在一罐美味沙丁鱼、一盒矿泉水饼干、一罐用苦艾酒浸泡的橄榄和一条意大利腊肠中间，有一个圆形的凹痕，印在篮子的底部，那是另一罐东西曾经放过的地方。我的堂兄大卫走过，指着空着的地方问，“那是什么？”

“我不知道。我想应该是和这些东西搭配的吧。”我说着，举起了那盒饼干。

“可能是鱼子酱”，他笑着说。我耸耸肩，不知道鱼子酱是什么。

我抓起篮子把手，朝我放在楼梯旁边的那堆礼物走去。在路上，我碰到了伊万娜和祖母，提起篮子，说了句“谢谢你，伊万娜”，然后把它放在地板上。

“那是你的吗？”

一开始我以为她说的是礼物篮，但她指的是我已经打开的一堆礼物上面的那份 *Omni* 杂志。*Omni* 是一本科学和科幻小说杂志，于当年 10 月发行，是我新的嗜好。当时我刚拿到 12 月份的那期杂志，把它带到了家里，希望在吃晚饭和吃虾的间隙能把它读完。

“哦，是的。”

“出版商鲍勃是我的一个朋友。”

“不会吧！我喜欢这本杂志。”

“我把他介绍给你。你到城里去见见他。”

虽然没有像听到我要去见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那么震撼，但也很接近了。“哇。谢谢。”

我盛了一盘吃的，上楼来到父亲的房间，他在那里呆了一整天，病得太厉害，

不能和我们一起聚会。他坐起来，听着他的便携式收音机。我把盘子递给他，但他把盘子放在床头柜上，不感兴趣。我告诉他伊万娜的慷慨提议。

“等一下，她想把你介绍给谁?”

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名字。在和伊万娜交谈之后，我马上看了看杂志的报头，看到了他:鲍勃·古奇奥尼（Bob Guccione），出版人。

“你要去见《阁楼》（*Penthouse*）的出版商?”即便在 13 岁的时候，我就知道《阁楼》是什么了。我不相信我们谈论的是同一个人。父亲笑着说，“我不觉得这是个什么好主意。”突然之间，我自己也不知道了。

母亲收到的礼物让人笑不出来。在她和我父亲离婚数年后，为什么她仍然被期望参加家庭度假是一个谜，但她为什么去是一个更大的谜。显然，特朗普家不希望她出席，正如她也不希望自己出席一样。他们送给她的一些礼物已经够好的了，但是这些礼物总是比送给伊万娜和罗伯特的妻子布莱恩的礼物来得少。更糟糕的是，其中许多显然是被转赠的。有一年，她从伊万娜那里得到一个手袋，那是一个奢侈品牌，但里面有一张用过的纸巾。

吃过晚饭，打开礼物后，我们就分开了——有些人去厨房，有些人去后院，其余的人去了书房。我在书房门口的地板上盘腿而坐。不管唐纳德和罗伯特看的是什么哥斯拉电影，还是足球比赛，我都从远处看。过了一会儿，我注意到母亲不在。起初我并不担心，但她没有回来，我就去找她。我查看了厨房，但只找到了我的祖母和姑妈们。我走到后院，我哥哥和堂兄大卫正在那里踢足球。当我问弗里茨她在哪里时，他说，“我不知道”，显然不感兴趣。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不需要问就能知道去哪里找她，但最初几次让我感到恐慌。

母亲在餐厅里，独自坐在桌旁。这时，餐具柜已经清理干净了，唯一能证明这顿饭的就是地上散落的几张餐巾布。我站在门口，希望她会注意到我，希望我的出现能让她重新活跃起来。我什么也不敢说，不想打扰她。厨房里传来碗碟、剩菜和冰淇淋蛋糕的哗啦声，暮色中，我走近那张红木桌子。枝形吊灯已经熄灭了，但我希望光线能更暗一些，这样我就不用看到母亲的脸了，她看起来是那么痛苦。

我坐在她旁边的椅子上，小心地不去碰她。除了团结一致之外，我无法给予

或获得任何安慰。

在收到内衣礼物的 8 个月前，唐纳德和伊万娜在大理石学院教堂（Marble Collegiate Church）结婚，并在 21 岁俱乐部（21 Club）俱乐部举行了婚宴。母亲、弗里茨和我被安排到堂兄妹的桌子上，父亲不在那里。家人告诉我的谎言是父亲原本要被请来当唐纳德的伴郎以及婚宴上的主持人(那实际上是乔伊·毕晓普的角色)，但家里决定他需要呆在佛罗里达照顾维克叔叔，祖母的妹夫。事实是，我祖父只是不想让他参加婚礼，别人也告诉他不要来。

当唐纳德在曼哈顿四处游荡寻找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资产的时候，我几乎每周都要损失“数万美元”。周五放学后，我去朋友家玩我们那个版本的大富翁游戏:双倍的房产和旅馆，双倍的钱。我们整个周末都在进行马拉松式的游戏。一场比赛可能持续 30 分钟到几个小时不等。在所有的游戏中唯一不变的是我的表现:我每次都输了。

为了给我一个奋斗的机会(也为了给我的朋友一些挑战)，我被允许从银行和我的对手那里借越来越多的钱。我们在封面内侧用一长串的数字写下我所欠的钱，以此来合计我欠下的巨额债务。

尽管我最终的表现很差，但我从未改变过我的策略;我买下了大西洋城(Atlantic City)的每一处地产，并在自己的地产上建了房子和酒店，即便是在没有机会收回投资的情况下。不管我输得有多惨，我还是下了两倍和三倍注。作为房地产大亨的外孙女和外甥女，我不擅长房地产，这是我和朋友之间的一个大笑话。原来唐纳德和我还是有共同点的。

自从我父亲去世后，唐纳德暗示过“他们”(指他和我的祖父)本应该“让”弗雷迪做他喜欢的和擅长的事情(飞行)，而不是强迫他做他讨厌的和不擅长的事情(房地产)。但没有证据表明，我父亲缺乏运营特朗普管理集团的技能，就像没有证据表明唐纳德有这些技能一样。

1978 年的一个晚上，父亲在西棕榈滩的公寓里醒来，胃痛得要命。他设法把自己拖进车里，开到急救室。后来他告诉母亲，当他到了医院的时候，他并没

有马上进去。他呆在车里，不知道是否该麻烦医院。他曾想，如果一切都结束了，也许事情会简单一些。迫使他寻求帮助的唯一原因是想到了我和弗里茨。

父亲病得很重，被转到迈阿密的一家医院，医生诊断他患有心脏缺陷，需要动手术。弗雷德告诉玛丽安娜飞到佛罗里达，把他从医院接出来，带回纽约。这将是我父亲最后一次北上旅行。在佛罗里达待了三年之后，他要回家了。

在纽约，医生发现父亲的二尖瓣有缺陷，心脏也大得危险。他需要接受一项实验，用猪心脏的健康瓣膜替换它。

当母亲和我在父亲手术的前一天到他家里去看他时，伊丽莎白已经在那里了，和他一起坐在他童年时代的小卧室里，我们称之为“牢房”。他躺在帆布床上，我吻了吻他的脸颊，但没有坐在他旁边，因为我怕打扰他。我以前见过父亲生病——肺炎、黄疸、酗酒、绝望——但他现在的状况令人震惊。他还不到四十，看上去就像一个精疲力竭的八十岁老人。他跟我们讲了手术和猪瓣膜的事，母亲说:“弗雷迪，幸好你不是犹太教的。”我们都笑了。

康复时间很长，父亲就呆在家里休养。手术一年后，他的病情有所好转，但他再也不能独立生活了。部分障碍可能是财务方面的。他又开始为我祖父工作，但这次是在维修队。这并不奇怪，除了几次戒酒，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喝酒。有一次他告诉我，他的一个医生警告他，“如果你再喝一杯，你就会死的。”即使是心脏手术也不足以阻止他。

那个感恩节，父亲自从搬回纽约后第一次加入我们的聚会。他和我一起坐在桌子祖母在的那一头，苍白又瘦得像个幽灵。

饭吃到一半的时候，祖母噎住了。“妈妈,你还好吗?“父亲问。其他人似乎没有注意到。当她继续挣扎时，桌子另一头的几个人抬起头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但随后低头看着自己的盘子继续吃。

“好了”，父亲说着，把一只手放在祖母的胳膊肘下，轻轻地扶她起来。他把她领到厨房,在那里,我们听到父亲使用海姆利克氏急救法让祖母拖着脚走路，还听到了令人沮丧的咕噜声；这是他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当志愿救护车司机时学会的。

他们回来时，响起了一阵断断续续的掌声。“干得好，弗雷迪”，罗伯特说，

就好像我父亲刚刚杀死了一只蚊子。

唐纳德无处不在，甚至当他不在家的时候。每次我父亲想要去厨房或回他的房间时，他都必须穿过散落在早餐桌上的杂志封面和报纸文章的挑战。自 1973 年那场官司以来，唐纳德一直是纽约小报的主角，我祖父收集了每一篇提到他名字的文章。

父亲搬回家的时候，唐纳德正在筹备君悦酒店的交易，那只不过是 1972 年祖父与唐纳德在新泽西组建合伙企业的一个更复杂的版本。君悦酒店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我祖父与纽约市长阿贝·比姆(Abe Beame)有联系。弗雷德还慷慨地为市长和州长休·凯里（Hugh Carey）的竞选活动捐款。凯里的筹款人路易丝·赛辛尼(Louise Sunshine)帮助促成了这笔交易。为了敲定协议，比姆向他提供了每年 1000 万美元的税务减免，这一优惠将持续 40 年。当康懋达酒店的拆除工作开始时，纽约媒体相信了唐纳德的话，不断地把这笔交易说成是唐纳德一手完成的。

也许是为了弥补自他搬回纽约后我们之间的隔阂，父亲告诉我，他想在 1981 年 5 月为我举办一个十六岁甜蜜派对。几个月前，君悦大酒店举行了盛大的开业典礼，父亲说他想问问唐纳德，我们是否可以用一间小一点的舞厅。唐纳德似乎很渴望有机会向家人炫耀他的新项目，他欣然同意了，甚至给了他一个折扣。

几天后，父亲告诉了祖父聚会的计划，当时我们三个人都在早餐室，随处可见的剪报铺满了桌子。“弗雷德”，他生气地说，“唐纳德很忙，他不需要这些屁事搅扰。”

潜台词很清楚:唐纳德很重要，他正在做重要的事情，你不重要。

我不知道这种情况是怎么解决的，但父亲最终成功了。我就要开自己的派对了。

当天我的大多数客人都到了，唐纳德入场时，我和一群朋友站在一起。他向我们走来，没有打招呼，而是张开双臂说，“这不是很棒吗?”

我们都认为它确实很棒。我再次感谢他让我们住这家酒店，然后把他介绍给

大家。

“你觉得那个大厅怎么样?了不起的,对吧?”

“了不起”，我说。我的朋友们点了点头。

“没有其他人能让这里如此焕然一新。看看那些窗户就知道了。”

我担心他接下来会告诉我们浴室瓷砖有多棒，但他看到了我的祖父母，握了握我的手，吻了吻我的脸颊说，“玩得开心，亲爱的”，然后走到他们身边。我父亲独自坐在离他们几张桌子远的地方。

当我转向我的朋友们时，他们正盯着我。

“那是什么鬼东西?”其中一个问道。

1981 年夏天，玛丽安娜开车送我父亲去新泽西州贝尔米德(Belle Mead)的开利诊所(Carrier Clinic)，距离贝德明斯特地产大约有半小时车程，唐纳德后来把那里变成了一个高尔夫球场。父亲在很不情愿的情况下，完成了 30 天的治疗项目。在他的治疗周期即将结束时，玛丽安娜和她的第二任丈夫约翰·巴里(John Barry)把他接回了家里，那家诊所可以说可能是他去过的最糟糕的地方。当姑妈第二天去看他时，父亲已经又开始喝酒了。

弗雷迪失去了他的家和家人、他的职业、他的大部分意志力和他的大部分朋友。最后，他的父母成了唯一能照顾他的人。他们对此很不满。最终，弗雷迪的存在激怒了他的父亲。

弗雷德对待我父亲的态度一直是对其他孩子的一个实物教训——一种警告。然而,最终,人身控制变成了完全不同的东西。弗雷德掌握着施虐者的全部力量，但弗雷德最终还是被困在了这样的环境中;弗雷迪由于酗酒和健康状况的恶化而越来越依赖弗雷德，因为弗雷迪被绑在弗雷德身上。弗雷德没有想象力，也没有能力在他所创造的环境之外找到出路。这种情况证明他的力量是有限的。

那年八月，当我从夏令营回到家后，我宣布我想去寄宿学校。我对父亲解释说，我在基尤森林学校（Kew-Forest）——我的姑妈和叔叔们都去过的那所非常小的学校——待了 10 年之后，我感到很闷、很无聊。我想要更多的挑战，一个有校园的地方，更好的体育设施，更多的机会。父亲警告过我成为大池塘里的一

条小鱼的危险，但我想他也理解我说的理由都是真的，我需要离开。

问题是我只有三周的时间来思考我想去的地方，填写申请表，然后被录取。1981 年 8 月的最后两周，我和母亲参观了康涅狄格州和马萨诸塞州几乎所有的寄宿学校。

在我等结果的时候，我们需要得到祖父的许可，至少父亲是这么说的。

我们俩站在我祖父常坐的双人座椅前，父亲解释了我的想法。“她为什么要这么做?”祖父问，好像我站在他面前似的。“基尤森林学校很好。”他在那里的校董会待了将近 30 年。

“是时候做出改变了。行了吧，爸爸。这对她有好处。”

虽然这笔钱来自父亲的信托基金，对他没有任何影响，但祖父还是抱怨额外的花费，并重申了他对基尤森林学校的优越性的信念。但是父亲并没有让步。

我想祖父并不真的关心我在哪里上学，但我很感激父亲再次站在我身边。

在去寄宿学校的前一天，我离开了汉兰达的公寓，骑着自行车去了祖父母家。我沿着车道滑行，把自行车靠在车库旁边的高高的砖墙上，然后爬上楼梯，走到通往后门的小路上。

九月初的午后，后院很安静。我跳上两级台阶，来到水泥露台上，按响了门铃。那里没有户外家具，只有一块空地。我们小的时候唯一用过这块空地的人是我叔叔罗伯特。曾经有一段时间，那里有几把铁制的椅子，当他周末回家的时候，他会把它们合在一起，用其中一张当脚凳，给自己涂上一层润肤油，并把他的折叠铝制日光浴反光罩托在下巴底下。

好几分钟过去了。我刚要再按门铃，祖母终于开了门。她看到我似乎很惊讶。我把纱门拉向我，想进去，但祖母还站在门口。

“嗨，奶奶。我是来看爸爸的。”

祖母站在那里，在围裙上擦手，看上去紧张，好像我刚刚抓住了她在做什么。我提醒她我第二天就要去上学了。她个子很高，金黄色的头发盘在脑后，看上去比平时严肃多了。她没有动一下让我进去的意思。

“你爸爸不在家”，她说，“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

我被搞糊涂了。我知道父亲想送我——几天前我们还谈过这件事。我以为他

已经忘了我要路过这里。去年，他经常忘记我们什么时候有计划。确切地说，我并不惊讶，但有些东西似乎还是不对。就在我和祖母站的位置的正上方，从父亲卧室开着的窗户传来了收音机的声音。

我对着祖母耸了耸肩，装出不在乎的样子。“好吧，那么，我想让他稍后给我打电话。”我走过去想拥抱她，她僵硬地搂住了我。当我转身要走时，我听到门关上了。我沿着小路和楼梯走到车道，骑上自行车，骑回家。第二天我就去上学了。父亲就一直没有给我打电话。

我当时正在艾索沃克女子高中（Ethel Walker School）的新礼堂看电影，这时放映机变暗，灯光亮了起来。学生们当时正在那里观看《山的另一边》（*The Other Side of the Mountain*），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故事，关于一个奥林匹克滑雪选手在滑雪事故中瘫痪的事迹。取而代之的是，《午夜的另一面》（*The Other Side of Midnight*）——一部有着早期强奸场景的完全不同类型的电影——已经被预订了。全体教员都在为下一步该做什么而烦恼，而我们学生却认为这让人异常兴奋。

当我和寝室里的几个孩子坐着有说有笑的时候，我看见戴安·邓恩（Diane Dunn），一位体育老师，从人群中挤了进来。邓恩还是我每年夏天都会去的航海夏令营的顾问，所以我从小就认识她。对沃克高中的其他人来说，她就是邓恩小姐，这让我无法理解。在夏令营里，她是邓恩，我是特朗普，我们一直这样称呼对方。我决定去这所寄宿学校，很大程度上是她的原因。我在那儿才两周，她仍然是我真正认识的唯一一个人。

当她向我招手时，我笑着说，“嘿，邓恩。”

“特朗普，你得给家里打个电话”，她说。她手里拿着一张纸，但没有给我。她看起来很慌张。

“怎么了?”

“你得给你妈妈打电话。”

“现在?”

“是的。如果她不在家，给你的祖父母打电话。”她跟我说话的样子好像已经记住了台词似的。

当时差不多已经是晚上 10 点了，我从来没有这么晚给我祖父母打过电话，但我的父亲和祖母都经常住院——父亲是因为多年来酗酒和吸烟，而祖母则因为骨质疏松症经常骨折。所以我并不真的担心——或者说，我不认为情况比平常更严重。

我的宿舍就在礼堂旁边，所以我走了出去，穿过它们之间的椭圆形草坪，爬了两层楼梯来到我住的楼层。公用电话挂在楼梯间的墙上，就在门边。

我给母亲打了一个对方付费电话，但没人接，于是我就往家里拨了。祖母接了电话，也付了费用——所以紧急情况与她无关。她低沉而急促地说了声“你好”后，立刻把电话递给了祖父。

“喂”，他像往常一样敏捷，公事公办。一时间，人们很容易相信是搞错了，没有什么真的不对劲——但的确发生了一件非常紧急的事情，我被拉出了礼堂，我还看到邓恩惊恐地睁大眼睛在礼堂里找我。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想到她已经知道了。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我问。

“你妈妈刚出去了”，他说，“她应该几分钟后就到家了。”我能想象出他站在灯光昏暗的书房电话桌旁，穿着笔挺的白衬衫，红色领带，海军蓝三件套西装，急不可待地等着早点了结我这边的事。

“那又怎么了?”

“你父亲已经被送到医院了，但没什么好担心的”，他说话的语气仿佛在播报天气。

我当时就可以挂电话了。我本可以回去努力融入新学校的新集体。

“是他的心脏吗?”我这样讲话有点一反常态，除了唐纳德之外，从来没有任何人用任何方式质疑我的祖父，但很明显，我被告知打这个电话是有原因的。

“是的。”

“那么很严重咯。”

“是的，我认为很严重。”他说这句话时停顿了一下，也许，他在决定是否要告诉我真相。“睡吧”，他最后说。“早上给你妈妈打电话。”他挂断了电话。

我站在楼梯间，手里拿着电话，不知道该怎么办。楼上的一扇门砰地一声关上了。后面跟着脚步声，声音越来越大。几个学生在去一楼的路上从我身边经过。

我把话筒放回摇篮，拿起话筒，又打给我母亲。

这次她接了电话。

“妈妈，我刚和爷爷通了话。他告诉我父亲住院了但他不肯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他没事吧?”

“他心脏病发作了”，母亲说。

从她说话的那一刻起，时间就变得不一样了。又或者是下一个瞬间，我不记得了，这种冲击的影响是可以追溯的。不管怎样，母亲一直在说，但我一个字也没听到。据我所知，谈话中没有任何空隙，但对我来说，有一部分空隙从未存在过。

“他心脏病发作了?”我说，重复着我听到的最后几个字，好像我没有漏掉什么重要的东西。

“哦，玛丽，他死了。”母亲开始哭了起来。“我曾经真的爱过他”，她说。

母亲继续说着，我顺着墙往下滑，直到坐在楼梯平台的地板上。电话掉了，一直挂在电话线上，等待着。

1981 年 9 月 26 日，星期六下午的某个时候，我的祖父或祖母叫了救护车。当时我并不知道,但我父亲已经病重三个星期了。这是第一次有人寻求医疗帮助。

我的祖母是牙买加医院（Jamaica Hospital）、布斯纪念医院和医疗中心（Booth Memorial Hospital and Medical Center）的常客。我父亲也有几次被送进牙买加医院。我祖父母的所有孩子都出生在那里，所以我们家与职工和管理层有着长期的关系。我的祖父母向牙买加医院捐赠了数百万美元，1975 年，用于护理和康复的特朗普馆以我祖母的名字命名。至于布斯纪念医院，我的祖母是那里的救护军（Salvation Army）志愿者中的一员——由于我患有严重的哮喘，这里也留下了我童年的许多时光。只要打个电话就能保证他们的儿子在这两家医院得到最好的治疗。但是没有人打电话。救护车把我父亲送到了牙买加的皇后区医院中心。也没有人跟着他。

救护车开走后，我的祖父母给其他四个孩子打了电话，但只能联系到唐纳德和伊丽莎白。当他们下午晚些时候到达时，从医院传来的消息表明我父亲的情况很严重。仍然没有人去医院。

唐纳德打电话告诉我母亲发生了什么事，但一直占线。他和我们的楼管取得了联系，让他用对讲机给她打电话。

母亲马上给家里打电话。

“医生认为弗雷迪可能活不下去了，琳达”，唐纳德告诉她。我母亲甚至不知道父亲生病了。

“我能不能到你家去,有什么消息我就在那儿,行吗?”她不想一个人呆着。

过了一会儿，母亲到了，祖父母正独自坐在书房的电话旁；唐纳德和伊丽莎白去看电影了。

当母亲和祖父母坐在一起时，没人多说话。几个小时后，唐纳德和伊丽莎白回来了。当他们被告知没有消息时，唐纳德离开了。将近四十岁的伊丽莎白泡了杯茶，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间。正当我母亲准备离开时，电话铃响了，是医院打来的，父亲在晚上 9 点 20 分被宣布死亡。时年 42 岁。

没有人想到要来学校接我，但是第二天早上安排了我坐公交回来。邓恩开车送我到哈特福德的灰狗巴士站,我在那里登上了一辆开往曼哈顿港务局巴士总站的巴士。在城里接我后，我的母亲、哥哥和我驾车来到家里，家中的其他成员已经聚集在早餐室讨论葬礼的安排。玛丽安娜和她的儿子，我的堂兄大卫，都在那里。我的叔叔罗伯特和布莱恩；还有唐纳德，伊万娜和他们三岁的儿子唐尼。没有人对我母亲、哥哥和我说太多。也有一些勉强的热心，主要是罗伯特的问候，但一点也不接地气，很快就停下了。祖父和玛丽安娜低声说话。我的祖母担心她要穿什么去守夜；祖父给她挑了一套黑色的裤装，她很不高兴。

下午，我们驱车前往 R. Stutzmann & Son 殡仪馆，这是皇后村的一个小地方，离家大约 10 分钟的路程。棺木已经放在主厅的架子上了，在进入主厅之前，我问罗伯特叔叔我是否可以和他讨论一些事情。我把他从探视室拉到大厅下面的一个小角落里。“我想看看爸爸的遗体。”我觉得没有理由不直截了当。我没有太多的时间。

“你不能,玛丽。这是不可能的。”

“罗伯特,这很重要。”这不是出于宗教原因，也不是因为我认为事情就是这样的；我以前从未参加过葬礼，对礼仪一无所知。虽然我知道我需要见父亲，但我说不出为什么。我怎么能说，“我不相信他死了。我没有理由相信这件事。我

都不知道他病了。”我只能说，“我要见他。”

罗伯特停顿了一下，最后说，“不，亲爱的。你爸爸要火化了，他的遗体还没有准备好。如果这是你对他的最后记忆，那就太可怕了。”

“没关系的。”我以一种我无法理解的方式感到绝望。罗布低头看了看我，然后转身离开了。我走到他前面说，“求你了，罗伯特。”

他又停了一下，然后开始向大厅走去。“快点”，他说，“我们该进去了。”

周一，在两次守夜之间，一家人回到家中吃午饭。在路上，唐纳德和伊万娜去了超市，买了大量预先包装好的冷盘，玛丽安娜和伊丽莎白把它们摆在了早餐室的桌子上，我们要么吃，要么相对安静地忽略它们。

我没有胃口，也没有参与到谈话中来，所以我离开了早餐室，在房子里转来转去，就像我小时候那样。我走到书房门口对面的后楼梯，瞥见唐纳德手里拿着电话。我不知道他是刚打完电话还是正要打电话，但当他注意到我站在走廊上时，他把听筒放回了架子上。我们谁也没说话。自从母亲节那天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唐纳德，那次节日是我们在长岛祖父母的乡村俱乐部 North Hills 庆祝。除了我的祖母，我没想到其他人会流泪，但唐纳德，尤其是我的祖父，似乎对我父亲的去世泰然自若。“嘿,唐纳德。”

“怎么了,宝贝?”我有时会想，我的两个叔叔是否真的知道我的名字。

“爸爸会被火化，对吧?”多年来我就知道这就是父亲想要的。他拒绝土葬的想法是如此强烈，这是他们结婚后他对母亲说的第一件事。他对它的坚持几乎到了痴迷的地步，这就是我十岁之前就知道它的原因。

“对。”

“然后呢?他不会被埋葬吧?”

他脸上掠过不耐烦的神色。很明显，他不想有这样的谈话。

“我想会的。”

“你知道这没有道理，对吧?”

“这是爸爸想要的。”他拿起电话。当他注意到我一动不动时，他耸了耸肩，开始拨电话。

我转身爬上后面的楼梯。在二楼长长的走廊的一端是伊丽莎白的房间，玛丽安娜的房间在他们共用浴室的另一边；另一方面，唐纳德和罗伯特共用的卧室配

备了蓝色和金色的床罩和配套的窗户。我祖父母的主卧室大得多，就在他们的旁边，里面有祖母的独立更衣室，有一面镜子墙。走廊的中央就是那间“牢房”。父亲的帆布床被剥光了，露出薄薄的床垫。他的便携式收音机还放在小床头柜上。壁橱的门半开着，我看见两件带纽扣的白色衬衫斜挂在金属衣架上。即使在这样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唯一的一扇窗子也不能照进一点亮光。我想我应该进去看看，但那里没有我的东西。于是我回到楼下。

守灵仪式在犹太新年（Rosh Hashanah）的第一个晚上举行，但父亲参加的兄弟会的许多人仍然来了。他的朋友斯图尔特经常和他的妻子朱迪一起在牙买加医院参加晚宴和慈善活动。除了比利·德雷克（Billy Drake），斯图尔特可能比父亲的其他朋友更了解我的家庭。斯图尔特看见祖父独自站在房间的后面，他走过去向他表示敬意。两人握了握手，在表示哀悼后，斯图尔特说，“看起来房地产的生意不太好。我希望唐纳德没事。我经常在新闻上看到他，看来他欠银行很多钱。”

弗雷德用手搂着他死去的儿子的朋友，笑着说：“斯图尔特，不用担心唐纳德。他会没事的。”唐纳德当时不在那里。

我哥哥在一张活页纸上写下了唯一的悼词(或者，至少是我记忆中唯一的悼词)，大概是在从奥兰多飞往罗林斯学院(Rollins College)的飞机上写的。他回忆起他和父亲在一起的美好时光，大部分都发生在我还没有长大到能记得的时候，但他拒绝回避父亲生活的基本现实。有一次，他说父亲是家里的“害群之马”，客人们都倒抽了一口冷气。我终于有了一种被认出来的激动感和一种复仇的感觉。我哥哥一向比我更善于与家人交涉，现在却敢于说出真相。我钦佩他的诚实，但也感到嫉妒，他对我父亲的美好回忆似乎比我多。

当守灵仪式接近结束时，我看到人们开始排队、走过棺材、闭上眼睛，紧握双手停下来——有时跪在一张低矮的垫子上，似乎是特意放在那里的——然后继续前行。

轮到伊丽莎白姑妈时，她开始控制不住地啜泣起来。在这场清汤寡水的仪式中，她流露出的感情令人不安，人们都带着无声的惊恐看着她。但是没有人去接洽安慰她。她把手放在棺材上，并跪了下来。她的身体正在剧烈地颤抖，然后她失去了平衡，侧身倒在地板上。我看着她摔倒了。她躺在那里，好像不知道自己

在哪里，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只是继续哭着。唐纳德和罗伯特终于从房间的后面走了过来，他们一直呆在那里和祖父谈话，呆在他应该呆的地方。

我的叔叔们把伊丽莎白从地板上搀起来。她一瘸一拐地走在他们中间，他们把她扶出了房间。

我终于试探性地走近棺材。它看起来小得不可思议，我想这肯定是搞错了。我父亲身高六英尺二英寸，不可能装进那个盒子里。我不去理会那个垫子，站着不动。我低下头，把注意力集中在棺材的一个黄铜装置上。我什么也想不起来。

“嗨，爸爸”，我终于低声说。我站在那里往下看时，我的脑子一阵乱转，直到我突然意识到，我可能站在棺材的另一端，我想和父亲的对话正对着他的脚。我羞愧地退了一步，回到了朋友们身边。

没有教堂仪式。棺材被转移到了火葬场，我们在隔壁的教堂短暂碰面——天气是有点怪异的阳光普照——一位不属于任何教派的牧师既表明了他对我父亲的完全不了解，也表明了家族中没有人愿意费神教他了解这个很快就要被烧掉的人。

葬礼结束后，全家人打算驱车前往位于中村的“信仰公墓”（All Faiths Cemetery），我们家的集中墓地就在那里；我祖父的父母弗里德里希·特朗普(Friedrich Trump)和伊丽莎白·特朗普(Elizabeth Trump)是当时唯一的墓主。后来我才知道，就在前两天，我的母亲、我的兄弟和我分别向不同的家庭成员请求，希望他们允许我父亲的骨灰洒向大西洋海域。

在我们离开教堂之前，我追上祖父，做了最后一次请求。“爷爷”，我说，“我们不能埋葬爸爸的骨灰。”

“这不是你该做的决定。”

他开始走开，但我抓住他的袖子，知道这将是我最后的机会。“这不是他自己的骨灰吗?”我问。“他想火葬，就是为了避免土葬。求你了，让我们把他的骨灰拿到蒙托克（Montauk）去。”

这些话一脱口而出，我就意识到我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我的祖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把蒙托克和我父亲无聊的爱好联系在一起，比如划船和钓鱼，这些活动让他无法专注于严肃的房地产生意。

“蒙托克”，他重复道，几乎带着微笑。“这是不会发生的。快上车。”

我们的祖父面对着阳光下熠熠生辉的大理石和花岗岩墓碑，巨大的眉毛下，他淡蓝色的眼睛在一天光线最亮的时候眯了起来,他解释说这块墓碑已经刻有他母亲和父亲的名字,将被暂时移除以便添加我父亲的名字和日期。他一边说，一边摊开双手，像个卖二手车的，踮着脚尖，几乎洋洋得意，知道面前是一个土里土气的人。

我祖父严格遵守法律，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父亲被火化后，他们把他的骨灰放在一个金属盒子里，埋在地下。

父亲的死亡证明上写的日期是 1981 年 9 月 29 日，证明他是自然死亡。我不知道 42 岁的人怎么能做到这一点。没有遗嘱。如果他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留下——书、照片、他那架老式 78 型飞机模型、后备役军官训练队和国民警卫队奖章——我不知道。我哥哥拿了父亲的天美时（Timex）手表。我什么也没得到。

随着我年龄的增长，家中似乎变得更冷了。父亲去世后的第一个感恩节，屋子里也更冷了。

晚饭后,罗伯特走过来把他的手放在我的肩上。他指了指我的新堂妹伊万卡，她正在她的婴儿床上睡觉。“看，就是这样。”我明白他想表达的意思，但听上去就好像他马上要脱口而出，“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至少他试过了。弗雷德和唐纳德并没有表现出什么不同。他们的儿子和兄弟死了，但他们仍然像往常一样谈论着纽约的政治、交易和丑陋的女人。

当弗里茨和我回家过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会见了我祖父的律师之一欧文·杜尔本（Irwin Durben），马修·托斯提（Matthew Tosti）去世后，他是我母亲的主要联系人，我们一起研究了我父亲遗产的细节。我很震惊地发现他有一项。我原以为他死时身无分文。但很明显，我的祖父和曾祖母建立了一些信托基金，比如支付寄宿学校学费的信托基金，这是我当时不知道的。它们的份额将在我和我的兄弟间分开，并由信托基金监管，直到我们三十岁。被任命管理这些信托基金并保护我们长期财务利益的人是欧文·杜尔本、我的姑妈玛丽安娜和我的叔叔唐纳德与罗伯特。虽然欧文是关键人物——如果我们有疑问、问题或任何不可预见的财务需求，我们就得打电话或见他——但唐纳德是审批的最终仲裁者，也是所

有支票的共同签章人。

欧文的桌子上堆满了成堆的文件。他坐在它们身后的椅子上，开始解释我们到底要签什么。在讨论非常详细的内容之前，弗里茨就打断了他，说:“玛丽和我之前谈过这个，首先我们得确保妈妈能得到照顾。”

“当然”,欧文说。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他有条不紊地浏览了每一张纸。我不清楚我父亲到底留下了多少钱。信托是一种复杂的财务安排(至少对一个 16 岁的孩子来说是这样)，而且似乎还有巨大的税收负担。在解释了每份文件的重要性后，欧文把它推到桌子对面让我们签字。

当他结束时，他问我们是否有什么问题。

“没有”，弗里茨说。

我也摇了摇头。欧文说的话我一点也没听懂。

第三部分 烟和镜

第九章 救济的艺术

1991 年，万圣节后的第二天，纽约小报用 100 号特大字码的标题登出一则新闻：“玛丽·特朗普被抢劫”。虽然我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当我在赶地铁的途中，路过报亭看到这样的标题时，心里还是很不舒服。

不过，我的祖母遭遇的不只是被抢劫。事发时，她在杂货店停车场，正要把购物袋放进自己的劳斯莱斯轿车，一个孩子突然抢了她的钱包，使她的头狠狠地撞到了车上，这导致她脑出血，并丧失了一部分听觉和视觉能力。她摔倒在人行道上，盆骨和肋骨多处骨折，她患有骨质疏松症，这无疑使伤势更加严重。当她被送到布斯纪念医院时，她的情况非常危险，我们甚至不确定她能否挺过来。

直到医生把她从重症监护室转移到私人病房，她的伤势才逐渐好转。又过了几个星期，她的疼痛才减轻到可以忍受的程度。当她的食欲开始恢复时，我就给她带任何她想吃的东西。唐纳德去医院的那天，她正喝着我在街上给她买的奶油糖果奶昔。

他向我们俩打招呼并亲吻了我祖母。“妈妈，你看起来气色不错。”

“她好多了，”我说。他坐到床边的椅子上，一只脚翘在床边。

“玛丽这些天每天都来看我，”祖母看着我，笑着说。

他转向我说，“你能有这么多的空闲时间真好。”

我看着祖母，她翻了个白眼，我忍着没笑。

“你呢？你怎么样？宝贝。”祖母问他。

“别问这个了。”他似乎有些愠色。

祖母问他关于孩子的事，问他和伊万娜有没有什么新鲜事。他没什么可说的；过了十分钟，他就离开了，显然是有些厌烦了。祖母往门那边瞥了一眼，确定他已经走了后说，“某人有些暴躁”。

这时我笑了出来。我说，“说句实话，他的日子不太好过。”过去 12 个月里，他最喜欢的赌场，大西洋城的泰姬·玛哈尔赌场，在开业仅一年多后就宣布破产；他的婚姻也是一场灾难，部分原因是他与玛拉·梅普尔斯（Marla Maples）的公开恋情；银行不得不给他津贴；他第二本书的平装版《巅峰生存》（*Surviving*

at the Top）以《生存的艺术》（*The Art of Survival*）为名出版。尽管这一切都是他自找的，但他似乎未因失败而感到羞耻。

“可怜的唐纳德，”祖母打趣道。她似乎开始眩晕了，我觉得医院的工作人员可能需要减少她的止痛药剂量。“他总是这样。我不应该这么说，但当他去纽约军事学院学习时，我松了一大口气。他不听任何人的话，尤其是我的话，他还折磨罗伯特。噢，对了玛丽，他还是个懒汉。在学校，他因为内务整洁而得过奖章，可回到家，他还是个邋遢鬼!”

“你怎么做的？”

“我能做什么呢？他从来不听我的话。你的祖父也不在乎这些。”她摇着头说，“唐纳德经常能躲过惩罚。”

这让我很惊讶。我一直以为祖父在处理各方面问题上都是大师。我说，“这听起来不像他”。

当时，我的祖父正在曼哈顿的一家医院做髋关节置换手术。我记得他只住过一次院，那是在 1989 年，他脖子上靠近右耳的地方长了一个肿瘤，因此做了切除手术。我不知道这次他做髋关节手术的时间是不是巧合，或者这是不是在祖母入院后安排的，因为这样祖母就不用在她康复的时候和祖父相处了。他的精神状态恶化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在住院期间，情况进一步恶化了。有几次，护士在深夜发现他只穿着短裤，试图离开房间。他告诉护士，他是要去找特朗普夫人。祖母似乎很高兴自己没有被他找到。

1980 年，唐纳德的君悦大酒店(Grand Hyatt)经营得很成功，这为他在 1983 年高调开业特朗普大厦(Trump Tower)铺平了道路。他给建造该工程的无证工人的待遇很差，并且据称其间有黑社会参与，这使该工程陷入了争议之中。他还为了给自己的项目腾出空间，铲平了邦维特·特勒大楼外立面上的漂亮艺术浮雕，这更是把该项目推向了风口浪尖。唐纳德之前承诺，他会将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艺术品捐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后来他意识到，将这些浮雕整体拆下来会花很多钱，而且会延缓大楼的建造速度，于是他下令将它们销毁。面对批评他失信和没有艺术审美的声音，他耸了耸肩，称这些雕塑“没有艺术价值”，就好像他比专家更懂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这种“我比别人更懂”的态度只会越来越难

以改变：随着他知识量的减少（尤其在治理领域），他自称什么都懂的说法与他的不安全感成正比，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况。

唐纳德最初的两个项目能顺利开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弗雷德作为开发商和交易人的专业技能。如果没有他的关系、影响力、认可、金钱、知识，以及（或许是最重要的）对唐纳德的支持，这一切都不可能实现。

在此之前，尽管唐纳德从未承认过，并经常公开称是自己的财富和才智成就了自己，但实际上，他的成功完全依靠弗雷德的金钱和影响力。无疑，媒体都欣然接受他的说法，而当唐纳德开始有意成为新泽西州的赌场老板时，银行也相信他有能力（1977 年，政府为了挽救这个衰落的海滨度假小镇，将大西洋城的博彩业合法化了）。如果我祖父的意见对他有任何影响的话，唐纳德就不会在大西洋城投资了。在弗雷德看来，在曼哈顿冒险是值得的，但在大西洋城，他除了钱和建议之外，什么都无法提供；在那里，没有政治影响力，也没有相关行业知识可以利用。到那时，弗雷德对他儿子的影响力正在减弱。1982 年，唐纳德申请了他的博彩业营业执照。

玛丽安娜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开始就在新泽西州担任助理地区检察官，当她的弟弟唐纳德在寻找投资机会时，她问唐纳德，是否可以请罗伊·科恩（Roy Cohn）帮个忙。科恩对里根政府有足够的影响力，他能接触到齐多夫定（AZT，一种尚在临床试验阶段的治疗艾滋病的药物），他对司法任命也有一定的影响力。很巧的是，新泽西州地区法院有一个法官职位空了出来。玛丽安娜认为自己是非常合适的人选，而唐纳德认为，在一个他计划做很多生意的州，让自己的近亲担任法官可能会有用。于是科恩给司法部长埃德·米斯(Ed Meese)打了电话，玛丽安娜 9 月便获得提名，10 月正式获得该职位。

另一个显示弗雷德对唐纳德影响力减弱的迹象是，1985 年，唐纳德看都没看，就花了 3 亿多美元买下一座赌场，也就是后来的“特朗普城堡赌场”。而就在一年前，他才刚刚买下哈拉斯酒店，也就是后来的特朗普广场。对唐纳德来说，好东西多了就是好事；他相信大西洋城有无限的潜力，所以两个赌场总比一个好。那时，唐纳德的公司已经背负了数十亿美元的债务（到 1990 年，他的个人债务会飙升到 9.75 亿美元）。即便如此，同年，他还以 800 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了海湖

庄园。1988 年，他花了 2900 万美元买了一艘游艇，1989 年他又花了 3.65 亿美元买下美国东方航空公司的航线。1990 年，为了完成他的第三个赌场“泰姬·玛哈尔赌场”的建设，他不得不发行了近 7 亿美元的垃圾债券，利率为 14%。似乎仅仅是唐纳德收购的数量、价格和大胆的交易，就使得包括银行在内的所有人和机构，都没有注意到他快速积累的债务和可疑的商业头脑。

那时，唐纳德最喜欢的配色是红色、黑色和金色，所以大西洋城那种透漏着廉价气息的浮夸对他的吸引力,几乎和轻松赚钱的诱惑一样大。毕竟，房产总能赚钱，谁有钱收购，谁就会在那儿干得不错。大西洋城完全不在弗雷德的管控范围内，这一点也吸引了唐纳德。撇开弗雷德和其他人的巨额投资金不谈，赌场是一种持续经营的项目，这与君悦酒店和特朗普大厦项目不同，后两个项目最终会由其他实体经营管理。这样的话，这将是唐纳德第一次独立于父亲而获得成功的机会。

拥有自己的赌场为唐纳德提供了一张超大的布料;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设计整个世界。如果拥有一个赌场是好事，那么两个会更好，三个更是好上加好。当然，他自己的赌场也会互相竞争，最终会蚕食对方的利润。尽管这很荒谬，但他的“更多”思想却是有一定的逻辑的，毕竟，这在他父亲那里是有效的。但唐纳德不明白，也不愿了解，经营赌场与在布鲁克林拥有和出租房产相比，从商业模式到市场，再到客户群体以及相关计算方法，都迥然相异。因为他看不出这两者的明显区别，所以他很容易就认为在大西洋城拥有的资产越多越好，就像我祖父在纽约做的那样。他认为，如果一个赌场是摇钱树，那么三个赌场就是一座金山了。他会像弗雷德运作他的公寓大楼那样运作赌场。

唯一无法解释的是,唐纳德开设第三家赌场无疑会减少自己前两家赌场的利润，但是为他前两家赌场出资的银行和投资者，并没有强烈地反对他开设第三家赌场。在整种情况下，唐纳德还能够拉到投资，就更难理解了。即便是最鲁莽的投资人,他们哪怕只是随便看一眼这些金额,尤其是这种偿债方式,也会被吓跑。但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没有人拒绝唐纳德，这使得一个又一个错误的项目得以上马，其附带“好处”是，让这个本来无法成功的人更加自负。

当年 8 月，唐纳德出版了他的《巅峰生存》。几周之内，人们就清楚地看到，这本书的主题和时间都是在拙劣地模仿前一本书。

1990 年 6 月，唐纳德的特朗普城堡赌场面临 4300 万美元的资金缺口。六个月后，祖父让他的司机带着 300 多万美元现金去城堡赌场里买筹码。其实，他买筹码并不是为了赌博；他的司机把装满现金的公文包放到赌场后，就离开了。即便这样也不够。第二天，祖父又给城堡赌场汇过去 15 万美元，大概是为了买更多的筹码罢。尽管这些操作暂时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最终我的祖父还是被处以 3 万美元的罚款，因为他违反了博彩委员会的一项规定，该规定禁止未经授权的资金向赌场注资。如果他想继续借钱给唐纳德，以维持他的赌场的运营(他确实这么做了)，他必须在新泽西州取得博彩业经营许可证。但是已经太迟了。唐纳德也许控制了大西洋城博彩业 30%的市场份额，但他的第三个赌场，泰姬·玛哈尔赌场，让他的另外两个赌场无法赚钱（泰姬赌场开业那年，特朗普广场赌场和特朗普城堡赌场一共损失了 5800 万美元）,这三个赌场每年产生 9400 万美元的债务,而单是泰姬·玛哈尔赌场，每天就需要有 100 万美元进账才能保证不赔钱。

银行的钱在大量流失。泰姬赌场开业时，唐纳德和他的借款人正在开会，试图找到控制和管理开支的办法。赌场债务违约和破产的风险正在加大，他们必须找到一个能保护唐纳德形象的方案，因为这反过来也能保护银行投出去的钱。银行家们担心，如果唐纳德没有了成功和自信的外表，那么他手中的那些本就面临风险的资产将进一步贬值。他的姓氏本身就很有吸引力：没有这个名字，就不会有新的赌徒和租客，就不会有人愿意购买债券，也就不会有新的收入。

除了给唐纳德支付经营费用，银行还在 1990 年 5 月与他达成协议，每月给他 45 万美元的补贴，也就是一年将近 550 万，以弥补他的损失。但这笔钱只够抵消他的个人开销：他在特朗普大厦的三层公寓、私人飞机、海湖庄园的按揭。为了推销自己的形象，唐纳德需要继续维持这种生活方式，以支撑其形象。

银行的人为了监管他，规定唐纳德必须每周五与他们会面，汇报他的支出情况以及他出售游艇等资产的进展。1990 年 5 月，形势非常严峻，这是不能否认的。唐纳德向罗伯特抱怨银行在折磨他，事实是，他父亲的确没有像银行那样对他严加看管：他以前从来没有被约束过，更不用说这么严格的束缚了，这让他很恼火。他有偿还银行贷款的法律义务，如果他不偿还，就会承担相应后果。至少应该有后果。

尽管有诸多限制，唐纳德的开支依然远超其支付能力，他花了 25 万美元给

玛拉买了订婚戒指，按照离婚协议支付给伊万娜 1000 万美元。我觉得他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他会无法随心所欲地花钱。银行批评他违背了协议，但从未对他采取任何措施，这只会让他更加相信，他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他一直都是如此。

在某种程度上，你不能怪唐纳德。在大西洋城做生意，他不再需要父亲点头了。他不再需要自吹自擂了；银行向他砸下的数亿美元，以及媒体给予他的大量关注和无端赞扬，都助长了他的自大。这两种情况加在一起，使他看不清自己的处境有多么危险。我祖父塑造的唐纳德的神话传说，现在整个世界都相信了。

无论是谁在传播这些神话，它们终究是神话。从本质上说，唐纳德是弗雷德培养出来的。现在，他是银行和媒体打造出来的。他像依赖弗雷德一样依赖着银行和媒体。他有一种浮于表面的魅力，甚至是超凡的魅力，这吸引了相当一部分人。当他的魅力碰壁时，他采取了另一种“商业策略”：发脾气，如果有人让他得不到他想要的东西，他就以破产作为威胁，或者会说他要毁掉别人。不管怎样，他赢了。

有人说，唐纳德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成功案例。这种评价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他并没有达到，也无法达到人们所称赞的那种高度。尽管如此，他的自负（现在被释放了出来），必须被不断地满足，不仅他的家人要满足他，而且所有遇到他的人都要这样。

纽约的精英们只会把唐纳德当做小丑，永远不会接受他，但他们会邀请他参加聚会，允许他频繁出入他们的俱乐部(比如乐雅会酒店，Le Club)，以此来证明他自命不凡和浮夸的形象。纽约人越想要壮观的场面，媒体就越愿意提供这样的场面，甚至不惜牺牲更重要、更有实质性内容的报道。为什么要把他那复杂的银行交易报导出来呢？这会让精英们感到厌烦。这些干扰和诡计让唐纳德获益很多，同时也给了他想要的东西：媒体一直在吹捧他那荒淫的婚姻和所谓的性能力。如果媒体可以否认现实，那么他也可以。

我从寄宿学校毕业后被塔夫茨大学录取，这像奇迹一般。尽管我在大一第二学期一度辍学，但我还是在 1989 年从那里毕业了。一年后，就在我祖父秘密购买价值 315 万美元的赌场筹码之前，我进入了哥伦比亚大学，攻读该校英语与比

较文学专业的研究生。

开学两个月后，我的公寓被盗了。我所有的电器都被偷走了，包括我的打字机（它是在校生的必需品）。我打电话给欧文，问他能否预支给我零用钱，他拒绝了。祖父告诉我，他认为我应该找份工作。

之后，我去祖母家时，向她说了这件事，她说她可以给我一张支票。我说，“没事的，祖母。我只需要等几个星期。”

“玛丽，”她说，“永远不要拒绝钱这个礼物。”她给我写了支票，这样我就可以马上买一台打字机了。

很快我就接到了欧文的电话，他很生气。“你问你祖母要钱了吗？”

“不是这样的，”我说，“我告诉她我被偷了，她就帮了我。”

每个月月底，祖父都会核对他和祖母的所有个人和公司账户的支票，他发现了祖母给我的那张支票，非常生气。

“你需要小心点，”欧文警告我说，“你祖父常说要和你断绝关系。”

几周后，我又接到了欧文的电话。他说祖父又生我的气了，这次是因为他不喜欢我写在支票上的签名。

“欧文，你肯定在跟我开玩笑吧。”

“我没有开玩笑。他很讨厌字迹不清的签字。”

“签字就是那样啊！”

他停顿了一下，语气柔和了一些，说：“改了它吧。玛丽，你一定要进入这个游戏。你的祖父认为你太自私了，等你到 30 岁的时候，你可能还什么都没有。”但我一直不明白他所说的“游戏”是什么意思，我觉得我们应该是个家庭，而不是什么官僚机构。

“我没觉得我做错了。我马上就能拿到一所常春藤盟校的硕士学位了。”

“他不在乎这个。”

“唐纳德知道这件事吗？”

“他知道。”

“他是我的受托人。他说什么了吗？”

“唐纳德？”欧文轻蔑地笑了起来，“他什么都没说。”

那时我的祖父还没有被诊断出患有阿尔茨海默氏症，但他已经和痴呆症斗争

了一段时间，所以我没有把这些威胁看得太认真。不过，我还是去改了我的签名。

我家里的每个人都时而享有特权，时而被忽视，这是一种奇怪的经历。尽管我在物质上拥有了所需的任何东西，以及像私立学校和夏令营之类的奢侈品，但我心中有一种刻意的想法，即不能确定我能否一直拥有这些东西。出于同样的原因，有时一想到这一点，我会感到沮丧，甚至有被毁灭的感觉：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不重要，或者还有更糟糕的情况，即只有唐纳德是重要的，而我们不重要。

特朗普管理公司——也就是他经常提到的“便宜操作”——做得相当不错。从 1988 年到 1993 年，弗雷德自己给自己支付了超过 1.09 亿美元（为了避税），在银行还有更多的存款。然而，表面上归唐纳德经营的特朗普集团面临的麻烦越来越大。

银行削减了唐纳德的每月补贴（他的四口之家所拥有的钱，足够让他们在 10 年内都过上舒服日子，但银行还是给了他补贴），并拒绝给他更多贷款，唐纳德深信，他身上发生的一切都是经济、银行对他的恶劣待遇和坏运气造成的。

对他来说，什么都不公平。这与弗雷德产生了共鸣，弗雷德的怨气很重，除了自己的成功之外，他从不为任何事情负责。唐纳德在推卸责任、让别人背锅方面的天赋，是从他父亲那里继承的。即便弗雷德花了上千万美元，也没能阻止唐纳德的失败，但他肯定能找到一个替罪羊，就像他在做出错误判断后经常做的那样（唐纳德经常将错误归咎于弗雷德）。唐纳德知道，为自己的失败承担责任，即承认失败，不是弗雷德所赞赏的：他知道弗雷迪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

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弗雷德很可能还不知道唐纳德有多么无能。弗雷德把自己商业帝国的未来押在了这个儿子身上，自己又为儿子牺牲了很多，因此，要让弗雷德承认他儿子有任何弱点几乎是不可能的。相比之下，弗雷德更容易相信，唐纳德的才华被淹没在了布鲁克林的死水里；他只是需要一个更大的池塘，才能掀起波澜。

随着卡莫德尔酒店慢慢被翻新为君悦酒店，弗雷德被唐纳德蒙蔽了双眼，唐纳德为了突出他的成功，极力操纵和贬低该项目的每一个环节，这似乎让弗雷德忘记了自己的人脉、知识和技术有多么重要；如果没有这些资源，君悦酒店和特朗普大厦都不会有开业的那一天。唐纳德的这两个项目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就连

弗雷德也被弄糊涂了。其实，如果换作别人来开发这两个项目，人们会觉得这在曼哈顿是稀松平常的事情。

弗雷德一直都知道唐纳德在玩什么把戏，因为那都是他教的。在弗雷德看来，和“裁判”处关系、撒谎、欺骗，这些都是合法的商业策略。对于这对父子来说，效率最高的游戏就是欺骗游戏。在弗雷德不断推出新项目、巩固自己“战后地产大亨”地位的同时，他还将纳税人的钱装进自己的腰包，据称他还有大量税务欺诈行为，这样，他的四个孩子也从中受益几十年。当众多小报把注意力集中在唐纳德不检点的生活细节上时，他却凭借自己的不良贷款、糟糕投资和错误判断，为自己树立了成功者的名声。然而，他们父子之间的区别在于，尽管弗雷德不诚实、不诚信，但客观上他经营的公司能产生稳定的收益，而唐纳德没什么能力，他只能靠父亲的金钱来支撑一种假象。

唐纳德到大西洋城后，有一点人们不再否认，即他不只不适合在纽约外行政区经营几十套中档出租房产，而且根本不适合经营任何生意，人们也不再否认，他喜欢自我推销、自夸自大，并且品味很浮夸。

当弗雷德向别人吹嘘唐纳德的才华，声称他儿子的成功远远超过他的时候，他肯定知道自己的话没有一句是真的；他太聪明，也太擅长算计了，所以不会想别的：那些数字就是对不上号。但弗雷德不顾理智与否，继续支持唐纳德的事实表明，还有别的事情要发生。

弗雷德否认了大西洋城的现实，通过这一点，他证明了自己有一个特点，即对任何不符合自己叙述的事实熟视无睹，所以他像他儿子一样大力谴责银行、经济和博彩业。弗雷德幻想唐纳德会成功，在他身上投入了很多，以至于他和唐纳德在经济上密不可分。人在面对现实的时候需要认识到自己的责任，而这是他永远不会做的。尽管任何一个理性的人在这种情况下都会止步，但弗雷德却把所有的钱都投进去了，他决定加倍下注。

弗雷德仍然被大量的公开宣传所吸引，而且多亏了这对父子对银行的诽谤诋毁，这种非同寻常的撤资并没有对唐纳德的生活方式造成任何影响。后来，虽然他当时未被诊断出阿尔茨海默氏症，但这已经开始对他的执行力造成慢性损害了。他已经很容易相信，他最差的儿子是最好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来越容易对炒作唐纳德的文章信以为真。

和往常一样，唐纳德得到的教训验证了他先前的假设:无论发生什么，无论他给自己造成多大的损失，他都会没事的。他将失败称作是巨大的胜利，无耻的自大会可以实现这一点。这就保证了唐纳德即使有能力，他也永远不会改变，因为他根本不需要改变。这还导致了一系列越来越严重的后果，最终将给我们所有人带来伤害。

随着破产风险的增加，唐纳德第一次看到，他那通过谈话或威胁解决问题的能力是有限度的。他一向善于找到逃生口，他似乎想出了一个背叛父亲、从兄弟姐妹那里偷走一大笔钱的计划。他偷偷接近为我祖父工作时间最长的两个员工，弗雷德的律师欧文·杜尔本（Irwin Durben），以及他的会计杰克·米特尼克（Jack Mitnick），并指使他们起草一份祖父的遗嘱附录，根据它，唐纳德将在弗雷德死后完全控制他的财产，包括他的商业帝国以及他所持有的股份。玛丽安娜、伊丽莎白（唐纳德的妹妹）和罗伯特能继承多少财产，完全取决于唐纳德在财政上的仁慈程度，需要他的批准。

祖母后来对玛丽安娜说，当欧文和杰克来到家中，让弗雷德在遗嘱附录上签字时，他们出示了一份文件，表明弗雷德一直都是这样想的。我祖父当时神志还比较清醒，他感觉到有些不对劲，尽管他也说不上来究竟哪里不对。他生气地拒绝签字。在欧文和杰克离开后，弗雷德向妻子表达了他的担忧。祖母立即给她的长女打了电话，尽力向她解释发生了什么。她说，简而言之，“这份遗嘱就是没能通过（弗雷德的）嗅觉测试。”

作为一名检察官，玛丽安娜对信托和不动产方面的知识有限。她请她的丈夫约翰·巴里(新泽西州一位著名且受人尊敬的律师)推荐一个能帮得上忙的人，巴里让他的一位同事去调查情况。没过多久唐纳德的阴谋就败露了。结果，祖父的整个遗嘱被重写了，新遗嘱取代了他 1984 年立下的遗嘱，玛丽安娜、唐纳德和罗伯特都被指定为遗嘱执行人。此外，新遗嘱还规定了一项新的标准：弗雷德给唐纳德的任何遗产，其他三个孩子也必须等量拥有。

若干年后，玛丽安娜说，“（按照本来的遗嘱）我们会身无分文。伊丽莎白会在街角乞讨。如果我们想喝杯咖啡的话，还得去求唐纳德”。他们能阻止唐纳德的计划，完全是靠运气。然而，每逢节日，他们兄弟姐妹们仍会聚在一起，仿佛

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

唐纳德试图从弗雷德手中夺取财产控制权，弗雷德一直想让儿子相信，他是唯一重要的人，夺权正是这种灌输的逻辑结果。唐纳德在各方面都得到了更多的东西；他“被投资”了；这让玛丽安娜、伊丽莎白和罗伯特（甚至是他的母亲）得到更少遗产。在唐纳德看来，他们整个家庭的成功和声誉都得指望他。这样看来，他认为自己不仅应该得到更多，而且应该得到一切的想法就说得通了。

一天，唐纳德从他的私人飞机上打电话给我，我当时正站在我单间公寓的窗户前，看着上下班高峰时刻 59 街大桥上的交通拥堵。

“塔夫茨大学的院长寄给我一封你以前写的信。”

“真的吗？为什么？”

我过了一分钟才明白他在说什么。之前教我的一位教授一直想获得终身教职，在我毕业前，我写了一封信给他，对他表示支持。那是四年前的事了，我都快忘了。

“这封信让我知道，在你心中，塔夫茨大学是非常棒的学校。那个人找我是为了筹款的事情。”

“抱歉。那封信冒犯他了。”

“并没有，那是一封很好的信。”

我还是摸不清这通电话的主题是什么。唐纳德接着说：“你想为我的下一本书主笔吗？出版商想让我开始写了，我觉得这对你来说是个很好的机会。会很有趣的。”

“这听起来真不可思议。”我说。这也确实很难想象。我听到了电话里传来的飞机引擎的轰鸣声，想起来他在飞机上。我问他，“你要飞去哪里？”

“刚从拉斯维加斯回来。明天给罗娜打电话。”罗娜·格拉夫（Rhona Graff）是他在特朗普集团的行政助理。

“我会的。谢谢你，唐纳德。”

直到后来，当我重读那封信的时候，我才明白了为什么唐纳德认为让我写书是个好主意，不是因为那封信写得好，而是因为它证明了我的确很擅长把别人写

得很好。

几天后，我在特朗普集团的后勤办公室有了一张自己的办公桌。工位是开放式的，室内靠荧光灯照明，墙边是一排高大的钢制文件柜，它与 Z 大道上的特朗普管理公司内实用风格的办公室有很多相同之处，而与金碧辉煌、摆满唐纳德杂志的大楼门厅区别很大。

我在工作的第一个星期就熟悉了那里的同事和归档系统。（让我吃惊的是，有一个文件夹上有我的名字，里面有一张纸，那是我在中学时写给唐纳德的一封信。我问他是否能给我弄两张滚石乐队音乐会的门票。他没给我弄到手。）我大部分时间是独自办公，但每当我有问题时，唐纳德的副总裁之一厄尼·伊斯特（Ernie East）就会过来帮我，他是个非常好的人。他给我推荐了一些可能有用的文件，有时还会放到我桌上一些他认为可能有用的文件。问题是，除了这本书宽泛的主题之外，我真的不知道它要讲什么，我只能从书名《东山再起的艺术》(The Art of The Comeback)中试着推断出一个主题。

唐纳德之前出版的两本书我都没读过，但我对它们略知一二。根据我的理解，《交易的艺术》在于把唐纳德塑造成一个严肃的房地产开发商。这本书的捉刀人托尼·施瓦茨（Tony Schwartz），把书中的主题写得很有连贯性，就好像唐纳德真的在信奉并践行一种商业哲学一样，不过施瓦茨早就后悔替他写书这件事了。

在他的第二本书《巅峰生存》因为出版的时机不佳而遇冷后，我认为唐纳德希望他的新书回归第一本书那种相对严肃的风格。我开始试着解释，在最不利的情况下，他是如何从深渊中爬上来，并且取得更辉煌的胜利和成功。不过，并没有太多的证据支持这种叙述，因为他的“特朗普广场”即将第四次申请破产，但我必须尝试着这样写。

每天早上我到办公室之前，我都会去见唐纳德，希望他能有时间坐下来接受我的访谈。我想这是了解他之前行为的最好方法。他自己的观点就是书中的一切内容，而我需要用他自己的话来讲述书中的故事。我去找他时，他一般都在打电话，我一坐下，他就会把免提打开。就我听到的部分而言，那些电话几乎没有一个是关于生意的。电话那头的人并不知道唐纳德开了免提，他在询问一些八卦消息，要么就是问唐纳德对某个女性或某个新开张的俱乐部的看法。有时也有人打电话请他帮忙。通常，电话的内容都是关于高尔夫球的。每当有人说任何令人起

鸡皮疙瘩的奉承、淫秽或愚蠢的话时，唐纳德就会傻笑，指着话筒，好像在说：“真是个白痴。”

当他不打电话时，我发现他总是在翻阅下属为他收集的剪报。其中的每一篇文章都是关于他的，或者至少提到了他。他给我看了那些剪报，他对大部分来访者也是这么做的。根据文章内容的不同，他有时会像我祖父经常做的那样，用蓝色的签字笔在上面做批注，然后寄给记者。写完后，他会拿起剪报，问我对他自认为妙语连珠的批注有什么看法。这对我的写作并没有帮助。

在唐纳德聘请我几周后，我仍然没有拿到工资。当我把工资单拿给他看时，他一开始还假装不明白我在说什么。我说我需要预支一笔钱去买电脑和打印机，我当时用的打字机还是读研时祖母出钱买的那个。他认为工资的事情应该归版商管。“你能去和兰登书屋谈吗？”

当时我还不知道，唐纳德的编辑并不知道他雇用了我。

一天晚上，我在家中，正试图从那些枯燥的文件中挖掘出一些有趣的素材时，唐纳德打来了电话，他说，“你明天来办公室的时候，罗娜会给你一些资料。我一直在为写这本书准备材料。明天给你的那几页材料真的很好。”他的声音听起来很兴奋。

最后，我得想出如何组织这些材料的办法。不过我仍然不知道他对“东山再起”一词是怎么看的，也不知道他是如何经营他的生意的，甚至不知道他在目前的交易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第二天，罗娜交给我一个信封，里面装着大约十页纸。我把它拿到我的办公桌上开始看。当我看完时，我不知道该怎么想。很明显，这是唐纳德录音的文字记录。这些材料简直就是唐纳德的攻击女性言论的汇编，其中，有一位女性是唐纳德本想与之约会的，但在她拒绝了唐纳德的约会请求后，她在唐纳德口中立马变成了“他见过的最差劲、最丑、最胖的笨蛋”。材料中最大的猛料是，麦当娜嚼口香糖的样子在唐纳德看来很没吸引力；他还评论卡特琳娜·维特(Katarina Witt)的小腿太粗（卡特琳娜是德国花样滑冰运动员，曾获得过两枚奥运金牌和四次世界冠军）。

我不再去他办公室找他聊天询问信息了。

唐纳德不时地会问起我的母亲。自从伊万娜和布莱恩（Blaine）在感恩节前向祖母下达“最后通牒”后，他已经四年没见过我母亲了（伊万娜当时对祖母说，她要么选择让琳达到家中过节，要么选择伊万娜，只能二选一）。他们发现他们的嫂子（准确的说也不是嫂子）太安静太沮丧了，他们无法和她在那里愉快相处。我母亲自 1961 年起就成为特朗普家族的一员，她和我父亲离婚后，祖父还是会邀请她参与家族度假，她也总是参加，尽管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25 年后（即伊万娜下“最后通牒”的 1986 年），祖母选择让伊万娜和布莱恩到家里过节，她没有考虑到这个决定会对我和我的兄弟产生怎样的影响。

唐纳德说，“我认为我们继续支持你母亲是个错误。如果两年后我们和她断绝关系，让她自己独立生活，情况可能会好一些。”

唐纳德和我祖父永远无法理解，任何人都有权得到金钱或支持。我妈妈作为一个豪门长子的前妻，并且可以说是她一人养大了弗雷德的两个孙子，却没有从我祖父那里得到任何应得的东西，更别提从唐纳德那里得到任何东西了，然而他俩都表现得像是我母亲得到了很多一样。

唐纳德可能还认为他自己是仁慈的。他身上也的确曾闪现过仁慈的火光。他曾给过我 100 美元，好让我能取回被扣留的汽车。在我父亲去世后，唐纳德是他们家族中除了我祖母之外，唯一一个接纳我的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缺乏帮助和弗雷德的打击，唐纳德的善良已经变得扭曲了，我们几乎都看不到他原有的那种善良了。我为了写书和他进行谈话时，我并不知道唐纳德每月仍然可以从银行收到 45 万美元的补贴。

一天早上，我坐在唐纳德办公桌的对面，和他一起讨论我们海湖庄园之旅的细节（唐纳德认为，如果我能亲眼看到他的那座位于棕榈滩的豪宅，会对我写这本书有所帮助）。这时，电话铃响了。是菲利普·约翰逊（Philip Johnson）。

在他们通话时，唐纳德似乎突然想到了什么。他打开免提，说，“菲利普！你得和我侄女谈谈。她正在为我写书。你可以告诉她关于泰姬赌场的事情。”

我向菲利普做了自我介绍，他建议我下周去他在康涅狄格的住宅讨论这本书。

唐纳德打完电话对我说：“那太好了。菲利普是个大好人。我雇了他为泰姬赌场项目做设计。他做的东西太棒了，是我从来没见过的好东西。”

我和唐纳德讨论完佛罗里达之旅的安排后，我离开他的办公室前往图书馆。我不知道菲利普·约翰逊是谁，我也从未听说过菲利普负责的那个项目（唐纳德说那个项目的名字叫“porta-co-share”）。

第二天，我乘坐唐纳德的豪车去机场，在路上我告诉唐纳德，我已同菲利普约好了要去他家拜访。我在图书馆了解到，约翰逊是一位非常著名的建筑师，非常有名的“玻璃屋”就是他设计的。我还发现，约翰逊为泰姬赌场设计的被唐纳德称为“porta-co-share”的东西，其实是车辆下客区（porte cochere），也就是一个大型车棚。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唐纳德想让约翰逊参与这个项目，因为他不仅出名，并且唐纳德非常渴望融入菲利普的社交圈子。然而，我不明白为什么约翰逊要费心去设计泰姬赌场的车棚。那是一个非常小的项目，似乎不值得他这样身份的人去做。

车刚开不到十分钟，唐纳德就拿起一份《纽约邮报》看了起来，我知道他无意为我提供关于这本书的信息。我开始怀疑，他没有咨询出版商就雇用了我，是因为他不想被出版社的人管着。他让他侄女写这本书，可以不签合同，还可以开很低的工资，这与聘请一个职业作家相比，是简单很多。但我们要一起坐两个小时的飞机，所以我还是希望他在飞机上能和我说话。

当我们走进机舱时，唐纳德摊开双臂问我：“你觉得怎么样?”

“棒极了，唐纳德。”我知道该怎么回答。

飞机到达巡航高度后，我们解开了安全带，一名保镖在他旁边放了一杯健怡可乐，然后递给他一大堆信件。我看着唐纳德打开一个又一个信封，每一封他都只看几秒钟，然后就把它们扔到了地上。当地上的废纸堆到一定厚度的时候，那个送可乐和信件的保镖又会出现，他走过来把那些信件清理到垃圾箱里。这样的场景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挪到另一个座位上，这样我就不用看唐纳德扔废纸了。

当我们的车停到海湖庄园的入口处时，那里的工作人员已经在等候了。唐纳德和他的管家一起进入了庄园，我向大家介绍了一下自己。这个豪宅有 58 间卧室、33 间浴室，每个房间都配有镀金家具，还有一间高 42 英尺、面积 1800 平方英尺的超大客厅。如我所料，这座房子奢华但不舒适。

那天晚上，坐在餐桌旁的只有我、唐纳德和玛拉。她和我以前见过几次，但我们从来没有机会互相了解。我发现她很友好，唐纳德和她在一起似乎很放松。她只比我大两岁，和伊万娜相比完全不是一类人。玛拉脚踏实地，说话轻声细语，而伊万娜则很轻浮，傲慢又恶毒。

第二天，我花了一个上午的时间来探索这个大豪宅。由于庄园里没有其他客人，所以整个地方显得空荡荡的，出奇的安静。我和管家聊了聊，想看能否从他那里得知一些趣闻，还结识了一些在那里工作的人，然后我在午餐前游了一会儿泳，午餐时间是下午 1 点。虽然海湖庄园在某些方面显得很正式，但它还是比我们举办家庭聚会的场所要随意得多，所以我穿着泳衣和短裤吃午饭也觉得很自在，庄园的午餐是在露台上供应的。

当我走近穿着高尔夫球服的唐纳德时，他好像没注意到我走到了他身边，他看到我后说，“天呐！玛丽。你好丰满。”

“唐纳德!”玛拉假装害怕地说，轻轻拍了拍他的胳膊。

我当时 29 岁，并不属于那种容易感到尴尬的人，但我还是脸红，我突然感到有些难为情。我把毛巾裹到肩膀上。我突然意识到，除了我的父母和哥哥，我家里还没有别人见过我穿泳衣。可惜这是整个棕榈滩之旅中唯一一件有趣的事情。

——————

回到纽约后，唐纳德终于厌烦了我一直找他聊天，他递给我一份名单，说，“和这些人聊吧。”名单中包括他赌场的总裁和玛丽安娜的丈夫约翰。尽管这些人可能会提供一些帮助，但他似乎不明白，如果我从他那里得不到一手信息，这本书是几乎不可能写出来的。

我会见了所有赌场的总裁。不出所料，他们的很多回答都是事先准备好的。我意识到，他们不会向我透露他们的老板在失意的时候都做了什么。不过这些走访并不完全是浪费时间；有的地方我以前从未去过，通过走访，我对唐纳德做生意的地方有了一点直观印象。

我和约翰·巴里的见面比我在大西洋城安排的见面效果还差。

“你能告诉我什么？”我问他。

他只是转了转眼珠。

最后唐纳德告诉我，他的编辑想要见我。他已经把午餐安排好了，我到餐厅

时，我以为我们会讨论一下接下来该怎么做。那个餐馆很贵，位于城中心，但我们坐在了靠近厨房的一张很窄的桌子旁用餐。

在简短的初步交谈后，编辑告诉我兰登书屋希望唐纳德雇用一个更有经验的写手。

“我已经为这件事努力了一段时间了，”我说，“我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不过问题是，我无法让唐纳德坐下来与我进行访谈。”

“你不能指望一个人第一次坐在钢琴前，就能弹奏出莫扎特的曲子来，”那位编辑说，“就好像我前天刚学会字母一样（不可能指望我第二天就能写书）。”

我说，“唐纳德告诉我，他喜欢我到目前为止所做的工作。”

那位编辑看着我，好像我的话佐证了他的观点似的。他说，“你写的东西唐纳德一点也没读。”

第二天，我到我的办公室清理了桌子，并把所有可能对我的继任者有用的东西都留了下来。我没有不高兴。我甚至不介意唐纳德通过别人炒了我。这个计划已经碰壁了。另外，在他的办公室里待了那么长时间，我还是没搞清楚他到底在做些什么。

第十章 夜幕不会马上降临

几年前，我和唐纳德和玛拉在海湖庄园的同一张餐桌前共进午餐。那时候起一家人开始去那里过复活节。我的祖父转向我的祖母，指着我，微笑着问：“这位漂亮的女士是谁？”

然后，他转向我说：“你不是漂亮的女士吗？”

“谢谢你，爷爷，”我说。

祖母似乎很不安。我告诉她不要担心。我已经见识过祖父把认识了几十年的人从他的记忆中抹去了：他的小孙子和司机。他给我起了个新绰号，一直叫我“漂亮的女士”，直到他弥留之际。他叫的时候很温柔、和蔼；他忘了我是谁之后，对我很和蔼。

“来吧，爸爸。”罗伯特走了一步，但我爷爷一动不动。在为我祖父母举行的庆祝会上，他环顾四周，目光呆滞，满脸惊恐，仿佛突然不知道谁是谁，也不知道他在那里做什么。在那之前，我只看到过祖父轻蔑、恼怒、生气、逗乐和自鸣得意的表情。这种恐惧的神情还是第一次，令人震惊。我唯一一次看到祖父感到不安，是唐纳德带他去打高尔夫球。唐纳德花了太多时间打高尔夫球，但没有消遣的弗雷德从不抱怨这件事。他们回来的时候我正好在家，我几乎认不出他来了。他们都穿着高尔夫服，我祖父穿着浅蓝色裤子，一件白色开衫，搭配一双白鞋。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祖父穿西装以外的衣服。我从来没见过他看起来这么不舒服，这么不自在。

很快他就习惯性地把东西放错地方，忘了一个词、一次谈话，然后再到忘记熟悉的面孔。你可以通过他对你的记忆来掂量你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我不知道他是否还记得我的父亲，因为父亲去世后的几年里，我从未听他提起过我父亲。

玛丽安娜特意让我的堂兄大卫（当时是一名临床心理学家）陪着祖父去做所有的预约检查和神经系统检查，希望祖父能把他铭记在脑海中，但没过多久，我祖父就干脆把大卫称为“医生”。

我和玛丽安娜还有祖父一起站在海湖庄园的游泳池旁，他指着我对他的女儿说：“她难度不是漂亮的女士吗？”他这样叫我已经有一年的时间了。“是的，爸爸，”玛丽安娜说。她疲倦地笑了。

他仔细打量着她，几乎是沉思了一下才问，“你是谁？”她轻声回答，“我是玛丽安娜。”

“好吧，玛丽安娜。”他笑了，但这个名字对他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他从未忘记唐纳德。

罗伯特在一片阴霾中离开了“特朗普城堡”总裁的职位（因为 315 万美元芯片救助计划）。他曾在我祖父 1991 年住院期间，到特朗普管理公司代替祖父的职位，此后一直在那里。对罗伯特来说，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除了单单作为弗雷德在世的一个孩子就能获得的数百万美元收入外，他还有了一份不需要多少技能或努力就能得到 50 万美元年薪的工作。这是弗雷迪和唐纳德一直被培养但又因为各自原因相继拒绝了的职位。

弗雷德仍然每天去办公室，坐在办公桌前，然后等着下班。但实际上是罗伯特真正掌控着这台被其常称之为“摇钱树”的运转良好、自给自足的机器。

我祖父今天过得很糟糕。当他走下楼梯时，我们大多数人都聚集在图书馆里，他的胡子和眉毛刚刚染过，他的假发歪斜着，但身上穿着的三件套西装无可挑剔。

头发颜色和假发是最近的创意。我祖父总是十分在意自己的外表，时常哀叹日渐退去的发际线。现在满头的头发制造了点蓬松感。对于假发，没人多说什么，但染发剂在家里引起了相当大的恐慌，尤其是当我们出席公共场合时。祖父经常让廉价药店买来的染发剂在头发上逗留太久，眉毛和胡子都变成了奇怪的绛红色。当他走进图书馆时，他显然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骄傲，祖母说：“哦，看在上帝的份上，弗雷德。”

“上帝啊，爸爸！”唐纳德冲他大叫。

“天啊！”罗伯特低声说。

玛丽安娜摸着他的胳膊说：“爸爸，你不能再这样做了。”

当我走进图书馆时，他正站在他心爱的座位旁。

“你好，”他说。

“嗨，爷爷。您好吗？”

他看着我，伸手去拿他的钱包，钱包里装满了厚厚的钞票，我总是很惊讶居然能装得进去。他在皮夹里放着一张钱包大小的半裸女人的照片，我一度担心他

会像我 12 岁时那样把照片给我看。

“看这个，”他说着，把照片拿了出来。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肯定没超过 18 岁，可能更年轻，对着镜头一脸天真的笑容，双手托着裸露的乳房。唐纳德从祖父的肩头看过去。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看着他，想知道我该怎么回答，但他只是盯着那张照片看。

“你觉得怎么样？”我爷爷笑了。我从没听他笑过。我想他从来没有笑过。他通常用“哈!”表达愉悦，然后会撇一撇嘴。现在，我的祖父拿出一张一百美元的钞票，问：“我能买你的头发吗？”

小时候我每次见到他，他都会问我这个问题。我笑了。“对不起，爷爷。我想继续留着我的头发。”

伊丽莎白走了过来，一只手里拎着一个小盒子。她一只胳膊挽住我祖父的胳膊肘，头靠在他肩膀上。他茫然地直视前方，松开胳膊，离开了房间。

不久，唐纳德带着他的孩子和罗伯特的继子进来了。除了埃里克，他们都是十几岁的孩子，男孩们个子高高的，胖乎乎的，穿着西装。唐纳德坐在电视机旁的椅子上，伊万卡爬到他的腿上。男孩们开始打闹。唐纳德坐在椅子上看他们打闹，亲吻伊万卡或捏她的脸颊。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把脚伸出来，踢一下被摁在地板上的男孩。当他们还小的时候，唐纳德就和他们一起打闹，这场搏斗基本上就是他把他们抱起来，扔在地上，跪在他们身上，直到他们哭着喊叔叔。当他们大到可以认真反击时，他就选择了退出。

当利兹和我已经尽可能远离危险时，她把盒子递给我说：“这是你的。”

除了圣诞节，我们是不会交换礼物的，我好奇地从她手里接过盒子，打开一看，是一个老式不锈钢天美时(TIMEX)手表，表盘小巧而朴素，表带是橄榄绿色的。

“有人给你的圣诞节礼物，”她说。“你那时才 10 岁，我觉得你太小了，不应该拥有这么好的东西。所以我就帮你保管起来了。”她离开房间去找她的父亲了。

后来，唐纳德和罗伯特在早餐厅挤在一起，他们的肩膀紧挨着，埋头说着什么。我祖父站在旁边，几乎是踮着脚尖倾着身子，想听听他们在说什么。

弗雷德说：“唐纳德，唐纳德。”当他没有回答的时候，祖父就扯了扯唐纳德

的袖子。

“干什么，爸爸？”他问道，头也没回。

“看看这个，”弗雷德说。他拿起一张从杂志上撕下的纸，是一个跟他的豪华轿车同款的广告。

“怎么了？”

“我可以买这辆车吗？”

唐纳德接过那张纸递给罗伯特，罗伯特把它对折，放到桌子上。

“当然，爸爸，”罗伯特说。唐纳德离开了房间。不管曾经把他们绑在一起的是什么，弗雷德剩下的儿子们都放弃了假装关心他们父亲想法和愿望的所有虚伪。在令父亲满意之后，唐纳德现在对他的父亲只有轻蔑，好像他的精神衰退是他自己的错。弗雷德对待大儿子和他酗酒的态度是一样的，所以唐纳德的态度并不奇怪。然而，目睹这种公开的蔑视还是刺眼的。据我当时所知，唐纳德不仅是我祖父最疼爱的孩子，似乎也是他唯一喜欢的孩子。我知道我的祖父可能很残忍，但我认为他最大的残忍都留给了我父亲，而令我感到羞耻的是，我认为我父亲可能是咎由自取。我不知道多年前祖母生病的时候，家里的生活是多么的孤独和可怕。我不知道祖父在祖母不在的那一年没有照顾过他的孩子，也不知道唐纳德对于这种忽视尤其敏感。我父亲当时怀揣着对成功的真切渴望大胆地走向世界时，却得不到自己父亲的支持和培养，弗雷德真正帮助的只有唐纳德，期待他长大后能有用武之地。

1994 年，我从上东区的公寓搬到了花园城，这个小镇位于长岛，离祖父母家只有 15 分钟的车程。我会带祖母去看她的曾孙，我哥哥的女儿和儿子，开着我祖父几年前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她的红色劳斯莱斯。坐在大胡桃木方向盘后面，我觉得自己的视野很开阔，几乎可以看到地球的圆弧。在四十五分钟的车程中，有时候我会和祖母轻松地聊天，但更多的时候，她情绪低落，沉默寡言。在那样的日子里，旅行就好像是没有尽头。她有时候甚至在没有烤面包时也会闻到强烈的香草味。还有些时候，我能够从眼睛余光里看到她偷偷把手伸进钱包，然后把什么东西塞进嘴里。

我们通常坐在图书馆聊天。玛丽安娜每天打电话询问情况时，我经常在那里。

祖母接通电话后，会盖上听筒，对我说：“是玛丽安娜，”然后，对她女儿说，“猜猜谁在这？玛丽。”她停顿了一下，我想她是想给玛丽安娜一个机会说些诸如“代我跟她问好”之类的话，但她从来没有这样做。

有时我们会去当地一家餐馆吃饭。祖母最喜欢一家名叫“狡猾的狐狸”的午餐厅。那是一家低调的酒吧，就在她被抢劫的杂货店停车场对面。我们从未多谈过我的父亲，但有一天她显得特别怀旧。她回忆起我父亲和比利·德雷克曾经遇到的麻烦，父亲是多么会逗她开怀大笑。服务员过来收盘子时，她就安静下来。当他问我们要不要发票时，祖母没有回答，所以我点了点头。

“玛丽，他病得很厉害。”

“我知道，祖母，”我说，以为她是说他酗酒。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以为她要哭了，徒劳无益地说：“祖母，没事的。”

“最后几周”—她深吸了一口气—“他都下不了床。”

“我来的那天——”我问道。

服务员拿来了支票。

“他没有去看医生吗？”我问。“我是说，如果他病得那么重的话。”

“听说你要来看他，他感到很难过。”

我等着她说点别的，但祖母打开了她的钱包。她总是付午餐费。我默默地开车送她回家。

1987 年，我在德国度过了我的大三时光。我对德国没有好感，但我想这可能会让祖父高兴，因为那是他父母出生的国家。（他一点也不高兴。）我本来打算回家过圣诞节的，于是我打电话给祖父母，问我能不能和他们一起住。

我拿着一把五马克硬币站在宿舍走廊的公用电话旁，给家里打电话。他接听时，我说“嗨，爷爷，我是玛丽。”

“嗯，”他回答说。

我解释了我打电话的原因。

“你为什么不能和你妈妈呆在一起？”他问。

“我对猫过敏，担心我可能哮喘发作。”

“那就告诉她把猫赶走。”

现在做个“漂亮的女士”容易多了。

我亲眼见证了和祖父一起生活对祖母来说是多么艰难。祖父的古怪行为是从一些小事开始的，比如把支票簿藏起来。当她与他对质时，他指责她试图使他破产。当她试图和他讲理时，他会勃然大怒，使她心惊胆战。他总是担心钱，害怕自己的财产正一点点消失。祖父一生中连一天穷日子都没有过过，但贫穷却成了他唯一关心的事；他被可能的贫穷所折磨着。

祖父的情绪终于稳定下来了，但祖母的问题变成了重复。晚上从办公室回到家后，他会上楼换衣服，通常下楼时会穿着一件新衬衫和领带，但没有裤子，只有平角短裤、袜子和皮鞋。他会说，“大家好吗？好？那就好。晚安，亲爱的，”然后回到楼上，没过几分钟又下了楼。

一天晚上，我和祖母一起坐在图书馆，爷爷进来问：“嗨，亲爱的，晚饭吃什么？”

她回答后，他走了出去。过了一会儿，他又回来了。“晚餐吃什么？”她又回答了一遍。他这样来来回回十、十二、十五次。她每次都告诉他“烤牛肉和土豆”，耐心一点点被消磨殆尽，。

最后她狠狠地怒斥他一顿。“看在上帝的份上，弗雷德，住嘴！我已经告诉过你了。”

“好吧，好吧，亲爱的，”他紧张地笑着说，踮着脚尖跳起来时把手搭在她身上。“好吧，就这样，”他说，把大拇指夹在背带下，好像我们刚刚结束了一次谈话。他的手势和往常一样，但眼睛里的光芒变得柔和了。

他离开了房间，几分钟后又踱步到房间里问道：“晚餐吃什么？”

祖母把我拉到门廊上，那是一个不受欢迎的水泥广场，就在房子侧面离图书馆不远的地方，几十年前，那里曾被用于家庭烧烤。它被忽视了很久，以至于我常常忘记它的存在。

“我发誓，玛丽，”她对我说，“他要把我逼疯了。”那些被遗弃在外面、早已被遗忘的椅子上堆满了树枝和枯叶，所以我们俩都只能站着。

“你需要帮助，”我说。“你应该找个人谈谈。”

“我不能离开他。”她几乎要哭了。

“我很想再回一次家，”她曾忧愁地告诉我。我不明白她为什么不能回苏格

兰，但她坚决拒绝做任何看起来自私的事。

周末的时候，如果不在海湖庄园，我的祖父母会开车去他们其他孩子的乡间别墅：纽约米尔布鲁克的罗伯特家，南安普顿的伊丽莎白家，或者新泽西州斯巴达的玛丽安娜家。他们会计划住上一晚，我的祖母十分期待和其他家人一起度过一个安静、放松的周末。他们一到目的地，祖父就会问他们能否回家。祖母不同意，他绝不罢休，最后他们又回到车里。周末（或一天）度假的想法是为了祖母考虑，这是一个让她走出家门，获得陪伴的机会。最终，这种作客变成了另一种形式的折磨。但就像家里其他很多没有意义的事情一样，他们还是继续这样做。

祖母又住进了医院。我不记得她是因为什么原因住院，但出院时，她可以选择去康复中心或让物理治疗师上门服务。她选择了去康复中心。她告诉我：“只要不回家，什么都可以。”

那样更好。抢劫案发生后，她不得不在图书馆的病床上睡了几周。祖父在髋关节手术后恢复得很好，但他却没有什么同情或安慰的话要说。

“一切都很好。对吧，亲爱的？”他会说。

1998 年，我们第一次在特朗普大厦唐纳德的公寓里庆祝父亲节。让祖父在公共场合露面变得十分困难，所以像往常一样去布鲁克林彼得·鲁格牛排餐厅庆祝是不可能的。每年的父亲节和祖父生日，我们都分别会去一次，这是这个家的传统。彼得·鲁格是一家非常奇怪又昂贵的餐厅，不仅服务差劲还额外收费，只接受现金、支票或彼得·鲁格信用卡（我祖父拥有这张卡）。菜单种类很少，不管你点没点，都会有一大盘的牛排番茄和白洋葱，还有用小陶瓷盘盛放的炸薯条和奶油菠菜，这些通常我们一动都不会动。他们会用托盘端上一块牛肉，中间点缀着各种颜色的塑料小牛，有红色和粉红色的，还有很多其他颜色。我们大多数人都点了可乐，装在 6 盎司的瓶子里；因为传说中糟糕的服务，这意味着到了晚上，桌子上到处都是牛的残骸，几十个可乐瓶，还有我家人碰都没碰过的几盘子食物。

直到我祖父把骨头里的骨髓吸出，这顿饭才结束。想想他的胡子，这是一个值得一看的景象。

由于我在大学期间就不再吃肉，在彼得·鲁格吃晚饭就成了一个挑战。我曾经犯过一个错误，点了鲑鱼，占据了半个桌子，在牛排餐厅点鲑鱼，味道可想而知。最后，我的晚餐就是可乐、小土豆和一份冰沙拉。

我可不会想念那些粗鲁的服务员，但我想唐纳德公寓里至少能有点我能吃的东西。

我真不应该早早独自一人来到顶层豪华公寓。虽然唐纳德和玛拉还继续保持婚姻关系，但她已经是一个遥远的记忆，取而代之的是他的新女友梅拉尼娅，一个我从未见过的 28 岁斯洛文尼亚模特。他们坐在门厅里一个看起来很不舒服的双人沙发上，那是一个很大的，未定义的空间。一切都是大理石、金箔、镜面墙、白墙和壁画。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办到的，但唐纳德的公寓感觉比海湖庄园的房子更冷清，更不像一个家。

梅拉尼娅比我小五岁。她脚踝交叉着坐在唐纳德旁边。我发现她的皮肤很光滑，这使我震惊。罗伯特和布莱恩第一次见到她后，罗伯特告诉我，梅拉尼娅在整个用餐过程中几乎没有说话。

“也许她的英语不是很好，”我说。

“不，”他嘲笑道。“她知道她为什么来这。”显然，不是为了她精彩的交谈。

我一坐下，唐纳德就开始告诉梅拉尼娅，他曾请我写《东山再起的艺术》，然后又开始谈起来我“绝处逢生”的救赎故事。他认为这是我们的共同点：我们都曾跌入谷底，然后以某种方式重回顶峰（像他一样）或只是回来（像我一样）。

“你大学退学了，对吧？”

“是的，唐纳德，是的。”这正是我想被介绍给一个素未谋面的人的方式。我也很惊讶他居然知道这一点。

“当时真的一度很糟糕，然后她开始吸毒。”

“哇哦，”我举起双手说。

“真的吗？”梅拉尼娅突然感兴趣地问。

“不，不，不，我这辈子从没吸过毒。”

他看了我一眼，笑了。他只是为了达到喜剧效果而添油加醋，他知道我知道这一点。“她真是个大灾难，”他说，笑得更开心了。

唐纳德喜欢东山再起的故事，他明白你跌得越深，你成功归来的轰动性就越

大。这正是他自己的经历。通过把我的辍学经历和他雇我写书糅合在一起（同时加入了一个虚构的毒瘾），他编造了一个更好的故事，让他自己扮演了我的救世主的角色。当然，从我辍学到他雇用我这期间，我又回到校园，毕业，并拿到了硕士学位，完全没有吸毒。然而，澄清事实是没有意义的；跟他更是如此。这个故事对他很有利，对其他人也是如此，当门铃响的时候，他可能已经相信了他自己编的故事。当我们三个人站起来迎接新来的客人时，我意识到梅拉尼娅在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只说了一句话。

1999 年 6 月 11 日，弗里茨打电话告诉我，我们的祖父已被送往长岛犹太医疗中心，这是祖父母近年来住过的的另一家皇后区医院。他说这次可能会是他生命的终结。

我从家里开车过去十分钟，到那里时发现病房里已经挤满了人。祖母坐在床边唯一的椅子上，伊丽莎白站在她旁边，握着我祖父的手。

打过招呼后，我走到窗户边站在罗伯特的妻子布莱恩身旁。她说：“我们原本应该在伦敦和查尔斯王子会面的。”我意识到她在跟我说话，她很少跟我说话。

“哦，”我说。

“他邀请我们去看他的马球比赛。“我真不敢相信我们不得不取消。”她听上去很生气，并没有要压低声音。

我本来可以完胜她的故事。一个星期后我就要在毛伊岛的海滩上结婚了。家里没人知道；他们对我的私生活从不感兴趣（必要时，我会请一个男性朋友陪我去参加任何需要同伴的家庭场合），从没有人问过我的男朋友或男女关系。

几年前，祖母和我一直在谈论戴安娜王妃的葬礼，当她激动地说，“他们让那个小同性恋埃尔顿·约翰在葬礼上唱歌真是丢脸，”我意识到她不知道我和一个女人一起生活并订婚了反而更好。在看到祖父的严重病情后，我有一种可怕的预感。回到家后，我必须告诉未婚妻一个消息：我们的秘密婚礼，虽然已经规划了几个月并克服了多个组织上的难题后，不得不推迟。

我注意到房间里突然沉寂下来，好像一瞬间每个人都停止闲聊。那一刻，我们只能听到祖父不均匀的呼吸声：不规则的、不确定的吸气，接着是一个不自然的停顿，这个停顿持续了很长时间，终于他再次呼出了一口气。

第十一章 唯一的货币

弗雷德在 1999 年 6 月 25 日离开了。第二天，《纽约时报》上刊登了他的讣告，标题为“战后中产阶级住房的主要建造者弗雷德·克里斯特·特朗普去世，享年 93 岁”。作者特地在讣告中把白手起家的弗雷德与他功成名就的儿子唐纳德做了对比。相比起他的出身，大家更容易关注我的祖父会在建筑工地上捡起木匠的指甲，第二天还给他的习惯。当时《纽约时报》复述了我们家族的说法：特朗普只从我祖父那里接受了一点点帮助——一笔很小的钱，但二十年后，《纽约时报》自己也会反驳这种说法。

我们各自拿着一份《纽约时报》坐在图书馆里。兄弟姐妹们正在责备罗伯特，因为他告诉了《纽约时报》祖父的财产大约有 2.5 到 3 亿美元。“绝对不要透露给他们数字!”玛丽安娜教训他说，就像在教训一个笨小孩。罗伯特羞愧地站在那，一边扳响指关节一边来回踱着步，就像我祖父以前那样，仿佛突然想到了接踵而来的税单。实际上，罗伯特对记者说的财产估值太低了，我们最终了解到祖父商业帝国的价值可能是这个数字的。当然，玛丽安娜和唐纳德是永远也不会承认祖父的遗产有这么多的。

之后，在曼哈顿上东区的弗兰克·坎贝尔殡仪馆里——纽约市最豪华高档的丧仪服务商，我们站在麦迪逊房间的楼梯上，与排着长长队伍的访客们握手微笑。

一共有 800 人来访。有的访客是来表示敬意的，比如像竞争对手——房地产开发商山姆·莱弗拉克、纽约州长乔治·帕塔基、前参议员阿马托、喜剧演员琼·里弗斯（之后她成了唐纳德举办的电视节目《名人学徒》的选手）。剩下的访客们来参加葬礼可能只是为了来看一眼大名鼎鼎的唐纳德。

在葬礼那天，纽约的大理石教堂人满为患。从头到尾，一切都像经过精心编排的戏剧，每个人都扮演着一个角色。伊丽莎白朗诵了我祖父“最喜欢的”诗，其余的兄弟姐妹也致以悼词。我哥哥代表我们的父亲致辞，我的堂兄大卫代表孙子孙女们致辞。他们大多是讲关于我祖父的故事，只有我我哥哥的悼词赋予了祖父人情味。许多悼词都直接或者间接性地强调着我祖父物质上的成功：他的“杀手”本能以及他节俭的才能。但是唐纳德是唯一一个脱离剧本的人，他的悼词瞬间转变成对自己成就的吹嘘。场面尴尬到玛丽安娜告诉她儿子不允许任何兄弟姐妹在她的葬礼上致悼词。

时任纽约市市长鲁迪·朱利安尼也致了辞。

葬礼结束后，六个最大的孙子孙女（蒂芙尼还很小）作为护柩者随同棺柩一起来到了灵车前。和我们家的情况一样，这意味着别人出力而功劳是我们的。从第五大道和第 45 街到中城隧道的所有街道都已经禁止汽车和行人通行，因此我们的车队在警车的护送下很快就出城到达皇后区的墓地了。

从墓地回城也十分迅速，只是少了些来时的排场。大家在唐纳德的公寓里吃完午餐之后，我陪伴祖母回了家，然后和她坐在书房里聊了一会儿。她看上去既疲惫又宽慰。今天是很漫长的一天；不，应该说这段时间是很漫长的几年。除了住在楼上的女佣，这个房子里就只有我们两个人。实际上，我那时本应该在度蜜月的。之后，我陪着祖母待到了她准备睡觉。

她说她要睡觉时，我问她是否需要我留下来，或者我走之前有什么能为她做的事情。

“不用了，亲爱的。我很好。“

我弯下腰亲吻她的脸颊。她闻起来就像香草。“你是我最喜欢的人。”我对她说。这并不是真的，但这么说是因为我爱她。我这么说也是因为，除了我之外没有别人愿意留下来陪她，即使今天是与她相处了 63 年的丈夫下葬的日子。

“太好了，我应该是你最喜欢的人。”

然后我离开了，留她一个人在那个硕大、空旷又安静的房子里。

两周后，一辆 DHL 快递车在我家门口停下并送来了一个黄色信封，里面装有祖父的遗嘱。我仔细阅读了两次以确保我没有误解任何信息。我之前跟哥哥说好只要收到遗嘱就立马打电话给他，但是我犹豫了。弗里茨和丽莎的第三个小孩威廉在祖父葬礼之后没多久就出生了。在那后的 24 小时，威廉因为癫痫发作，被送进了新生儿童重症监护室一直到现在。除了威廉，他们还有两个小孩，弗里茨还必须继续上班。我都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应对这一切的。

我讨厌告诉别人坏消息，但是哥哥必须知道这封遗嘱的信息。

我拨通了他的电话。

“怎么样？”他问道。

“什么都没有。”我告诉他，“我们什么也没有得到。”

几天后，我接到罗伯特的电话。记忆中他只在告诉我祖母进医院时才给我打

过电话。他表现得就像一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他暗示到，如果我在遗嘱上签字，一切都会很顺利。并且，他确实需要我的签名，那份遗嘱才能被送去遗嘱认证。虽然我祖父剥夺了我和哥哥的继承权——意思是他把本应当属于我父亲的那 20%财产分给了他的其他四个孩子，但是我们仍然在所有专门给孙子孙女们遗赠的列表中。事实证明，这份遗赠数的额还不及我伯父伯母们拿到的百分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我和弗里茨只得到了很小一部分财产，我们却依然有权利阻止财产分配，这一点一定让罗伯特怒不可遏。

好几天过去了，我还是不想在遗嘱上签字。这份遗嘱实在令人难以忘怀，因为它既残酷又简明扼要，就像我父母的离婚协议书。

有一段时间，罗伯特每天都打电话给我。唐纳德和玛丽安娜让他来说服我，因为唐纳德不想这么费心，而玛丽安娜的丈夫刚被检测出食道癌，并且预后效果十分不乐观。

“赶快结束这一切吧，亲爱的。” 罗伯特不断地对我说这句话，就好像这能让我忘记遗嘱残酷的内容。无论他说了多少次，我和我哥哥都决定在看清我们所处的形势之前先不签署任何文件。

最终，罗伯特开始不耐烦了。弗里茨和我挡了他们的路，如果没有所有受益人的签字，他们就没法去做遗嘱认证。在我告诉罗伯特我和弗里茨暂时不打算签字之后，他提出我们应该开会讨论一下。

在我们的第一次会议上，我让罗伯特解释一下为什么我的祖父要这样对待我们，他说：“听着，你们的祖父根本不在意你们，他根本不在意任何一个孙辈。”

“我们被这样对待是因为我们的父亲去世了。”我说。

“不是这样的。”

但我们提到我们的堂兄妹们仍然能从他们父母那得到祖父的财产时，罗伯特说：“他们可能随时被断绝关系。小唐纳德之前胡说八道，说他要参军，唐纳德和伊凡娜说如果他这么做就立马与他断绝关系。”

“可我们的父亲连这份权利都没有。”

罗伯特坐了下来。我可以看出他在调整自己。“很简单，对你祖父而言，死了就是死了，他只在乎活在世上的子女。”

我本来跟罗伯特说祖父也并没有在乎过他，但是弗里茨打断了我，对他说：

“罗伯特，这真的很不公平。”

——

我已经记不清从 1999 年 9 月到 12 月期间我们三个开了多少次这样的会了。9 月份倒是暂缓了一段时间，因为我正在夏威夷举办推迟的婚礼和蜜月。

在这场讨论最开始的时候我们三人就达成共识要对祖母保密。我想她应该并不知道祖父的遗嘱对我们这么不公平，当然也没有什么理由让她难过。希望我们能够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顺利解决这一切。我不在纽约的时候每天都给她打电话，一回去就立马去看她。此外，谈判（如果这些会议能被叫做谈判的话）也在继续着。实际上，谈判的内容单一乏味，并没有什么新意。不管弗里茨和我怎么说，罗伯特都继续用他的那套陈词滥调回复我们，所以这场对话停滞不前。

我的祖父早在几十年前就成立了米德兰合伙人（Midland Associates）管理公司，目的是为了避税并让他的孩子们受益。于是，我问了罗伯特一些关于这家公司的问题。米德兰公司拥有 7 栋建筑物（包括桑尼塞德大厦和高地大厦，我们家族的人将这几座大厦称为“小帝国”。因为受托人从来没有向我解释过这个公司是如何运作的，所以我对此并没有深入的了解，只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收到支票。我们想知道祖父的去世会对此有什么影响。

我们并不是要争取特定的金额或者遗产的百分之多少，只是想确保我们已经拥有的资产是安全的。当然，考虑到家族巨大的财富，他们愿不愿意给我们一些公道。作为遗嘱执行人和唯一受益者，伊丽莎白、玛丽安娜、唐纳德和罗伯特有一定的自由度，但是罗伯特依然保持不置可否的态度。

我们的最后一场谈判是在 56 街公园大道的德雷克饭店的酒吧里进行的，那时罗伯特已经开始清楚我们不打算在遗嘱上让步了。在此之前，尽管他一直对我们说些不快的话，但他始终保持着和蔼的态度，仿佛在说：“嘿，孩子们，我只是个带信人。”在酒吧的那天，罗伯特又一次提醒我们，祖父是多么憎恨我母亲，担心他的钱会落入母亲手中。

这实在是太可笑了。二十五年来，母亲一直按照特朗普家族制定的规定生活，规矩地遵循他们的指示。她一直住在那个皇后区破烂的牙买加公寓中，即使给她的赡养费和子女抚养费从未增加，母亲也从来没有抱怨过。

最后，弗雷德与我们断绝了关系。我们的受托人——玛丽安娜、唐纳德、罗

伯特和欧文——是在财务问题上可以保护我们的人，但很明显他们并不想损害自己的利益来帮助我们。

罗伯特的身子向前倾了倾，严肃地说：“听着，如果你不在遗嘱上签字，如果你准备告我们，那我们就让米德兰公司破产。你后半辈子都要给那些你得不到的钱交税！”

此后就没什么可说了。我们要不妥协，要不与他们斗争到底，这两种都不是好选择。

之后我们去咨询了欧文，他算是我们唯一的盟友了。他看到祖父的遗嘱对我们如此不公后也很生气。在我们跟他说了罗伯特在米德兰公司和其他特朗普投资上的态度之后，他说：“单你们在比奇港（Beach Haven）和滨海（Shore Haven）的地租份额就已经无价了。如果他们什么都不愿意给你们，你们必须起诉他们！”

除了知道自己有一份之外，我不知道地租是什么意思，但我知道“无价”的意思。我相信欧文。基于他的建议，我们做出了一个决定。

几个月之后，威廉仍在医院，弗里茨和丽莎已经有些不知所措了。我告诉他们我会处理好这件事，那天下午我打电话给罗伯特。

“罗伯特，你们到底能不能帮我们？”我问他

“先签遗嘱，然后再说。”

“真的吗？”

“你爸爸已经去世了。”他回答到。

“我知道我父亲去世了，但我们还活着。”我对这样的谈话内容感到恶心。

他停顿了一会儿说：“玛丽安娜，唐纳德和我只是在遵循你祖父的意愿。他不想让你们，你和弗里茨，特别是你妈妈，拿到一分钱。”

我深吸了一口气，说：“这样谈不出结果。弗里茨和我要请律师。”

这句话好像按下了什么开关，罗伯特对我大喊：“你爱做什么做什么。”然后挂断了电话。

第二天，我回家之后在答录机上收到了祖母的留言：“玛丽，我是祖母。”她的声音很果断。

于是我马上给她回了电话。

“你伯父罗伯特告诉我你和你哥哥正在起诉想要拿到祖父财产的 20%。”

我感到眼前一黑，一时无法回答。罗伯特显然违背了我们的协定，告诉了祖母我们之前的谈判，当然是他自己的版本。但令我沮丧的还有祖母的态度，好像争取父亲本该继承的财产是错误且不合理的。我变得很迷茫，一时不知道爱与忠诚是什么，不知道爱与忠诚的界限是什么。我以为自己是这个家族的一份子，原来我错了。

“祖母，我们暂时还没做什么。我不知道罗伯特怎么跟您说的，但是我们不打算起诉任何人。”

“你最好不要。”

“我们只是想解决这个问题，仅此而已。”

“你知道你父亲去世时的价值是什么吗？”她说。“一文不值。”

她停顿了一会儿然后传来一阵咔哒声，她把电话挂断了。

第十二章 崩塌

我拿着电话坐在那里，不知道接下来要怎么办。就在那一刻，一切都变了，事情完全超过了我能处理的范围。

我拨通了哥哥的电话。听到他声音的瞬间，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哥哥又打电话给祖母，尝试着解释清楚我们真正的诉求，但不过是把刚刚我和祖母之间的对话重演了一遍。祖母对他的临别赠言略有不同，她对哥哥说：“你父亲死的时候，连两个铜子儿都拿不出来。”在我的家族里，钱是唯一重要的东西。如果钱是唯一的货币，那它就是衡量价值的唯一考量。在这种情况下，像我父亲那样成绩寥寥的人是无足轻重的，即使他恰好是你的儿子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甚至，如果我父亲死时身无分文，他的子女也无权得到家族的任何财产。

祖父完全有权利在他觉得合适时更改遗嘱，我的姑姑和叔叔们也应该严格遵照祖父的指示行事，尽管他们谁都不如我父亲更配得到祖父的财产。如果不是投胎时走运，他们都不会成为百万富翁。毕竟一般情况下，检察官和联邦法官可买不起棕榈滩两千万美元的别墅，行政助理也无法在南安普顿拥有周末别墅（不过公平点说，除了我父亲之外，玛丽安娜和伊丽莎白确实是所有兄弟姐妹中唯二不在家族企业工作的人）。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表现得好像祖父的每一分钱都是他们赚来的，并且觉得这些钱和他们自己的价值紧紧相连，因此让他们放弃任何钱都是不可能的。

在欧文的建议下，我们联系了杰克·巴诺斯基（Jack Barnosky），他纳索县最大的律师事务所——法雷尔·弗里茨律所的合伙人。杰克这个人有点自负，但他接受了我们的咨询，给出的对策是：要证明我祖父弗雷德 1990 年签署遗嘱时头脑不清醒，受到了孩子们的不当影响，因此那份遗嘱应当被推翻。

我们和遗嘱执行人见面后不到一周，杰克就收到了卢·劳里诺（Lou Laurino）的来信。劳里诺是个身型矮小精壮的男人，负责代理祖父的遗产。自我们出生以来，特朗普集团就一直为我们提供医疗保险，但现在却撤销了。特朗普家族的每个人都有这份保险，我哥哥就是靠它来支付我侄子的巨额医疗费。威廉第一次生病时，罗伯特曾向弗里茨承诺，他们会处理好一切，弗里茨只要把账单送去就可以了。

撤销我们的保险对他们没有任何好处，只会徒增我们的痛苦和绝望。威廉虽

然那时已经出院，但仍然频繁发病，多次出现严重的心脏骤停，幸好及时进行了心肺复苏，否则已经丧命了。他仍然需要 24 小时的医护服务。

保险被取消的事家族里的人都知情，但却无人反对。祖母和其他人一样，明明知道自己病入膏肓的曾孙很可能一辈子离不开昂贵的医疗护理，却依然无动于衷。

弗里茨和我别无选择，只好又发起了一场诉讼，要求他们恢复威廉的医疗保险。这需要照顾威廉的医生和护士提供证词和宣誓书，整个过程费时费力，最后还要出庭作证。

为他们撤销保险的行为辩护的是劳里诺。他先声称我们无权期望保险永久有效，那只是我祖父出于善意赐予我们的礼物。然后，他对于威廉的病情轻描淡写，并坚持说那些 24 小时照顾威廉、不止一次救了他的护士只是“高价的保姆”，还说如果弗里茨和丽莎担心他们的小儿子再次发病，就该去学习心肺复苏术。

这次取证完全没有帮到我们。我简直无法相信杰克的表现那么糟糕，他不仅不追问，还在法庭上走神。我和弗里茨为他准备了一长串的问题清单，他却几乎没有提及。罗伯特也比我上次和他交谈时疏远了很多，他重申祖父之所以剥夺我们的继承权，主要是因为他厌恶我们的母亲；玛丽安娜娜愤怒地称呼我和我哥哥为“缺席的孙辈”。我回忆起去看望祖母时玛丽安娜给家里打的那些电话，恍然大悟为什么她从来不曾让祖母代她跟我打招呼。她还说，祖父觉得我们兄妹从来没有和祖母相处过，因此才对我们大发雷霆，这话完全置过去十年的情况于不顾。显然，祖父还曾讨厌弗里茨从不打领带，讨厌我十几岁的时候穿松垮的毛衣和牛仔裤。当唐纳德作证的时候，他说他什么都不知道、记不得了，他不止一次用这种“战术性失忆”逃避责任和拷问。他们三姐弟在证词中都声称，我祖父在去世前一直“很精明”。

那时，我姑姑伊丽莎白碰到了一位家族里的朋友，那位朋友后来把他们两人交谈的内容转述给了我哥。当时姑姑问这位朋友：“你知道弗里茨和玛丽在做什么吗？他们只关心钱！”遗嘱当然与钱有关，但对于我们这个只有一种标准的家族来说，遗嘱也与爱有关。我想姑姑可能已经想明白了，她其实没有任何权力，除了我和我哥，其他人都不在意她的看法。但她不站在我们这边这一点还是很伤人，毕竟一个沉默没有任何权利的盟友也好过什么都没有。

差不多两年后，我们的法律账单不断增加，和解也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因此我们只能决定是否要将家族告上法庭。开庭审理要消耗巨大的精力，需要当事人极度专注，这是我哥哥无法保证的，因为威廉仍然病得很严重。因此我们勉强决定和解。

但玛丽安娜、唐纳德和罗伯特拒绝和解，除非我们同意让他们购买我们从父亲那里继承的财产——集团 20%的股份和“无价”的租约。

我的姑姑叔叔们向杰克提交了财产评估报告，杰克和劳里诺利用报告里那些数据（真实性存疑）算出了和解金额。杰克告诉我们，如果不走庭审程序，那个数字就是我们最好的结果了。他还说：“我们知道他们在撒谎，但这事无凭无据。还有，你祖父的遗产其实只值三千万左右。” 三千万只是罗伯特 1999 年泄露给《纽约时报》的估价的十分之一，而且这个估价本身只有遗产实际价值的四分之一。

弗雷德无疑相信我父亲获得了和唐纳德一样的工具、一样的优势和一样的机会。如果父亲把这些都丢掉了，也不是祖父的错。如果不是他们，我父亲会继续成为一个糟糕的赡养人，父亲在世时没把信托基金挥霍完，我和哥哥应当庆幸才是。不管之后我们经历了什么，都与祖父无关。他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责任，我们无权奢求更多。

官司还未结束，我收到了祖母去世的消息。祖母经历了短暂的病痛之后，于 2000 年 8 月 7 日在长岛犹太医疗中心（祖父病逝的同一家医院）去世，享年 88 岁。

我想如果我知道她病了，一定会去看她。但她生前并没有要求见我，这说明我们彼此之间没有那么“依依不舍”。在上次电话交谈后，我和祖母再也没有说过话，我也没有再和罗伯特、唐纳德、玛丽安娜和伊丽莎白说过话，甚至根本没有想过试着联系他们。

弗里茨和我决定去参加祖母的葬礼。我们知道自己不受欢迎，于是站在了马布尔学院教堂后面的备用间，和唐纳德的几个保安一起在电视上观看了葬礼。

和悼词相比，反倒是没有直说的话更引人关注。悼词里对于我的祖父母在天堂团聚的情形有诸多猜想和勾勒，但却完全没有提到我的父亲——他们死去近

27 年的大儿子。他甚至没有出现在祖母的讣告中。

祖母去世几周后，我收到了一份她的遗嘱副本。这份遗嘱简直是我祖父遗嘱的复制版，不同点只有一处：概述孙辈所得遗产的部分删除了我和哥哥的名字。我父亲和他这条支系已经完全从家族中抹去了。

第四部分 最糟糕的投资

第十三章 政事即私事

再次与家族的人见面已是近十年后。2009 年 10 月，我应邀参加堂妹伊万卡与贾瑞德·库什纳的婚礼。请柬是用特朗普集团钟爱的加厚信笺印刷的，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会收到请柬。

我乘坐豪华轿车从长岛的家一路行驶近唐纳德位于新泽西州贝德明斯特的高尔夫俱乐部会馆，会馆看起来和祖父母曾经的宅邸惊人的相似，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招待员给我们发了黑色的披肩，我披了一条在肩膀上，这才稍觉安心。

户外仪式在一座白色的大帐篷下举行。鎏金的椅子成排摆放在镶着金边地毯的两侧，扎满了白玫瑰的传统犹太式华盖有我的房子那么大。唐纳德戴着圆帽稍显笨拙地站着。贾瑞德的父亲查尔斯三年前才从狱中获释，在新人宣誓前，他起身对大家说，当贾瑞德第一次向他介绍伊万卡时，他曾认为伊万卡永远不会优秀到可以加入他们的家庭。伊万卡承诺皈依犹太教并努力做到之后，他才开始觉得伊万卡配作他的儿媳妇。查尔斯曾雇佣妓女勾引自己的姐夫，录下了他们幽会的录音，并在外甥的订婚派对上把录音发给了自己的姐姐。他就是因此获刑入狱的。鉴于此，我觉得他的高傲有些过分。仪式结束后，我和哥哥、嫂子进入会所。

在会所的走廊上我看到了罗伯特叔叔。上次和他说话是在 1999 年，当时我告诉他我正和弗里茨聘请律师争取祖父的遗产，他听后挂断了我的电话。而这次当我走向他时，他竟冲我微笑，不禁令我大吃一惊。他微微倾着身子——即便我穿着高跟鞋他还是比我高很多——非常“特朗普式地”和我握手并行了吻面礼。

“亲爱的！最近过得好吗？”他爽朗地招呼我。还没等我回答，他就接着说：“你知道吗，我一直在想，我们家族应该不该再疏远彼此了。”说罢，他踮脚一跃，一只手握拳锤进另一只张开的手掌中，这动作是在模仿祖父，但不太像。

“听起来不错。”我回应说。互相寒暄了几分钟后，我走上楼梯，来到鸡尾酒会，发现唐纳德在和一个人说话，那人我认识，是个市长或州长，但我想不起他究竟是谁。

“嗨，唐纳德，”我一边走向他们一边说。

“嗨，玛丽！很高兴见到你，你看上去气色真好。”他像罗伯特一样和我握手，并吻了吻我的脸颊。

“我也很高兴见到你。” 我俩之间的氛围愉悦得体，这让我很欣慰。确定了这一点后，我把位置让了出来，因为身后还排着长长的一队人，其中一些正等着祝贺这位新娘的父亲。那时《学徒》刚刚播完第八季，所以许多人也可能只是为了和特朗普一起拍照。我走开时，特朗普在身后冲我说：“玩得开心。”

鸡尾酒会是在一个巨大的宴会厅里举行的，距离餐前甜点供应处有一段距离。走过去的路上，我远远看到姑姑伊丽莎白在追赶她的丈夫。我向她招手，她也向我挥了挥手说：“嗨，我的小甜心。”但她没有停下追赶的脚步。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她。我走过遍地插满的彩旗和高度抛光的舞池，终于在舞厅外围的第二代堂/表兄妹那桌找到了自己的座位。远处偶尔传来直升机起降时旋翼发出的“呼呼”声。

上完第一道菜后，我决定去找玛丽安娜。我绕过桌子时，唐纳德上台敬酒。如果不是事先知道他在说谁，我会以为他在给他秘书的女儿敬酒。

我找到了玛丽安娜，停下了脚步。但直到我走到了她面前她才看到我。如果没有她的同意，我和弗里茨不会被邀请参加伊万卡的婚礼。

“嗨，玛丽安娜姑姑。”

她花了几秒钟才反应过来我是谁。“玛丽，最近过得好吗？”她没有笑，表情很僵硬。

“挺好的。我女儿刚满八岁，还有……”

“我都不知道你还有个女儿。”

她当然不知道我有个女儿，不知道我是在祖父的葬礼后，和前妻结婚一起抚养了这个孩子，后来又离婚了；也不知道我最近刚拿到了临床心理学博士学位。但她表现得好像因为不知道这些而受到了侮辱。后来，我俩简短的谈话依然紧张。她提到伊凡娜错过了伊万卡的单身告别派对，但又嘀咕说不能讨论其中的缘由。

我回到了座位，发现自己点的素食还没有上桌，于是又点了一杯马提尼作为替代。有橄榄就够了。

过了一会，我看到玛丽安娜神情坚定地朝我们走来，仿佛在执行任务。她径直走到我哥哥面前说：“我们需要进房间谈点事情，”然后示意我也要去，“我们

三个人。”

伊万卡和贾瑞德的婚礼结束几周后，我和弗里茨在玛丽安娜位于上东区的公寓见到了玛丽安娜和罗伯特。我不知道罗伯特为什么会在那儿，但我想，也许他打算践行他所说的“家族疏远时效已过”。开始，我觉得这是个好兆头，但随着时间流逝，我不太确定了。我们没有讨论任何相关的话题。正当我们坐在客厅欣赏中央公园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绝美景观时，玛丽安娜提到了那场诉讼，她管它叫“崩塌”。但其他人似乎都不想接话。

罗伯特坐在椅子上身体前倾，我祈祷终于可以开始谈正事了。但罗伯特却讲了一个故事。

十年前，罗伯特还在大西洋城为唐纳德工作。当时唐纳德的财务状况很糟糕，投资人遭受重创，银行跟在后面催债，他的个人生活也一片混乱。当境况糟糕到极点时，唐纳德给罗伯特打了电话，提出了一个请求，他说：

“罗伯特你听我说，我不知道这一切会怎样结束，但过程真的太艰难，我可能会突发心脏病死掉。如果我出了什么事，希望你能确保玛拉的安全。”

“当然。需要我为你做什么？”

“给她一千万美元。”″

我正想着：天哪，那可是一笔巨款啊！但同时却听到罗伯特说，“抠搜的混蛋。”

罗伯特一边回忆一边笑，而我坐在那里整个人惊呆了，无法想象他们到底多有钱。最后我听说，1000 万美元应该是我祖父全部财产的三分之一。

玛丽安娜接着说：“差不多就在那个时候，唐纳德还打电话对我说，我是他最喜欢的三个人之一。他显然忘记了他有三个孩子。”(那时，蒂凡尼和巴伦还没出生。)

那次之后，我和哥哥再也没有见过罗伯特，但偶尔会和玛丽安娜姑姑吃午饭，有时三人一起，有时各自单独见她。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真正了解姑姑。自从我开始写关于唐纳德的书以来，我再也没觉得自己是家族的一份子。

2017 年 4 月，距离姑姑的生日派对已经过了几个月。有一天，我正在客厅系鞋带，门铃响了。平时我几乎不接门铃，因为大概率是耶和华教或摩门教的传

教士，或是有人要我签署请愿书。但那次我却鬼使神差地开了门。

唯一记得的是当我打开门时，门口站着一位我不认识的女人，她留着金色卷发，带着黑框眼镜，身上的卡其布衫、纽扣衬衣和斜挎包表明她不是洛克维尔中心区的人。

“您好，我叫苏珊娜·克雷格，是《纽约时报》的记者。”

记者们已经很久不联系我了。除了来自《琼斯母亲》的大卫·康恩和《前线》的某个记者之外，唯一在选举前给我留言的是《内幕新闻》（Inside Edition）的记者了。在 2016 年 11 月之前，我要说的任何有关唐纳德的话都不重要，怎么还会有人要听我的意见？

这种徒劳的感觉让我很恼火，于是我对她说：“你就这么来我家是不妥的。”

“我理解，非常抱歉。但我们正在撰写一篇关于特朗普家族财务状况的文章，这篇文章很重要，我们相信您一定可以帮到我们。”

“我不能和你讲话。”

“请至少收下我的名片。如果您改主意了，随时给我打电话。”

“我不和记者讲话。”我这么说着，但还是收下了她的名片。

几周后，我的左脚第五跖骨骨折，之后的四个月只能像囚徒一样待在家里，坐在沙发上时脚始终要高高翘着。

那时，我收到了苏珊娜的来信，信中她重申相信我能提供有帮助的文件资料来“改写美国总统的历史”。我没有理会，但她却坚持给我写信。

之后的一个月，我每天瘫在沙发上刷推特，背景新闻不断更新，我眼看着唐纳德破坏规矩、陷联盟于危机之中、践踏弱势群体。唯一让我震惊的是，竟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扶持他。

看着民主在瓦解，人们的生活也因为我叔叔的政策而分崩离析时，我不断回想起苏珊娜的信。于是我找出了她的名片，给她打了电话。我告诉她，我想帮忙，但手里已经没有和多年前那场诉讼有关的资料了。

“杰克·巴诺斯基可能还留着一些资料。”苏珊娜说。

十天后，我动身前往杰克的办公室。

法雷尔·弗里茨律所的总部位于两栋有着蓝色玻璃墙的矩形建筑中的一栋里。

刺骨的冷风从两栋楼之间开阔的停车场呼啸而过。入口附近无法停车，所以找到停车位后，我花了十分钟才拄着拐杖来到大厅，乘坐扶梯和在大理石地板上行走时都格外小心。

到达目的地时我已经疲惫不堪，燥热无比。30 只纸箱摆满了两面墙和一个书架，除此之外，房间里就只有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杰克的秘书友善地拿出了一叠纸，一支笔和一些回形针。我放下包，把拐杖靠在墙上，瘫坐在办公桌旁的椅子上。箱子全都没有标签，我不知道该从哪里找起。

我花了大约一个小时熟悉箱子里的东西并编制了一份清单，期间不得不坐在椅子上在房间里转来转去，还要单腿站着把箱子抬到桌子上。杰克路过时，我已是满脸通红，大汗淋漓。他提醒我不能把任何文件带出房间。他说：“这些文件也同样属于你哥哥，我需要得到他的允许才能让你带走。”这根本不是事实。

当他转身离开时，我在他身后喊道：“杰克，你等一下。我们当初为什么决定和解这场官司来着？”

“因为你很担心费用问题。而且，你也知道，我们办案子不靠侥幸。虽然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但那都拿不出实在的证据。再说了，你祖父的遗产只值三千万美元。” 这和近 20 年前我最后一次见他时他对我说的话几乎一字不差。

“哦，好吧。谢谢你。”那时，我手里攥着的文件可以证明，祖父去世时，其遗产的价值实则已经接近十亿美元，只是我不知道而已。

确定杰克已经离开之后，我把祖父遗嘱的复印件、装有诉讼所有证词的软盘，以及祖父的一些银行记录塞进包里带走了。这些文件都是诉讼的一部分，我依法有权拥有。

第二天，苏珊娜来我家取文件，并送来了一部一次性手机，这样我俩就可以更安全地交流了。我们不冒任何风险。

在我第三次探访法雷尔·弗里茨律所时，我有条不紊地检查了每个箱子，发现所有文件都有两份拷贝。我向杰克的秘书说明了这一点，并建议既然备份够多，拿走文件就不需要征得我哥哥的同意了，这让我松了一口气，因为我不想把他牵扯进来。我会给他留下一套文件，以备不时之需。

我刚开始对着《时代周刊》所需的材料清单找文件，就收到了杰克的信息，他说只要我留下一份备份，其他想要什么都可以带走。对此我毫无准备，因为我

原本计划带着能“偷”出来的东西，1 点钟在家里和苏珊娜以及她的两位同事——拉斯·布特纳（Russ Buettner）和戴维·巴斯托（David Barstow）——见面，他们也和苏珊娜一样在忙活文章的事。我给苏珊娜发了短信，告诉她我晚些才能到。

三点钟，我开车到楼下的装货处，把 19 个箱子装进了卡车后厢。卡车是借来的，因为我车子的离合器坏了。

当我开上行车道时，天色刚刚开始变暗。苏珊娜三人在戴维的白色 SUV 里等我，那辆 SUV 上装饰着一对驯鹿角，护栅上还安着一个巨大的红鼻子。当我把箱子给他们看的时候，大家都开始互相拥抱。几个月来我从没那么开心过。

苏珊娜、拉斯和戴维离开后，我精疲力竭地松了一口气。那几周真让人头晕目眩。我还没有完全地意识到自己在冒多大的风险。如果家里人发现了我的所作所为，肯定会有所反应。虽然我知道他们的报复心很强，但无法估量后果究竟会有多严重。与他们已经做的事相比，其他任何事都是小巫见大巫。我终于感觉自己也许能有点作为。

过去，我做不了什么很重要的事，所以也就没有怎么努力过，因为我觉得把事情做好或积善行德都没用，不管做什么都要极度不凡才可以。你不能只是一个普通的检察官，而必须是全国最好的检察官，必须是联邦法官；你不能只是开飞机，而必须在喷气时代刚刚到来时就成为某大型航空公司的专业飞行员。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把自己的这种想法归咎于祖父。但我们都没有意识到，祖父只将“最好”的期望寄希望于我的父亲（他已经失败了）和唐纳德（他已经疯狂越过了祖父的期望）。

当我终于意识到祖父并不在意我的成就和贡献，我不切实际的期望只是自我麻痹时，我仍然坚信只有做一件大事才能“重回正轨”。在帮助叙利亚难民的组织里做志愿者还不够，我必须把唐纳德斗垮。

选举结束后，唐纳德给玛丽安娜姑姑打电话，表面上是想知道姑姑觉得他表现如何。当然，他认为自己已经知道了答案，否则根本不会打这个电话。他只是想让姑姑肯定他表现得很出色。

当玛丽安娜姑姑说“不太好”的时候，唐纳德立刻开始攻击她。

他说：“你真恶心。”玛丽安娜似乎能看到他脸上的冷笑。然后，他像无事发生一样问她：“玛丽安娜，要不是有我，你能有今天？” 这话很得意。玛丽安娜的第一个联邦法官职位是拜唐纳德所赐，因为罗伊·科恩多年前就在帮他俩的忙。

但我姑姑一直坚持认为，她是靠自己的能力赢得了法官的职位，于是反击说：“你敢再说一次，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但这句威胁毫无震慑力。虽然玛丽安娜自称，唐纳德在这个世界只会听她一个人的话，但那些日子早已过去，这个事实在不久后的 2018 年 6 月就得到了证明。在唐纳德与朝鲜那位“独裁者”金正恩举行首次峰会的前夜，玛丽安娜给白宫打了电话并给他的秘书留了条消息：“告诉他，他的姐姐打过电话，想要给他一些建议。一定要他做好准备；要向那些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人多学习；另外，让他远离丹尼斯·罗德曼，别玩推特。”

但唐纳德全然不听。第二天，《政客》杂志网站的头条是“特朗普称，与金正恩的会晤只是一种‘态度’，而不是‘已做好准备’。”如果玛丽安娜姑姑曾经对她这位弟弟有任何的影响力，如今早已消失了。除了生日时必不可少的祝福电话，他们之后就没怎么联系了。

《纽约时报》的几位记者撰写文章时，他们邀请我和他们一起参观我祖父的房子。2018 年 1 月 10 日上午，他们开着戴维的 SUV 来牙买加火车站接我，车上的鹿角和红鼻子装饰依然在。我们从海蓝德（我长大的地方）开始看起。那一整天，我们在雪地里、斑驳的冰块间穿行，努力想尽可能多地参观“特朗普帝国”。

九个小时后，我们还是没能把所有地方看完。我已经把拐杖换成了手杖，但回到家后仍觉得身心疲惫。我尝试去理解所看到的一切。我一直都知道祖父拥有很多房产，但我不知道他究竟有多少。更令人不安的是，有一些房产我从未听说过，但它们当中有 20%曾为我父亲所有。

2018 年 10 月 2 日，《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近 1.4 万字的文章，揭露了我祖父、姑姑和叔叔们从事的一系列秘密欺诈和犯罪活动。这篇文章创下了该报单篇报道字数的历史之最。

从这篇石破天惊的报道中，我了解了很多关于我家族的财务情况，那些都是我闻所未闻的。

可想而知，唐纳德的律师查尔斯·J·哈德否认了文章中的指控，他说：“《纽约时报》关于欺诈和逃税的指控完全是虚假的，诽谤性极强。事实是没有任何人欺诈或逃税。”但调查记者摆出了一个杀伤力很强的案子。在祖父弗雷德的一生中，他和祖母给孩子们转了数亿美元。祖父在世时，仅唐纳德一人就获得了 4.13 亿美元，其中大部分资金是通过合理渠道获得的，比如一些他从未偿还的贷款，从未到期的房产投资，还有一些从未缴税的捐赠。这还不包括他从祖父变卖的“特朗普帝国”财产中获得的 1.7 亿美元。文章中提到的金钱数额令人瞠目结舌，让除了我父亲之外的特朗普四兄妹受益几十年。我父亲早年明明也享有这些财富的一部分，但三十岁时的他却身无分文。我不知道他的钱去哪了。

1992 年，也就是唐纳德试图在我祖父的遗嘱上添加附录来将他的手足排除在外的两年后，唐纳德四兄妹突然又彼此需要了：因为他们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祖父，一生都将几位子女玩弄于股掌之间，而如今四人终于有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保护他们的遗产不受政府干涉。弗雷德的律师建议他在去世前把家族庞大产业的控制权转手给孩子们，以减少遗产税，但弗雷德拒绝了。这意味着玛丽安娜、伊丽莎白、唐纳德和罗伯特可能要承担数亿美元的遗产税。除了几十栋楼外，祖父还攒有巨额现金。他的房产没有负债，并且每年都能带来数百万美元的新收入。对此，姐弟几个的解决办法是成立了一家“全县建筑物资及维修公司”。那时候，祖父其实已经遭到了排挤，不是因为他可能会反对孩子们的计划，而是因为他的痴呆症日益严重。而且由于我父亲已经去世很久，玛丽安娜、唐纳德和罗伯特便可以为所欲为；他们是我和弗里茨的受托人，但却没有人强迫他们履行对我们俩的义务。把我们兄妹俩踢出圈子对他们来说易如反掌。

《纽约时报》的文章称，我的姑姑和叔叔们几乎和祖父一样讨厌纳税，成立公司的主要目的似乎就是把巨额的捐赠金伪装成“合法的商业交易”，从特朗普集团非法吸取资金。这种手法非常有效，以至于 1999 年弗雷德去世时只剩 190 万美元的现金，手中最大的一笔资产是唐纳德签给他的 1030 万美元的借条。据说，第二年祖母去世时，我祖父母的遗产总值只有 5180 万美元，但考虑到 4 年后，唐纳德他们以 7 亿多美元的价格变卖了特朗普帝国，5180 万美元的说法真是荒谬可笑。

祖父对唐纳德的投资从短期看是非常成功的。在唐纳德“事业”的关键期，祖父总会极具战略性地拨给他数百万甚至数千万美元。有时候，那些资金帮助唐纳德维护了自己的形象和一贯的生活方式，有时候则为唐纳德买来了成功和种种恩惠，并且越来越频繁地成为他的保护伞。弗雷德就是这样大手出钱，在唐纳德借助他获得的荣耀中沉醉。他知道没有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慷慨解囊，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对此他很满意。祖父其实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他的帝国能够永远持续下去；但从长远来看，祖父其实失去了一切。

每当我和哥哥与罗伯特见面讨论祖父的遗产时，罗伯特都会强调要尊重我祖父的遗愿，不让我们得到任何东西。然而，当涉及到他们自己的利益时，幸存的特朗普四姐弟却毫不犹豫地做了我祖父最不愿意看到的事：唐纳德宣布他想出售特朗普帝国时，无人反对。

2004 年，祖父花了 70 多年时间建立的帝国的绝大部分以 7.056 亿美元的价格卖给了鲁比·施朗（Ruby Schron）。为施朗出资的银行给这些房产的估价为近 10 亿美元，所以我的叔叔唐纳德，这位所谓的交易高手，一下子就折损了近 3 亿美元。

大量变卖房产是战略上的失败，最明智的做法其实是让公司保持原样，这样一来，四姐弟每个人都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每年赚 500 到 1000 万美元。但唐纳德需要大量的现金，相比之下，这个数额微乎其微，即使每年都能挣这么多，也无法阻止唐纳德卖掉房产。

他们原本也可以将楼房和建筑群单独出售，那样一来，总售价将大幅提升，但过程却很漫长。唐纳德的身后有大西洋城的债权人步步紧逼，因此他不想再等了。另外，想把几十笔买卖的消息保密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必须一次性完成交易，并且要尽可能快、尽可能悄无声息地进行。

就这一点来说，他们成功了。这可能是唐纳德进行的房地产交易中唯一没有受到媒体关注的一次。不管玛丽安娜、伊丽莎白和罗伯特有什么反对意见，他们都默默咽下了。即便是现在，玛丽安娜明明比特朗普大了近 10 岁，也比他更聪明、成就更高，但还是会听他的安排。用她的话说：“唐纳德总是能得偿所愿。”另外，他们谁都无法冒险等待；因为他们都清楚整件事的内情，那家“全县建筑物资及维修公司”就是关键。

卖来的钱分成了四份，他们姐弟四人每人拿到了约 1.7 亿美元。这对于唐纳德来说依然不够。也许他们四个都觉得不够吧。从来就没有什么是够的。

2018 年 9 月，距离《纽约时报》发表那篇文章不足一个月。我去拜访玛丽安娜姑姑时，她说我的堂兄弟大卫·巴斯托联系过她。大卫曾一路跟踪我祖父的老会计师杰克·米特尼克（现年 91 岁）来到了佛罗里达州某处的养老院，笃信爆料一定是从杰克那儿走漏的。玛丽安娜推翻了他的猜想，并表示那篇文章只是关于 1990 年有关遗嘱附录的争议。不过，如果她的确和巴斯托谈过，她一定知道他们的调查已经深入到了“全县建筑物资及维修公司“，开始调查公司可能存在的税务欺诈。但她似乎对此不以为然。而如今出于完全不同的原因，我很好奇她和罗伯特为什么没有尽力劝唐纳德不要竞选总统，毕竟他们肯定想过，当上总统的唐纳德（以及他们自己）将不能继续逃避审查。

文章刊出后不久，我又见到了玛丽安娜。她对于文章中的内容全盘否认。毕竟，她当时只是个“女孩”。有张纸放在她面前需要她签名，她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便签了。她说：“这篇文章里的事可以追溯到六十年前。你知道的，那时候我还不是法官。”说得好像调查也是在六十年前完成的一样。虽然法院已经对她受到的指控展开了调查，但她似乎不担心会有什么影响，唯一必须做的就是用退休了结一切。她也确实这么做了，从而保住了每年 20 万美元的退休金。

在这期间，她的怀疑对象从年老体弱的杰克·米特尼克变成了她的大堂哥约翰·沃尔特（John Walter）。约翰是我祖父的妹妹伊丽莎白的儿子，已于当年 1 月份去世。我对玛丽安娜如此轻易地下了这个结论感到震惊。约翰和我祖父并肩工作了几十年，从祖父财产中获得了巨额利益，深度参与了“全县建筑物资及维修公司”的事务，而且据我所知，他一直很忠诚。玛丽安娜姑姑会怀疑到他让我觉得很奇怪，虽然她的怀疑对我是有利的。但当时我不知道的是，约翰的讣告中没有提及唐纳德。这个疏忽很严重，因为约翰一直对特朗普的家族史很感兴趣，并对自己与特朗普集团管理层的关系为傲。

更惊人的是，玛丽安娜似乎不觉得文章中的内容会令我不安，仿佛她也已经相信了那个真相被抹杀、历史被改写的事件版本。她根本没有想过这些爆料会对我产生任何影响。

唐纳德四姐弟用可能是偷来的巨款在祖父的遗产问题上与我们兄妹相争，把我们俩的合伙份额大幅贬值（我现在才第一次明白这一点），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显得他们病态般的小肚鸡肠；而他们对待我侄子以及我们医疗保险的态度更是无比残忍。

第十四章 公共住房里的公务人员

从国会众议院到特朗普大厦到白宫西翼有一条直通线，就像从特朗普管理公司到特朗普集团再到椭圆形办公室一样。第一个是基本上受控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唐纳德的物质需求一直得到照顾与满足；第二个是一系列的挂名职务，在这种环境中，工作都是由他人完成的，而唐纳德从不需要为了获取或保留权力而获得专业知识（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他对他人专业知识的蔑视）。所有这些都使唐纳德他相信自己是成功的，同时也让他免于失败。

唐纳德对我祖父来说就像边境墙之于唐纳德：一个以更值得追求的事业为代价的虚荣项目。弗雷德没有培养唐纳德接替他的职位；当他头脑清醒的时候，他不会把特朗普管理公司的管理权交给任何人。相反，尽管唐纳德遭遇失败，判断力也欠佳，他还是将唐纳德作为他自己受挫的雄心壮志的脸面。弗雷德一直在支撑唐纳德错误的成就感，直到唐纳德唯一的资产就是他能轻易地被更有权势的人欺骗。

有很多人愿意占他的便宜。上世纪 80 年代，纽约的记者和八卦专栏作家发现唐纳德无法区分嘲弄和奉承，并利用他的无耻来推销报纸。这种形象以及它所代表的唐纳德的弱点，正是吸引马克·伯内特（Mark Burnett）的地方。到了 2004 年，当真人秀节目《学徒》第一次播出时，唐纳德的财务状况一团糟（尽管他和他的兄弟姐妹们卖掉祖父的房产后，从祖父的遗产中分得了 1.7 亿美元），而他自己的“帝国”面临着越来越令人绝望的品牌推广机会，如特朗普牛排、特朗普伏特加和特朗普大学。所以他很容易成为了伯内特的目标。唐纳德和观众都成了《学徒》这个笑话的笑柄。尽管所有的证据都表明他的失败，但《学徒》将唐纳德塑造成了一个合法的、成功的大亨。

在他房地产生涯的头四十年里，我祖父从未负债。然而，在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随着唐纳德的野心越来越大，他的失误也越来越频繁，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唐纳德在特朗普大厦（如果没有弗雷德的金钱和影响力，特朗普大厦连同他的第一个项目君悦酒店是不可能完成的）之后所做的一切并没有扩大他父亲的帝国，反而削弱了帝国的价值。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末，特朗普集团似乎陷入了亏损的境地，因为唐纳德悄悄从特朗普管理公司挪走了数百万美元，以支持他作为房地产天才和交易高手的神话。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随着唐纳德在房地产领域的失败越来越多，我祖父也越来越需要他显得成功。弗雷德让一群故意不断赞扬唐纳德的人围在他的身边，这些人知道家族企业是如何运作的，他们支持唐纳德，并为他撒谎。

我祖父给唐纳德的钱越多，唐纳德就越有信心，这使他从事规模更大、风险更高的项目，从而导致更大的失败，并迫使弗雷德给予他更多的帮助。通过继续帮助唐纳德，我的祖父使他变得更糟糕：更需要媒体的关注和免费的资金，更自我夸大和妄想他的“伟大”。

尽管救助唐纳德原本是弗雷德的专属领域，但银行很快就成为了该项目的合作伙伴。起初，唐纳德冷酷的效率和完成工作的能力让他们相信，他是在诚信经营。随着破产案的堆积和不计后果购买的账单到期，银行给唐纳德的贷款仍在继续，但是现在这种贷款已然成为了维持最初欺骗他们的“成功”幻觉的一种手段。可以理解的是，唐纳德越来越觉得自己占了上风，即使事实上他并没有。他完全没有意识到别人利用他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并且他相信自己能掌控一切。弗雷德、银行和媒体给了他更多的回旋余地，以便让他完成他们的要求。

在他试图接管科莫多酒店（Commodore Hotel）初期，唐纳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明了自己参与该项目的既定事实。他就并未发生的交易撒谎，强行把自己卷了进去，让对方很难把他踢出局。然后，他和弗雷德利用这一开局，连同他在纽约新闻界新近膨胀的声誉和我祖父的数百万美元，为他的下一个发展项目特朗普大厦获得了巨额减税。

在唐纳德看来，尽管作弊，他还是全凭自己的能力完成了一切。他接受过很多采访，在这些采访中，他无数次表示：他父亲仅仅借给他 100 万美元，他还得偿还父亲的借款，他的成功全靠他自己。这显然是谎言。人们很容易理解他为什么会相信这一点。因为还没有人能像他——这个日益萎缩的自由世界表面上的领袖——那样，一败涂地。

今天的唐纳德还是和他三岁时一样：不能成长，不能学习，不能进化，不能调节自己的情绪，不能平息自己的反应，不能吸收和综合信息。

唐纳德对肯定的需求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他似乎没有注意到，他的支持者中最大的一个群体是那些他不会屈尊在竞选集会之外与之会面的人。他根深蒂固的

不安全感在他身上造就了一个“需要”的黑洞，不断需要赞美之光，一旦他沉浸黑洞之中，赞美之光就会消失。永远都不够。这远远超出了普通的自恋，唐纳德不仅仅是软弱的，他的自我是一个脆弱的东西，必须每时每刻都得到支持，因为他深知自己根本不是他所声称的那样。他知道自己从未被爱过。所以，如果可以的话，他必须通过让你同意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事情来吸引你：“这架飞机很棒，不是吗？”“是的，唐纳德，这架飞机太棒了。”如果你不愿意做出这么小的让步，那对他来说就太不礼貌了。然后他就把他的弱点和不安全感当作你的责任：你必须平息这些，你必须照顾他的感受。如果不这样做，会使他处于无法承受的真空之中。如果你是一个在乎他认可的人，你可以说任何话来保持他的认可。当他遭受巨大的痛苦时，如果你不能尽你所能减轻这种痛苦，你也会受苦。

———

从在家中的童年到他早期涉足纽约房地产界和上流社会，直到今天，唐纳德的反常行为一直被其他人常态化。当他登上纽约房地产市场时，他被吹捧为一个鲁莽、白手起家的交易者。“鲁莽”是对他的一种恭维（用来表示自信，而不是粗鲁或傲慢），但实际上他既不是白手起家着，也不是一个好交易者。这都是他滥用语言和媒体没有提出尖锐问题造成的。

他真正的技能（自我夸大、撒谎和耍花招）被认为是他成功的独特优势。通过将他想要讲述的关于他的财富和他后来“成功”的故事永久化，我们家族和其他许多人开始了使唐纳德正常化的进程。他雇用（和虐待）无证工人和拒绝向承包商支付已完成工作的费用被认为是做生意的代价。不尊重别人、斤斤计较，让他看起来很强硬。

这些失实报道在当时看来是无害的——这是一种出售更多《纽约邮报》或提高《内幕新闻》节目收视率的方式，但每一次违规行为都不可避免地导致另一次更严重的错误。让人们认为他的策略是合理的计算而不是不道德的弊病，是唐纳德和我祖父几十年来一直在构建的神话的另一个方面。

尽管唐纳德的天性没有改变，但自从他就职以来，他所承受的压力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不是工作上的压力，他没有做任何工作，除非看电视和发推特辱骂他人也算工作。真正需要大量工作的是让我们其他人分心，从而不会发现他对包括政治、公民制度或简单的礼仪在内的一切都一无所知。几十年来，无论好

坏，他都得到了公众的关注，但他很少受到密切关注，也从未面临过重大反对。他对自己和整个世界的感觉都在受到质疑。

唐纳德的问题在不断累积，因为解决这些问题或假装它们不存在所需的策略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需要更多的人来进行掩盖。唐纳德完全没有准备好解决自己的问题，也没有充分掩盖自己的行踪。毕竟，这些制度的建立首先是为了保护他不受自身弱点的影响，而不是帮助他绕过更广阔的世界。

他那间非常昂贵、守卫严密的房间正在开始瓦解。与他接触的人比唐纳德更懦弱、更畏缩，但同样绝望。他们的前途直接取决于他的成功和好感。他们要么看不见，要么拒绝相信，自己的命运将与过去发誓效忠于他的人一样。似乎有无数的人愿意加入这个保护唐纳德不受自身缺陷影响，同时让他对自己毫无根据的信仰永存的谄媚者团体。虽然是更有权势的人把唐纳德送进了这个从一开始就保护他的机构，但正是比他更脆弱的人让他继续留在那里。

当唐纳德成为共和党提名的有力竞争者和提名者时，国家媒体对待他的病态（他的撒谎癖好和自大的妄想）以及他的种族主义和厌女症，就好像这些都是娱乐性的个人特质，在这些特质之下潜藏着成熟和严肃的目标。随着时间的推移，从极右翼到所谓的温和派，共和党的绝大多数人要么拥护他，要么从另一角度出发，利用他的弱点和可塑性为自己谋利。

选举结束后，普京、金正恩和麦康奈尔都与弗雷德有着些许相似的心理，他们都意识到，唐纳德曲折的个人历史和独特的人格缺陷，使他极易受到更聪明、更有权势的人的操纵。他的病态使他头脑简单，只需一天重复几十次他对自己说的“他是最聪明、最伟大、最好的”，就能让他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不管是把孩子关在集中营里，背叛盟友，实施破坏经济的减税政策，还是贬低每一个为美国的崛起和自由民主的繁荣做出贡献的机构。

在《大西洋月刊》的一篇文章中，亚当·瑟尔（Adam Server）写道，对唐纳德来说，残酷才是关键。对于我的祖父弗雷德来说，这完全正确。我祖父除了赚钱外，还有一件乐事就是羞辱别人。他坚信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正确的，在

他惊人的成功和对自己优越性信念的鼓舞下，他必须迅速果断地惩罚任何挑战他权威的人。这实际上就是弗雷德提拔唐纳德而不是我父亲弗雷迪成为特朗普管理公司总裁的原因。

与我祖父不同的是，唐纳德一直在努力争取合法性。作为弗雷迪的替代者，他先是成为曼哈顿房地产开发商和赌场大亨，现在又成了椭圆形办公室的主人。但他永远无法摆脱完全没有资格的污点，或他的“胜利”是不合法的感觉。在唐纳德的一生中，尽管我祖父一再地、铺张浪费地干预，他的失败还是与日俱增，他为合法性而进行的斗争是永远无法胜利的。它逐渐变成了一个计划，一个为确保没有人发现他根本就“不合法的”阴谋。这一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真实，而这正是我们国家所面临的一个难题：目前组成的政府，包括行政部门、国会半数席位和最高法院多数席位，完全是为了保护唐纳德的自我；这几乎成了它的全部目的。

在某种程度上，他的残忍是一种转移我们和他自己对他失败真实程度注意力的手段。他的失败越是令人发指，他的残酷就越是令人震惊。当他威胁要揭发告密者，在压倒性的罪证面前强迫参议员无罪释放并赦免海军海豹突击队员埃迪·加拉赫（Eddie Gallagher）（其在一个月内先后被指控犯下战争罪并与尸体合影）时，谁注意到被他绑架并关进墨西哥边境集中营的孩子们呢？如果他能在空中转起四万七千个盘子，就没有人会关注其中任何一个。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分散注意力。

唐纳德的残酷也在于行使他的权利。他总是用它来对付那些比他弱小的人，或是那些因责任或依赖而无法反击的人。当他在推特上攻击员工和政治任命者时，他们无法反击，因为这样做会危及他们的工作或声誉。弗雷迪出于手足间的责任感和他个人的教养，没有在弟弟唐纳德嘲笑他的飞行员梦想时反击他，正如蓝州的官员们为了在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危机期间为他们的公民获取足够的帮助，避免唐纳德扣留挽救生命的呼吸机和其他所需的用品，不得不控制指责唐纳德无能的冲动。唐纳德很久以前就学会了如何选择目标。

唐纳德继续生活在对冷漠和失败的恐惧的黑暗空间中，而这正是导致他兄弟走向毁灭的原因。尽管这场毁灭花了足足四十二年才完成，但在唐纳德经历自己

的创伤时，这些基础很早就奠定了，并一直在他的眼前上演。这两件事结合在一起，他所目睹的和他所经历的，既孤立了他，又吓坏了他。恐惧在他童年和现在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对他来说，恐惧仍然是压倒一切的情绪，这说明了60年前的特朗普家族中肯定也存在着地狱般的恐惧氛围。

每当听到唐纳德谈论某件事是如何最好、最大、最宏伟、最精彩的时候（暗示是他的成就），你必须记住，说这话的人在本质上仍然是那个小男孩，他非常担心自己像他的哥哥一样不够好，会因为自身的不足而被毁灭。在更深的层次上，他的吹牛和虚张声势并不是针对眼前的观众，而是针对他唯一的观众：他死去已久的父亲。

——————

唐纳德总是能够利用些草率的陈述侥幸成功，如“相信我，我比任何人都更了解xxx”，或者“没有人比我更了解xxx”；他被允许对核武器、与中国的贸易以及其他他一无所知的事物侃侃而谈；当他吹嘘未经检测的药物治疗新冠肺炎的的疗效时；或者当他参与了一段荒谬的修正主义历史，而在这段历史中，他从来没有犯过错误时，他基本上没有受到任何质疑。

当你控制叙事的时候，若从不被迫去阐述你的前提，或者证明你真正理解了潜在的事实，你的叙述是很容易听起来连贯和知识渊博的。这是对（许多）媒体的谴责，在竞选期间，揭露唐纳德的谎言和无耻的主张实际上本可能使我们将他从总统宝座上拉下来。但在竞选期间这一切并没有改变。很少有人问他关于他的立场和政策（这显然从他的意图和目的上讲都是不存在的），即使有人问及此类问题，他们也未要求或期望他阐明或展示出任何深度的理解。自大选以来，他已经想出了如何完全避免这些问题的办法；白宫的新闻发布会和正式的新闻发布会都被“直升机谈话”所取代，在这期间，他可以假装因为直升机叶片的噪音而听不到任何不受欢迎的问题。在2020年，他关于新冠肺炎大流行的“新闻发布会”迅速演变成了小型竞选集会，充满了自我祝贺、煽动群众和空头支票。在这些集会上，他否认了已经造成数千人死亡的失败，对正在取得的进展撒谎，并把那些尽管政府拒绝给予他们足够的保护和设备还是冒着生命危险拯救我们的人当作替罪羊。就在几十万美国人因疾病而奄奄一息之际，他仍将其视为一场胜利，以此证明他卓越的领导能力。如果有人认为他有能力表现得严肃或阴沉时，他便会

开一个有关与模特发生关系的玩笑，或者谎报他的脸书粉丝数量。但一些新闻网络不愿就此作罢，那些为数不多的向他发起挑战的记者们，甚至是那些仅仅要求唐纳德给予一个处于惊恐中的国家一些安慰的人们，都被嘲笑和贬低为“令人不快的人”。从弗雷德积极鼓励的唐纳德早期的破坏性行为，到媒体不愿意去挑战他，再到共和党甘愿对他自 2017 年 1 月 20 日以来每天的腐败行为视而不见，这一切都导致这个曾经伟大国家的经济、民主和健康面临崩溃。

在理解媒体与政治的交叉点时，我们必须摒弃唐纳德的“战略才华”思想。他没有策略，从来都没有。尽管他有着选举优势和可疑的、不合法的“胜利”等侥幸，但他从来没有接触到时代精神的脉搏；他的咆哮和无耻恰好引起了某些人的共鸣。如果他在 2016 年竞选中的所作所为并没有成功，他现在还是会这么做，因为除了撒谎、作弊、斤斤计较和挑拨离间以外，他一无是处。他无法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就像他无法成为合格的总统一样。他确实利用了某种偏执和早期的愤怒，这是他一贯擅长的。1989 年，他花钱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冗长的整版文章，呼吁处死中央公园五罪犯，这并不是出于他对法治的深切关注，而是因为这对他来说是一个轻而易举的机会，可以在谈论一个对纽约市而言非常重要的严肃话题的同时，又在有影响力和声望的“灰色女士”（Gray Lady）（指《纽约时报》）书页中看起来像一位权威人士。这是一种赤裸裸的种族主义，注定会激起该城市更加强烈的种族仇恨。所有五个男孩，凯文 •理查森（Kevin Richardson），安特龙 •麦克雷（Antron McCray），雷蒙德 •桑塔纳（Raymond Santana），科里 •怀斯（Korey Wise）和尤瑟夫 • 萨拉姆（Yusef Salaam），随后都通过无可争议的 DNA 证据证明是无辜的。然而，直到今天，唐纳德仍然坚持认为他们是有罪的。这是他永远都无法放弃一个他喜欢的叙事的又一例证，即使他的叙事与既定事实相矛盾。

唐纳德把任何指责都当作一种挑战，并将一开始就引发反对的行为变本加厉，好像批评是让他表现得更为糟糕的许可证。弗雷德开始欣赏唐纳德的固执，他以为这是他在儿子们身上寻求的那种坚韧与强硬的表现。50 年后，由于唐纳德毁灭性的决定和灾难性的不作为，人们真真切切地正在经历死亡。在数百万人生命危在旦夕之际，他指责联邦政府没有亲自提供通风机，威胁要从州长没有对他表现足够敬意的州扣留资金和救生设备。对此我一点也不惊讶。另一方面，面对这

种公然表现出对人的生命或行为后果的反社会漠视，震耳欲聋的沉默让我充满绝望，并提醒我，唐纳德毕竟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这是唐纳德的失败，他违反传统、违背礼仪、违反法律和反人类同胞的越轨行为不断被宽恕并得到奖赏的最终结果。在虚假的参议院弹劾案审判中被无罪释放，是对其不良行为的又一嘉奖。

谎言一从他口中说出，就可能在他心里变成了真的，但它们实际上仍然是谎言。对他来说，这只是另一种试探自己到底能侥幸逃脱什么的方式。到目前为止，他每一次都蒙混过关了。

后记 第十层地狱

2016 年 11 月 9 日唐纳德当选时，我感到非常绝望，部分原因是唐纳德的残忍和无能定会让人丧命。我当时最坏的猜测是，这种情况大概会发生在他自己制造的灾难之中，比如一场他挑起或无意卷入的本可以避免的战争。我从未料到有如此多的人会心甘情愿地满足他糟糕透顶的本能，这导致了政府批准的绑架儿童、在边境拘留难民、背叛我们的盟友等暴行。我也没想到会有一场全球性的大流行出现，而这场大流行也让他对其他人的生命表现出了可怕的冷漠态度。

唐纳德对新冠肺炎的初步反应突显出了他不惜一切代价将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的迫切需要。他现在还是和三岁时一样，始终不能接受恐惧，因为恐惧在我们家族中就是脆弱的代名词。当唐纳德遇到大麻烦的时候，夸大其词已经不够了：情况和他对此的反应都必须是独一无二的，即使荒谬离谱也无所谓。在他看来，没有一个飓风像“玛利亚”飓风那样狂暴。在他看来，“没人能预测”这场大流行，尽管他自己的卫生和公共服务部在华盛顿州新冠肺炎疫情大爆发前的几个月里已进行了模拟。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恐惧使然。

唐纳德在 2019 年 12 月、2020 年 1 月、2 月和 3 月行动缓慢并不是因为自恋，而是害怕显得软弱或无法传达出一切都是“伟大的”“美丽的”“完美的”信息。讽刺的是，他没有勇气面对失败的事实，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更大规模的失败。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有数十万人将因此丧生，历史上最富裕国家的经济也很可能被摧毁。唐纳德不会承认这一切，他降低底线来隐藏证据，并在这个过程中说服自己：如果只有几十万人而不是两百万人死亡，那么他所做的就比任何人都好。

唐纳德曾说：“报复那些整过你的人”，但通常他报复的对象往往是他首先背叛的人，比如他拒绝付款的承包商，或是他拒绝保护的侄女和侄子。即使他成功地击中了目标，他的目标也是如此地不合适，以至于造成了附带伤害。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莫（Andrew Cuomo），目前美国新冠肺炎应对行动的实际领导者，不仅犯了没有拍唐纳德马屁的罪行，还犯了作为一个真正受人尊敬、有效率和受人钦佩的领导人而让唐纳德下不来台的终极罪行。唐纳德并不能通过把科莫关起来或者撤销他的决定来反击他；由于他已经放弃了领导全国应对行动的权力，他没有能力对抗州一级的决策。尽管唐纳德可以侮辱和抱怨科莫，但科莫州长真正的领导力每天都在进一步揭示唐纳德是一个小气、可怜的小人物，他无知、无能、

没有自知之明，迷失在了自己的妄想之中。为抵消他的无力感和愤怒感，唐纳德能做的就是惩罚我们其他人。他会从那些对他还不够卑躬屈膝的州扣留呼吸机，或者窃取他们的物资。如果纽约持续没有足够的设备，科莫会很难堪，而我们其他人也都会被诅咒。谢天谢地，唐纳德在纽约市的支持者并不多，但即使如此，一些人也会因为他懦弱的“复仇”渴望而死去。在这种情况下，唐纳德认为合理的报复其实就是大规模谋杀。

唐纳德本可以轻而易举地成为一个英雄。如果他能够找个人把奥巴马政府交给他的大流行防备手册从书架上拿下来；如果他在第一时间就通知有关机构和州政府，病毒具有高度传染性，死亡率极高，而且没有得到控制；如果他援引 1950 年通过的《国防生产法》，开始生产个人防护装备、呼吸机和其他必要设备，为国家应对最坏情况做好准备；如果他允许医学和科学专家每天召开新闻发布会，让事实清楚而诚实地呈现出来；如果他能确保所有必要机构之间相互协调，有一个系统的、自上而下的方法。那些憎恨和批评过他的人就会原谅或忽视他那些层出不穷的、骇人听闻的行为。大部分这些任务几乎不需要他付出任何努力。他所要做的就是打几个电话，做一两次演讲，然后把其他事情都委托给别人。他可能会因此被指责过于谨慎，但起码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安然无恙，更多的人会幸存下来。然而真实情况是：各州被迫从私人承包商那里购买重要的物资；联邦政府征用这些物资，然后联邦应急管理局再将其分配给私人承包商，最后由私人承包商再次出售。

当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孤独地死去时，唐纳德却在吹嘘股市收益。当我父亲一个人躺在床上奄奄一息时，唐纳德却去看电影了。如果他能从你的死亡中得到任何好处，他就会利用你的死亡，然后会忽略你死去的事实。

为什么唐纳德花了这么长时间才行动？他为什么没有严肃对待新型冠状病毒？部分原因是，他像我的祖父一样缺乏想象力。新冠大流行与他没有直接的关联，时刻处理好危机似乎无助于他宣传自己偏爱的说法，即没有人比他做得更好。

随着大流行进入第三个月，然后是第四个月，死亡人数继续上升到数万人，媒体开始批评唐纳德对那些死去的人和他们背后的家庭缺乏同情心。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唐纳德根本无法承认他人的痛苦。讲述那些我们失去的人的故事只会使他厌烦。承认新冠肺炎的受害者就是把自己和他们的软弱联系在一起，而软弱一

直是他父亲教导他应当鄙视的特质。唐纳德不能再为病人和垂死的人辩护，就像他不能把自己置于他父亲和哥哥弗雷迪之间一样。也许最关键的是，对唐纳德来说，同情心没有任何价值，关心他人也没有实际的好处。大卫·科恩（David Corn）写道："对于这个可怜的、破碎的人来说，一切的一切都是交易。"这是一个关于父母教育失败的史诗般的悲剧，我叔叔并不理解他或其他任何人都有内在的价值。

在唐纳德看来，即使承认一个不可避免的威胁，也会显示出软弱。承担责任会使他受到责备。做个英雄，或者做个好人，对他来说是不可能的。

他对于自马丁·路德·金遇刺以来最严重内乱的处理应对也印证了这一点。这是另一场唐纳德本可以轻而易举成功解决的危机，但他的无知压倒了他利用自己优势的能力，导致了他在任内发生的第三次国家大灾难。一个有效的回应需要团结一致，但唐纳德需要的是分裂。这是唐纳德所知道的关于如何生存的唯一途径，我祖父几十年前让他的孩子们互相攻击时就向他们传达了这一观点。

我可以想象唐纳德看到德里克·乔文（Derek Chauvin）谋杀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时残忍和可怕的冷漠态度，双手插在口袋里，漫不经心地盯着摄像机，心里充满了羡慕。我可以想象唐纳德希望是他自己的膝盖压在弗洛伊德的脖子上。

取而代之的是，唐纳德退回到了他的舒适地带：推特和福克斯新闻，在堡垒的保护下，从远处横加指责。他在展示自己的弱点的同时，仍在对别人的弱点大发雷霆。但他永远无法逃避这样一个事实：他永远都是一个受惊的小男孩。

唐纳德的残忍正是他内心脆弱的表现，他一生都在逃避这种脆弱。对他来说，不管多么虚幻，都没有任何选择，只有积极地表现出力量，因为做任何其他事情都意味着死亡判决；我父亲短暂的一生就是证明。这个国家现在正遭受着同样的毒害，我的祖父就是吞没了他生病的妻子，折磨他垂死的大儿子，并造成了他最爱的孩子唐纳德·J·特朗普的精神创伤。

"一切都好吧。对吧，亲爱的？"

致谢

感谢西蒙·舒斯特出版公司的乔恩·卡普、埃蒙·多兰、杰西卡·琴、保罗·迪波里托、林恩·安德森和杰基·塞奥。

感谢 WME 公司的杰伊·曼德尔和塞伊恩-阿什利·爱德华兹。

感谢深思熟虑审核的卡罗琳·莱文；感谢《琼斯妈妈》杂志的大卫·科恩的好意；感谢杰出的校对员达伦·安克罗姆（Darren Ankrom）；感谢斯图尔特·奥尔奇克向我讲述那些更好的日子；感谢杰瑞·劳勒上尉提供的环球航空公司的精彩历史；感谢玛丽安娜·特朗普·巴里给予的所有启发性信息。

还要感谢丹尼斯·坎普对我的支持；感谢我的母亲琳达·特朗普，感谢她所有伟大的故事；感谢劳拉·施韦尔斯、黛比·R、斯蒂芬妮·B 和詹妮弗·T，感谢你们在我最需要的时候给予了我友谊和信任。吉尔和马克·纳斯帮助我们保持一贯的传统。

献给我们亲爱的父亲，我每天都想念他。

我深深地感谢泰德·布特罗斯，感谢和您的第一次见面和您对我事业的信任；感谢安妮·坎普的慷慨和友谊；感谢帕特·罗斯（Pat Roth）的周到反馈和对我生活的关心；感谢我父亲的好朋友安娜玛丽亚·福西尔，我很高兴我找到了您；感谢苏珊娜·克雷格和鲁斯·布埃特纳出色的新闻报道和诚实正直，感谢你们带我一同出访。苏，如果没有你的坚持、勇气和鼓励，这一切都不可能实现；感谢莉斯·斯坦因，感谢你与我一起踏上旅程，使这本书成为一本更好的书，使撰写这本书成为了一次比以往更有趣、更不孤独的经历（当然，还有要感谢你送我的尤达宝宝）；埃里克·阿德勒，感谢你一直陪伴着我，感谢你孜孜不倦的反馈；还有艾丽丝·弗兰克斯顿，感谢你从这个项目一开始就参与其中，即使在我都不相信自己的时候也相信我，无数次阅读我的作品。我迫不及待的想要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最后，感谢我的女儿艾弗瑞，你比任何孩子都要有耐心和理解力。我爱你。

考研资料：数学、英语、政治、管综、西综、法硕等（整合各大机构）
英语类：四六级万词班专四专八雅思等
财经类：初级会计、中级会计、注册会计、高级会计、税务师、会计实操、证券从业、基金从业、资产评估、初级审
公务员：国考、省考、事业单位、军队文职、三支一扶微信 2270291360
银行：银行招聘、笔试、面试
教师资格：小学、中学、教师招聘面试
建筑：一建、二建、消防、造价
法考：主观题、客观题
多平台网课：涵盖职场、办公技能、编程、文案写作、情感心理、穿搭技巧、理财投资健身减肥摄影技术等优质内容
精选资料：Excel 教程、PPT 模板、简历模板、PS 教程、PPT 教程、素描、烹饪、小语种、CAD 教程、PR 教程、UI 课程、自媒体、写作、计算机二级、钢琴、Python、书法、吉他、kindle 电子书、演讲.....持续更新中...
押题：提供考前冲刺押题（初级会计、中级会计、注册会计、一建、二建、教资、四六级、证券、基金、期货等等），麻麻再也不用担心我考不过了。
资料领取微信：1131084518
行业报告：20000 份+持续更新

英语四六级备考资料	计算机二级备考资料	150 所高校考研专业课资料
两小时搞定毛概马原思修近代史纲	高数(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论	素描 0 基础入门教程
教师资格证全套备考资料	普通话考试资料礼包	书法教程微信 2270291360
大学生英语竞赛备考资料	大学生数学竞赛备考资料	1000 份各行业营销策划方案合集
挑战杯/创青春/互联网+竞赛资料	电子设计竞赛必备资料	街舞 0 基础入门教程
托福雅思备考资料	大学物理学科攻略合集	动漫自学教程
SCI 最全写作攻略	TEM4/TEM8 专四专八备考资料	教师资格证面试试讲万能模板
360 份精美简历模板	数学建模 0 基础从入门到精通	100 套快闪 PPT 模板
Vlog 制作最全攻略	超强 PR 模板	42 套卡通风 PPT 模板
PS 零基础教程微信 1131084518	PS 高级技能教程	63 套酷炫科技 PPT 模板
好用到极致的 PPT 素材	128 套中国风 PPT 模板	32 套 MBE 风格 PPT 模板
327 套水彩风 PPT 模板	295 套手绘风 PPT 模板	54 套毕业答辩专属 PPT
196 套日系和风 PPT 模板	82 套文艺清新 PPT 模板	57 套思维导图 PPT 模板
163 套学术答辩 PPT 模板	53 套北欧风 PPT 模板	34 套温暖治愈系 PPT 模板
118 套国潮风 PPT 模板	30 套仙系古风 PPT	126 套黑板风 PPT 模板
114 套星空风格 PPT 模板	192 套欧美商务风 PPT 模板	42 套绚丽暈染风 PPT
50 套精美 INS 风 PPT 模板	56 套水墨风 PPT 模板	137 套清爽夏日风 PPT 模板
98 套森系 PPT 模板	25 套简约通用 PPT 模板	记忆力训练教程
300 套教学说课 PPT 模板	123 套医学护理 PPT 模板	AE 动态模板微信 2270291360
毕业论文资料礼包	教师资格证重点笔记+易错题集	表情包制作教程
吉他自学教程（送 6000 谱）	钢琴自学教程（送 1000 谱）	区块链从入门到精通资料
2000 部 TED 演讲视频合集	Excel 从入门到精通自学教程	单片机教程
230 套可视化 Excel 模板	1000 款 PR 预设+音效	1000 份实习报告模板
手绘自学教程微信 1131084518	单反从入门到精通教程	人力资源管理师备考资料
英语口语自学攻略	粤语 0 基础从入门到精通教程	证券从业资格证备考资料
日语自学教程	韩语自学教程	PHP 从入门到精通教程
法语学习资料	西班牙语学习资料	炒股+投资理财从入门到精通教程
全国翻译专业资格考试备考资料	BEC 初级+中级+高级全套备考资料	大数据学习资料
SPSS 自学必备教程	Origin 自学必备教程	会计实操资料
LaTeX 全套教程+模板	EndNote 教程+模板	小提琴 0 基础入门自学教程
GRE 超全备考资料	200 份医学习题合集	司考备考资料

思维导图教程＋素材	20000 份行业研究报告	一级造价工程师备考资料

上万 GB 教学资料（均全套,非杂乱）免费领取微信 1131084518

《闪电式百万富翁》实战版+升级版

易经+道德经+易学名师全集+风水学+算命学+起名+++等等（全套 1000 多 GB）

心理学+NLP 教练技术+精神分析+亲子家庭教育+催眠+++等等（更新超 2000GB）

大学-已更新至 9333 个课程+高中+初中+小学-全套资料（超过 2 万 GB）

陈安之	曾仕强	马云	杜云生	翟鸿燊	刘一秒	俞凌雄
王健林	余世维	雷军	周文强	安东尼罗宾	董明珠	李嘉诚
徐鹤宁	冯晓强	李践	刘克亚	罗伯特清崎	戴志强	李伟贤
苏引华	史玉柱	李强	俞敏洪	杰亚伯拉罕	周鸿祎	唐骏
梁凯恩	陈永亮	傅佩荣	贾长松	易发久	李彦宏	湖畔大学
李开复	聂枭	悟空道场	魏星	姬剑晶	其他名师全集	其他资料下载
王兴	王智华	智多星	陈文强	周导		微信 2270291360
泡妞	撩汉	泡仔	房中术	性福课	驻容术	泡妞撩汉性福合集

注：太多了，无法全部一一列出。。。

全套专题系列【微信 1131084518】

记忆力训练	形象礼仪	健康养生	企业管理	沟通技巧
演讲与口才	经理修炼	MBA 讲座	时间管理	战略经营
企业文化	销售心理	管理素质	国学讲座	执行力
团队管理	领导艺术	员工激励	潜能激发	谈判技巧
绩效管理	薪酬管理	43 份直销制度	电话销售	人力管理
客户服务	创业指南	市场营销	餐饮管理	保险讲座
品牌营销	酒店管理	汽车 4S 店	众筹资料	销售技巧

兴趣爱好：	钓鱼教程	魔术教学	炒股教学	美术教学	书法教学
音乐乐器：	萨克斯教学	电子琴教学	小提琴	古筝教学	钢琴教学
	吉他教学				
体育运动：	篮球教学	足球教学	羽毛球教学	兵乓球教学	太极拳教学
	围棋教学	高尔夫球			
生活实用：	插花教学	茶艺-茶道	唱歌教学	单反相机摄影	毛线编织
	小吃+美食				
语言学习：	英语				
电脑 IT：	办公 office	PS 美工教学			

暗号：666

免费领取资料微信

1131084518

微信1131084518

撩汉liaohan.net

最好资源zuihaoziyuan.com

作者简介

玛丽·L·特朗普（Mary L. Trump）拥有德纳高级心理学研究所（Derner Institute of Advanced Psychological Studies）临床心理学博士学位，并教授创伤、精神病理学和发展心理学的研究生课程。她和女儿住在纽约。